

文 學 叢 刊

後 影 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投 影 集
唐 駿

敬以此書獻給我所愛的——永
別了的嫩和兩個幼小的靈魂。

序

人們一到了注意自己的時候，這該是十分無聊的了。我小時有一個幻象，也許是從什麼繡像小說裏勾出影子，由此塑成的吧：那是一個無敵的英雄，披着全副武裝，挺槍躍馬，在黃沙滾滾的戰場上馳騁。這當兒，他既不顧及人家，也未必注意自己，那一意找尋着的，只是一個個的咽喉，找着了，刺過去這是敵人的！

然而幻象也像好夢一樣，受不住歲月的積壓，就此破滅，我於是一無所有。有的，只是向着心底的搜索和探求。

窮思之餘，記得彷彿有人把人生比作戰場，而我們也正是一個個的戰士。倘真如此，那就慚愧得很，我已在這戰場上活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強了。使人辱沒的是並不會肩鎗，卻只拿着一枝小小的筆。但有人以爲筆就是鎗。我想，這傢伙是在替我

掩蓋着短處了，報之以無聲的苦笑吧。

我就再也塑不起這失掉了的幻象來。

有什麼辦法呢？青春已默默地逝去，而我還只能拿着這一枝小小的筆，在人生的重圍裏奔突。疲倦了，休息一回再來；倒下了，摸一摸頭皮，自己又爬起來。這就算是鬥爭，讓生命和文字膠結着，使自己沒入於書堆裏。

但我畢竟並非英雄，寫下來的，多半只是雜感——對社會和時代的嘮叨，決不啻嗚叱咤，也真難禁絕人家的冷笑。去年，有一位朋友會說，我的近年來的雜感，漸漸地有了散文的傾向，而且還以為這是生活磨折的結果。試一回顧，彷彿也真有這樣的事實。但是，這可又是『記住自己』的證據了。

現在，我就把這些證據送出來，這是四年來的一些較長的雜感。說是較長，因為過去所寫，都只是不滿千字的短文，這些還是聽從了魯迅先生的勸告，動手試寫的。好比叫化子愛着他的爛瘡肉一樣，在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的幾篇。

倘不是故意作僞，我想，文章總是沾着作者的血肉，蘸着作者的思想的吧。加以結集，正可算是無情的自剖。這一回，我也忍住痛，切開胸腹，掏出五臟六腑，血淋淋地，放到新進批評家和『批評的批評家』的座前，一面又再拜致意——請！

這恐怕也是『新奇有趣』的吧！

但在我，卻別有一點嚴肅的意思，我自信是還有一點虛心的。名之曰投影集，一是在說在這些文章裏，我曾投下過些些時代的影子；二呢，則是一點祇和我自己相涉的小小的紀念；『影』是我的女人的小名。

做着這樣的紀念的時候，總是很不舒服的。明知無益，却還是做了，這大概就是所謂人生的悲哀吧。

唐弢，一九四〇，二月，記。

目錄

序

一九三六年

從宣傳過去到接受未來·····	一
關於女人的書籍·····	七
爭取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一二
悼念馬克辛·高爾基·····	一六
兩夜雜寫·····	二八
釋放四題·····	四〇
謠言種種·····	五六

私議二章·····	六〇
紀念魯迅先生·····	七四
關於一柱樓詩獄·····	八七
盛世的悲哀·····	九四
隨思錄·····	九八
一九三七年	
我滿着冷汗·····	一〇七
愷撒和羣衆·····	一一四
關於歐化·····	一二〇
「提起時代」·····	一二四
性愛和文學·····	一二九
紀德往何處去·····	一三七

關於文藝翻譯·····	一四五
一九三八年	
少年隊伍的魯迅先生·····	一五三
一九三九年	
關於歷史題材·····	一六二
心上的暗影·····	一六八
瓜蔓集·····	一八〇
我要逃避·····	一九〇
株連草·····	二二四

從宣傳過去到接受未來

『黃禍』這兩個字，據說在歐洲是曾經造成過若干恐怖的，但對於我們，却導演了不少喜劇。——幾年以前，我們文壇上的有些英雄們，曾經高聲地喊出口號，說是要隨着成吉思汗，去征服幹羅思，去做歐洲的主子。話是說得非常漂亮的。但時光毫不猶豫地過去了，歐洲呢，及到如今也還沒有什麼黃色主子，事實證明了這不過是破落戶子弟對於祖先的可憐的夢想。

這種夢想一直縈繞在可憐的子弟們的腦裏，直接或者間接地助長了封建勢力的復活。讀經也，存文也，尊孔也，表章節婦也，反對男女同學也，都可以在這上面得到解答。但抱負最大，成效最著的，却還得推文壇和藝壇，因為新的成吉思汗已經爬上了這兩個壇，說是要拜將祭旗，打到歐洲去了。但可惜的是：以前那些喊口號的，却

並不在內。

這事情得分開來講——

向直頭髮，黃皮膚的同胞們談論中郎子才，提倡六朝晚明，在文壇上，已經是過去的話柄，不算時髦了，這回是要向外發展，當然，向外發展是好事情；但怎樣發展法呢？第一件的大功據說是翻譯李笠翁的關於女人的作品，大概選姿第一，修容第二，治服第三，習技第四等等的名文，都要在黃頭髮，藍眼睛的前面出現了——這是不是美人計呢，也難說得很。——我不是紈袴子弟，不會眠過花，藉過柳，實在不懂怎樣去把女人當作玩物，給自己欣賞，玩弄，所以也不配說什麼。現在姑且從選姿第一裏摘一點出來，這雖然未免有斷章取義的嫌疑，但我的目的就只要大家知道笠翁的作品裏確有這種東西，所謂「以見一斑」罷了。

「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爲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眉語。

「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肌膚。

「……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台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眉眼。

「……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至大同名妓，則強半皆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乃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於此者。……」——手足。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凡女子一見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己，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爲難者，皆怪物也……」——態度。

其他修容，治服，習技裏所談的，是教女人們怎樣挽蟠龍髻，裹金蓮腳，薰薔薇香，學飛燕舞的，我不懂這對於髮髻高鼻的人們有什麼用處。倘使是要作為中國文學征服歐洲的先聲，則也實在淺薄得很。譯者除了向他們說出了自己的祖母們曾經這樣地做過祖父們的玩物以外，另外是什麼也沒有了。

同樣的情形在藝壇上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故宮寶物不是作了先鋒，浩浩蕩蕩，殺奔倫敦，如入無人之境了麼？現在這先鋒隊是到紐約去了。當他在倫敦的時候，據電訊所傳，來歡迎這王師的，不下幾十萬人，那盛況就可以想見。威廉姆·李衛林（William Liewellyn）爵士說：『無論那一個，我碰見的，他的家裏總有一件中國磁器，即使只是一個新的糖漿罐，也自以為是明器，趕緊把牠放在度架上。』

這被譏諷的雖然是英國人，但他們瘋狂地愛着的却是我們明代的東西。而且，他們的出醜，原也就算是我們的得意了，可憐的成吉思汗的子弟們！

不過我們也畢竟並不是一味宣傳，一味向外的民族。我們並沒有忘記老家，所

以也還懂得接受。這幾年來，但看奇奇怪怪的筆調在文學上的盛行，莫名其妙的東西在圖畫上的出現，這些算什麼呢？據說是未來派的藝術，那師承來自意大利的馬利奈蒂（Marinetti）。不過，一到了我們這里，其實是早已變換了面目的。

本來，在墨索里尼大出風頭的今日，我們接受一個馬利奈蒂，也並不算過分。不過馬利奈蒂不但做過一些未來主義的小說，他的徒從們畫過一些未來主義的繪畫，事實上，他們對政治也還有他們的主張。愛利斯托拉都伐（A. Elistratova）說過，那些未來主義者是擁護意大利帝國文學的政策，宣傳意大利的軍事化，和要求殖民地的擴張的。一九一三年，在一部叫做未來主義者的政治宣言裏，那些未來主義者說出了他們的信條，是：

「意大利的絕端自主。意大利這個字也比自由還要重要。除掉做弱者和平家，反意大利者外，一切都容許自由。需要更強盛的陸軍和更強盛的海軍；以意大利為榮耀的國家，對於世界和以農業工業商業立國的意大利，戰爭是衛生的。對

於農工階級者要實施經濟保護和愛國教育。實施粗悍的，陰險的，侵略的外交政策；殖民地的擴張；大意大利主義。反對向文化，古典教育，博物院，圖書館和古跡的愛慕，而崇拜進步，速率，運動，健康和勇敢的人格。」

這些信條有沒有被捧到中國來呢？倘說沒有，那就「肖」不得。倘說是捧過來的，這不也正如高爾基所說的「現在連一條勉強可用的褲子都沒有，而爭論着關於未來的天鵝絨的衣服」那樣聊以自慰的夢想麼？

宣傳過去和接受未來，大體上似乎並不怎樣壞。不過所要宣傳的過去，必須是所以產生現在的過去；而且所要接受的未來，也必須是從現在出發的將要到來的未來。我們不能虛無誇大夢想。

我們得更注意眼前的現實。

三月廿五日。

關於女人的書籍

聽說有一位先生，打算翻譯李笠翁的關於女人的作品了。這消息曾經使我覺得奇怪，因為由我看來，談論女人的怎樣挽髻，怎樣裹腳，其給予髮髻高鼻者的印象，除了有趣以外，實在是一無所有的。便是在中國，這也並不是一部了不得的好書，長洲衛永叔的悅容編，[●]也許還要來得高明些。某先生的看重李笠翁，那理由我想不透，不過這實在是不風雅之至的。

但我的說悅容編比笠翁偶集高明，却又正是從風雅着眼的。李笠翁談肌膚，談修飾，談習技，而衛永叔却更進一步，注意到了選侍，雅供，博古，尋真，晤對，鍾情，借資，招隱等等，他所最看重的是風格，是雅人與緻。站在某先生的立場上說起來，是更合於

● 悅容編見枕中秘，其載於快書者，則易名驚濤譜，樹屋書影謂係梁溪葉文通所作，未知孰是。

理想的。

但自然，也仍舊不是了不得的好書。

關於女人的書籍，在中國，要尋一部比較可以滿意的，實在少得很。我們的祖先們的對於女人，一向是以奴隸相看待的，他們把自己的妻女關在閨闈裏，項鍊，手鐲，戒指，耳環，鎖得不能動了，而後之大丈夫們，偏偏還要玩小腳，這自然又是一個致命傷。女人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弱下去。年代一久，惡意漸浪，這時候就只落得了一點玩弄的邪念，女性的身上釘滿着男性的眼睛，嘻嘻哈哈，說是「好看得來！好看得來！」了。於是乎，就出現了研究這「好看得來」的書籍。

悅容編和笠翁偶集，大概都屬於這一種。因此也抹不去那裏面的蠻性的遺留。在時代和意識逐漸轉變的今日，早已變成古董，失去效用，反而不如關於女人們的掌故，習俗，如夢梁錄裏所載的，較有意思了。

但這種材料，事實上却又少得很。即如夢梁錄，也只是附帶的提及。牠還是男子

的園地，並非女人的專書。

過去的關於女人的專書，是極少的原因呢，正如我上面所說，是爲了女人們被軟禁起來，被當作了男子的私有品，無法自顯，因此也不被人注意的緣故。但自然也有例外，譬如后妃和娼妓，就大都不在內。

她們雖被玩弄，壓迫，却仍舊還有關於她們的專書。

后妃屬於御用的東西，應該另眼看待，是不成問題的，古之娼妓，盛行於京師大邑，賣歌，賣舞，賣肉體；她們交接大官，酬應名公，不同於尋常的中輻，有幾本專書，也還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前者大抵出於史臣的閑筆，而後者却是狎客的舞文。倘加比較，則認真和隨便，發隱和遣興，正經和玩笑，這就有了不同處。

這不同處是顯然的。狎客們大抵只記了一點娼妓的才情，脾氣，色藝。而后妃的專書卻不然。作者是要做翻案，打不平，所謂「仲枉表微」，如東晉時候無名氏所撰，後來收在漢宮春色裏的漢孝惠張皇后外傳兩篇，如遼王鼎的焚椒錄，就都是的。至

於雜事祕辛，趙后遺事，大業拾遺記，元氏掖庭記，以及毛奇齡的勝朝彤史拾遺記等，則大都搜羅遺聞，平鋪事實，是補正史之所不詳的。

娼妓書開端於唐朝孫棨的北里志，崔令欽作教坊記，元朝黃雲箋作青樓集，這三部書，是同樣出名的。明清以來，作者愈多，如板橋雜記，續板橋雜記，潮嘉風月記，海陬冶遊錄，秦淮畫舫錄，吳門畫舫錄等，羣起倣尤，連三四等的妓女，也都被加工點綴，敷衍入書了。這遺風一直流到民國初年，上海的鴛鴦蝴蝶派文人們，在嫖院，『碰和』的當兒，也終要做做詩，通通文，算是像自己這樣的才子，居然又碰到了能夠憐才的佳人，這樣就倆倆要好起來，照那時候通行的說法，就是所謂『卿卿我我』。

『卿卿我我』也有了書籍，而且多得很。可惜我舉不出例子來。

總之，我們過去所有關於女人的書籍，最多的是這兩種。烈婦和才女，也偶然見諸傳記，但能夠做幾首詩，守一世節，我只見其要不得，自然不至於會了不得的。

然而倘要譯出去，卻終覺得有點沒意思。我還是堅持着自己的主張：多多地翻

籍。譯進來，讓大家可以借鏡，取法，獲益，尤其是關於女人——或者說是婦女問題的書。

五月廿三日。

爭取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由於過去的事實和眼前的情形所昭示，我常常想到：中國的人民，那些沒有權勢者，是被罩壓在一張看不見的，然而却又非常闊大的網裏——這也許是一張蜘蛛網，但在這張蜘蛛網的下面，人們却只准蜷伏，吞聲，忍受，倘使動一動，那就碰在絲上，膠住兩腳，給那蜘蛛網的統治者所擒住，甚而至於吃掉。

這雖然好像幻想，但其實還是事實。

民元革命以後，因為惡勢力的繼續存在，滋長，有許多改革者，先驅者，思想家，著作家，就都碰在這張網上，失去活力，送掉性命了。至於封鎖刊物，檢查書報，那更是常見的事情，去年以來，被勒令禁止的，多到一百幾十種。罪狀呢，或曰革命，或曰左傾，或曰「忘祖」，後者是專指提倡新文字的那幾種，但自然，「忘祖」也還是不安分的

表示，存心搗亂，理合封鎖的。不過倘使真如那罪狀所說，這一百幾十種刊物，種種都是不能安分，存心搗亂，那末，我可不要替眼前的統治階級捏一把冷汗，覺得情形實在有點不妙了。

這不妙，也並非完全因為搗亂的份子太多。善於猜忌的人物，到了只知壓迫小民，排斥異己的時候，往往也正是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命運將要沒落的時候。

俄羅斯的尼古拉一世，是一個有名的獨斷者，但卻也多疑。在他那個時代裏，發表講演，出版書籍，件件都得經過官方的許可，他禁止全國人民討論關於俄羅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文章裏不准用「進步」，「爭鬥」，「革命」，「自然力」等等的字面，連農奴制也得叫做「義務的稅」。這種嚴密的防範，愈益擴大了革命的風潮。尼古拉一世的末期，實在是一個光明和黑暗的鬥爭的時期。那局面，是非常混亂的。但奇怪的是：這種防範的方法，後來竟被許多國度裏的統治者所襲用，而我們也正是襲用得「青出於藍」的一個。記得有一個時期，大家不准提到蘇聯，高爾基

不必說了，連托爾斯泰也變成反動派；一篇內容完全相同的文章，題目是一個俄國青年的情書，不能發表，改成了一個意大利青年的情書，卻又可以發表了。「新生案件」發生以後，大家不准談皇帝，即使那所談的是我們自己的皇帝吧，也不許。爲什麼呢？就因爲我們原不過是奴隸的緣故。

然而中國的人民，畢竟也並非個個都是安於做奴隸的腳色，所以也還有抗爭——對於言論和出版的自由的抗爭。

明清兩朝的臥碑，到現在是看不見什麼血迹了，但在那時候，卻的確是箝制言論的利器。牠規定生員們不得建議軍民的利病，不得刊刻所作的文字，那氣焰，並不在尼古拉一世之下，不過明清的士子，還是一樣地要反動。正人君子們的天下，總是無法統一起來。

然而一時之效，卻也偶爾還可以有。大概是去年吧，大家閉緊嘴巴，也真的沉默了好些時，這現象竟使胡適之博士高興得直跳起來，稱之曰「偉大的沉默。」然而

曾幾何時，中國的人民又不能安分了。這並非生性好亂，倒是因為民族已經到了危亡的關頭，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使人民大眾感到了忍無可忍了。

在這樣的時候，統治階級如果不再解除人民的憤怒，給與人民以言論和出版的自由，那就只有自速其滅亡。我們不忘記法律上應得的權利，我們要衝破那張蜘蛛網。法國大革命後人權宣言的第一句說：「人民是生來就自由而平等的。」我們是人，我們要求自由，由爭取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一直到爭取得全民族的解放和自由。

六月九日。

悼念馬克辛·高爾基

一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世界大文豪，新社會的創造和擁護者，出身於勞動階級的作家馬克辛·高爾基，在莫斯科死掉了。這消息一經傳播，就震驚了全世界的勞動者，革命者，以及從事於文學工作的人們，表示着一致的悼惜。有些報紙和期刊，還出了追悼專號，來紀念這位巨人的逝世。

在中國，也並沒有例外。

為文學，為社會，為整個未來的世界，高爾基確曾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也就在這努力裏，顯示了他的崇高的人格。他永遠是弱者，被壓迫者，以及勞動大眾的保護人，不斷地為他們戰鬥着。他把人生看做是一件有意義的東西，而努力於幸福生活的

探求。這樣的人是不會死，而且也不能死的，在人們的心裏——尤其是在未來的勞動大眾的心裏。

但我們終於接到了不幸的消息。

自然，這死掉的不過是他的軀壳，他堅苦的戰績，革命的情緒，却並沒有死，正和他在紀念亨利·巴比塞逝世的文章裏所說的一樣，像他『那樣的人，死的日子，是對他一生偉績的全部評價的開始，同時，也是革命意義的廣泛化和深刻化的開始。』由於這廣泛化和深刻化的演進，世界已經到了革命的前夜。

因此，我們也更加痛惜着這顆巨星的隕落。

一九一七年以前，在沙皇專制淫威的下面，俄羅斯的青年們，把馬克辛·高爾基這一個名字，當作是反抗的象徵，他們跟在後面，一夥一夥地，掙扎，反動，戰鬥，直到搗毀了尼古拉二世的寶位。一九一七年以來，在革命的大纛下，蘇聯的青年們，把馬克辛·高爾基看定是忠實的先進，他們跟在後面，一夥一夥地，改革，建設，創造，一

直到新計劃和新政策的成功。

這成功鼓動了全世界的心，強者和弱者，畏懼和鼓舞，妬忌和慶幸，攻擊和擁護。我們也逃不出這兩面裏的一面。

但在高爾基，是老早就看得非常明白的，遠在十月革命以前，那就是一九〇八年，高爾基發表了一篇關於犬儒主義(On Cynicism)的論文，在那篇文章裏，他已經看出舊勢力的動搖，崩潰，而預言着暴風雨的必然到來，預言着這暴風雨後的光明，燦爛的世界。他的心聯繫着千千萬萬被壓迫者的心，他的脈搏和他們同時在跳動。應該崩潰的是崩潰下去了，應該抬起頭來的，也終於還要抬起頭來。

爲什麼呢？

就因爲馬克辛·高爾基並不是一個空論家，而是一個革命的實踐者，他勇敢地拋棄着舊勢力，用汗和血來爭取被壓迫者的自由。流配，禁錮，鞭撻，他的健康因而毀壞了，然而他還是說：

「到這世界上是來反抗的」

二

先講一點我們自己的事情——

比起舊俄來，中國也實在是一個老大的國家，不但形式上是如此，便是精神上，也顯得更為僵硬，『潮潮的，曖曖的』生活，對於這個民族已經成了習慣，這種習慣不容有改革，也不願見新鮮，即使是小小的變動，也要加以阻撓。譬如吧：男人的蓄短髮，女人的留天足，在現在看來，是平平常常，『嚙哈道理』了，但在二十年前，却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流了多少血汗，這才爭得的。二十年來，我們的遺老，遺少，國粹家，古文家——那些澈頭澈尾的俗物主義者，又何曾放鬆過他們的魔手！五·四文白之戰裏，有許多筆墨，就浪費在『不見經傳』、『數典忘祖』、『不合先王之道』等等的

大道理裏。但是，這真能算得是大道理麼？

回答這問話的，是五·四以後的事實。

但魔手自然也不見得就放鬆，去年的官辦簡體字，今年的民議拉丁化，就都擡在衛道的英雄們的鎗刺上，而遭受了禁止的命運。

這當兒，出現在鎗刺的掩護下的，是『趁哄文化』，『讀經呀！存文呀！本位文化呀！聽是都很好聽的，但比較聰敏的却是後一種，因為牠表面上套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破外套，骨子裏，却還是反對歐化的。他們宣言在眼前的文化裏看不到中國的本位，換一句話說，就是太歐化。

這一點點就要『太』起來，那胃口，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爾基曾經猛烈地和這些本位論者搏戰過。他的論文兩顆心，就是主張俄國的國民應該拋棄東方的宗教要素，而接受西方的科學要素的。他明白地指出了：東方的精神是因循，退縮，妄信，因而也就是神祕，迷信，厭世主義的產生地，但西方的精神却比較積極，『立脚於研究，知識，和活動之上的平等和自由』，這正是走向新文

化去的一條闊大的路途。

而高爾基自己，就正是走過這條路途的。

他在一封叫做給蘇聯底機械的市民們的公開信裏，除了回答了種種質問以外，就揭穿了那些沈溺於傳統的亞洲思想的知識份子們，那些過去的崇拜者，那些草蛇似的人物的卑怯和愚昧。他這樣地寫着：

「你呵！說我在蘇維埃聯邦之中，看不見什麼壞的，黑暗的事物，那是完全不對的。例如，我不是看見你們麼？——簡單地說來，要承認你們是好東西，是辦不到的。你們所寫着的一切東西，在我底心中，除出對於你們的可憐的侮蔑以外，是什麼也不能喚起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高爾基却有着他的堅決的信念，那封公開信的結末說：

「……我的目的常常是一個，而且現在也是一個，就是在人們之中，提高對於生活的意志，提高對於我們從過去承繼下來的現實的積極的憎惡。」

「人類所必要者，是那和他們生活慣了的現實不同的現實。我看見這新的現實底創造過程，在我國，在蘇維埃聯邦，正以可驚的速度在發展；我看見怎樣地有新的精力——勞動階級的精神，正在好好地，創造的地，注進這生活之中去；而且我相信着牠的勝利。

『相信着。爲什麼呢？因爲我知道這勝利的緣故。』

在蘇聯，這勝利是已經證實了。但高爾基的那封公開信，却仍舊有着積極的意義。因爲那尖利的筆鋒，不僅是爲蘇聯，同時也還在爲世界，他所討伐了的，是全世界的機械的市民們。

自然也可以有我們的遺老，遺少，國粹家，古文家在裏面。

這可見地無東西，營壘却大抵都一樣。凡卑劣，即使是躲在陰暗的角子裏，也還是無所逃於前進者的明眼的。

仍舊是一點我們自己的事情——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國，那歷史，是要一直追溯到清朝的中葉的，不過自從蘇聯的五年計劃成功以後，那侵略的工作，也陡的加緊起來，最顯著的是九·一八。不知怎的一來，東三省就從我們的地圖上失了蹤，訪尋的廣告一直貼到日內瓦，結果是毫無下落。又不知怎的一來，熱河就從我們的地圖上失了蹤，訪尋的廣告一直貼到日內瓦，結果是毫無下落。

然而，我們却偏偏要在這「毫無下落」裏翻筋斗。

被這筋斗所翻出來的，是李頓爵士的調查團，要人們連忙請吃中國菜，遛遛西湖，吹吹打打，就這麼的到關外去溜了一轉，寫就報告書，那報告書道：「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如果說得明白一點，那就是：「國際合作以共管中國。」

這正是必然的結果。

但這必然的結果並沒有引起整個的覺悟。在已經失去的土地上，那時候，是義勇軍的抗戰；在行將失去的土地上，那時候，是民衆的請願。而對付這抗戰和請願的，却是屠殺和誣陷。

然而，也還是在那時候，對於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們在中國所造成的白色恐怖，高爾基曾經聯合全世界的進步作家，如法國的巴比塞，伯洛克，德國的卜利威，瑞典的馬爾丁生，蘇聯的法捷也夫，綏拉菲莫維支，潘菲諾夫等等，提出過嚴重的抗議。這抗議歷數着作家，新聞記者們的無辜被殺，揭穿了帝國主義者的面具，而高喊着「中國民衆從國際強盜及其走狗們的鐵蹄下解放出來萬歲！」的口號。

現在，中國的民衆，還是生活在醜惡裏。掙扎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而那個偉大的，關心着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好友，已經和這個世界長辭了。

我們失去了一盞引路的明燈。

在一篇紀念列甯的文章裏，高爾基寫道：

「烏拉及彌爾·列甯死了。就是從敵人的陣營裏，也有人給他以正當的評價了。由於列甯的死，世界失了「現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中的，最活潑的天才的化身」人。德國的有產階級新聞紙布拉蓋爾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列甯的論說，那是全部地充滿了對於這位巨人的敬虔的驚異。那篇文章是這樣地終結了的：「就是在死了之後，列甯都是偉大地，使人覺得難於接近而且可畏的。」

這是真話。由於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的逝世，我們又經驗了一次同樣的情形。在中國，當高爾基死掉的消息傳來以後，他的照片和文字，破例地走到那些一定的刊物上期刊上，被框着黑線而紀念着。民族主義文學家，法西斯蒂的信徒，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們也爲他寫了文章，稱之曰偉大，譽之爲勇敢，好像忘記了高爾

基曾經是他們意志上的敵人，精神上的討伐者了。

這確是高爾基的偉大的地方。

不過稱譽之後，却不料就來了感慨。有一位先生，搖頭擺尾地嘆道：「寫一點冷的雜文，就號稱爲中國的高爾基了……唉，我們的高爾基呢……」

這一問，問得頗有點英雄的氣概，因爲中國的確沒有高爾基。但也就因爲沒有高爾基的緣故，這才使有些人敢於放胆地嚷。倘使真有一個高爾基，那些現在嚷着的，早已化爲警犬，遙釘其後了。他還會有亂嚷的工夫麼？

這好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奴才們的伎倆。

即使是在蘇聯，也不能免。

「全國民的百分之九十九在憎惡你，恐懼你，你沒有知道麼？」有人在給高爾基的信裏，這樣地寫着。倘使這個人也像我們的英雄們一樣賢明，那末，在另一方面，他大概也會嚷着蘇聯沒有巴比塞，沒有特萊賽，而覺得應該嘆氣的。

爲什麼呢？就因爲蘇聯的確沒有巴比塞和特萊賽的緣故。

然而事實上，一個文學家，尤其是一個前進的革命文學家，他的工作應該是世界的，他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地狹窄。所以高爾基的逝世，不僅是蘇聯的損失，而是全世界所有正直的人們的損失，要紀念一個這樣的人，我以爲頂好是用他自己的文章來紀念，我這里且抄上一段：

「勇士的愚行是生的智慧。哦，勇敢的鷹啊！你在和敵人爭鬥的時候流了血了，……可是時候到了，你的一滴滴的血，火花一樣熱的，會在生的黑暗裏迸發了，火焰，來燒旺許多堅強的心裏對自由對光明的渴望！」

「你死了——可是這算得什麼……在勇敢者的歌裏你可以永遠活着，作爲自由的，尋求光明者的象徵！」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

——高爾基鷹之歌 七月二日

雨夜雜寫

—

清朝的禁燬書籍，改竄舊作，那案情，到現在是漸漸地明顯，終而至於大白了，因為有翻印的宋元版本可以做鐵證。但自然，原書失傳，無從查對的，一定還多得，而且有些是被全燬了的，只能在禁書目錄裏挂上一條書名，好像一座沒字碑。

那碑上染滿着新舊的血漬。

不過清帝如乾隆等輩，倘非不得已，是不願意造沒字碑的，他們的偉業是改竄。例如收在四庫全書裏的，就有的。沒字碑不過使作者的思想 and 軀壳一齊淹沒，是近於消極的取消。至於改竄，是要借作者的名聲，替改者說好話，使讀者暗受其影響，看不出底細來。所以這不但是毀屍滅迹，而且還借刀殺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樣，

讓他們進反省院，寫悔過書，從此變成正統。

然後再儲之內廷，頒之江浙，去感化當時以及後世的讀書人。

這叫做「嘉惠士林。」

然而內廷和江浙，其實也還有分別的。大略說來，藏在內廷的，是志在後世，因為牠保存週密；頒諸江浙的，是專為當時，因為牠轉借便利。江浙的士子，要傳鈔秘本，可以向文匯，文宗，文瀾三閣裏去借出來，手續非常簡單；而在京的官員，非但不准攜帶出外，而且所看的還只限於翰林院裏的副本，文淵閣和文源閣裏的正本，倘非必要，或者經過特許，輕易是不容易寓目的。可見四庫全書所要感化的對象，是在野的士子，並非在京的大官。

名利也真像一條鎖，牠鎖住了奴才們的心，連主子也覺得不須去防閑。

不過乾隆的失敗，其實也正在這些「不須防閑」的奴才們的手裏。到了現在，如果有人要做順民，做官方眼裏的正經人，那麼，去檢檢欽定的經史講義，翻翻正派

的唐宋文醇，四庫全書是很不錯的。然而倘要知道一點當時的實情，前人的本來面目，那就無法找出究竟來。這不但因為牠曾經通過獨夫的心，而且還成諸幫閑之手。改竄，刪削，壓抑，在『爭獻殷勤』和『專挑是非』的幫閑們的眼裏，是更無所逃的。然日子一久，幫閑們的技倆逐漸顯著，四庫全書的命運，也就隨着沒落下去了。這真是乾隆及其奴才們所不及料的。

二

乾隆的初意，是想用皇恩來引誘，用嚴刑來威嚇，使天下的藏書者，獻出所有的秘本來，加以檢查。從此詆毀滿清，排斥夷狄的思想，可以一網打盡，使原書無復存留。而經過他所刪改的本子，却盡量給士子以傳鈔的機會，借此流佈開去，一來替自己遮醜，二呢，也要擠沒那萬一倖存的原本。

這設想，頗有點像宋太祖的查禁推背圖。

關於推背圖的被查禁，相台岳肅之的程史裏，記載得很詳細。那查禁的理由，據說因爲是怕牠「惑民志」。這大概並非虛話。五季之亂，亂得真有點一塌糊塗，大家都存了非分之想，「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這就是要做太上皇的證據」。可見也實在惑得利害。岳肅之在說明了「徧名其子」以後，就接着說：「而不知兆昭武革命之烈也。」原來連他自己也被惑在裏面。

而且我還疑心宋太祖也在內。因爲要禁牠，其實也就是怕牠，惑牠的反映。

查禁的起初，辦法大概是很嚴的，但也就因爲辦法嚴，民間藏書又多的緣故，這才弄到誅不勝誅，只得抽亂了一百本，與原本同時流行。次序一亂，時代顛倒，流傳既久，真偽難辨，這就認不出誰是真本來。

這樣一直混亂着。一·二八滬戰的時候，據說出現了推背圖的真本，等到和議告成，香檳喝過，可又無聲無臭了。前些時候，兩廣忽然揭起抗日的旗子來，這使我的一位前輩先生，重又記起了推背圖。有一天，他對我說：「你知道「手執鋼刀九十九，

殺盡胡兒方干休」的意思麼？九十九是百缺一，百缺一明明是白字，應在白崇禧身上，這回該是東洋鬼子的晦氣！我當時唯唯而退。然而會幾何時，看報上的消息，說是兩廣叛亂，即可救平，可見早已以內亂相看待了，而某國却又在這個時候，擴充了華北的駐屯軍。看來胡兒還無法殺盡。因此我頗疑心我的前輩先生的那本推背圖，也並非真本，他其實是上了古人的大當。

未來的事情原是很渺茫的，李淳風自己已經不免飄飄然，加以搗亂，自然就不落痕迹，不着邊際了。然而詩鈔和文集却不然，牠是孤臣的哀號，遺民的憤懣，倘使原本尚在，一經對照，真偽是可以立辨的。何況四庫全書還挂着欽定的招牌，使後世的讀書人，即使不看原本，也還嗅得出血腥來。

三

然而四庫全書不但挂着欽定的招牌，便是刪改和擯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諱

他的給四庫總裁們的諭旨裏，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那一種應該刪改那一種應該釐訂，大都說得很清楚。他似乎並沒有料到他的那些諭旨，在將來，正是自己盜改古書的罪案的證人。

這些證人所常常昭示的，是禁止古人講中國和夷狄，漢滿當然更要忌，爲的是怕牠引起種族糾紛來，影響到滿洲天子的皇位。乾隆的指斥胡中漢的罪狀，至於連南北也不准分提，我頗疑心他有神經衰弱症。其實清朝到了他那時候，前朝遺老，久已物故，漢人也不復思明，天下是早經太平了的。而乾隆却偏要和堂·吉訶德一樣，仗着寶劍去和風車開戰，以自顯其英明。

然而上諭尙存，却的確是一個大療養。

乾隆四十一年，有一道諭旨裏說：

「明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集，卽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

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亦足取爲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

看這語氣，乾隆的亂改字句，不但自以爲寬大，而且是當作恩赦的。譬如關於明臣奏議，叢書集成裏有四十卷，就爲乾隆所敕選，卷首有一道諭旨，意思和上面所引的差不多。所選關於崇禎一朝的，幾乎只賸了幾篇勸皇帝做好人的官話，而那部書的凡例第四條裏，也明白地說：

「明至神宗後，應燬違礙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議頗多剴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以外，正史不及盡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字句稍加節潤，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禩之至意。」

同年還有一道諭旨，說：

「……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刪去。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違礙字樣，固不可存，然只須刪去數卷，或數篇，或改，

定字句，也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刪；涉於詆毀者，自當從改。」

乾隆的所謂義理，未必就是南宋和明初人的義理，也未必就是我們現在的義理，這是一定的。所以悖與不悖，因此也頗難說。他的覺得『自當從刪』或者『自當從改』，不過是自認和金元爲一路，必須替他們出點氣而已。

四

乾隆的出氣主義一直繼續下去，到後來，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個階級裏的，例如漢武帝等，也要爲他們代抱不平了。濟南集裏的『漢徹方秦政』，北史文苑傳敍裏的『頡頏漢徹』，那漢徹兩字，就都被改成了漢武，理由是漢武是振作有爲的皇帝，不得直書其名。可見乾隆的注意點，已經由種族轉到階級，而被他所刪改的，也已經從有意的乖觸，轉到無謂的稱呼了。這種吹求的技術，現在還

偶見於「包打聽」之類的手裏，但在那時候，却的確是統治階級所特有的閑情逸致。

不過這樣的閑情逸致，也並不能支持得多久。乾嘉以後，那些身居言路的士大夫們，就專在淫詞小說上做文章，什麼有傷風化呀！什麼世道人心呀！大家鬧做了一團。同治年間，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奏摺裏，不但把少年浮薄，認爲是受小說的影響，連那時候的「兵戈浩劫」也一齊放在小說的頭上，算作是罪狀之一，而加以禁燬。那些被禁燬的小說，多到二百六十幾種，就可以想見其氣焰之盛了。

丁日昌的奏請禁書，雖然以淫詞爲名目，然而他所禁的，其實並非都是淫詞，例如龍圖公案，水滸，隋唐，北史演義之類，大抵是諷刺官員，攻擊貪污的，這雖然足以增加百姓犯上的勇氣，然而其於風化，却畢竟還是無關的。

借維持風化的名目而實行禁止異己的書籍，就在這時候開了端。而且從此以後，風化這兩個字，被古老們當作法寶，專向青年的頭上擲過去，變成壓迫新學的利器，掩護古董的堡壘了。這情形還影響到後來的文網以外的事情。

五

然而文網以內的，却更不容抱樂觀。辛亥的革命，雖然革去了清鼎，而且對於滿人，大家也的確痛罵了一通，種族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但書籍的禁止，却並沒有因此絕了迹，民四以後，還反而變本加厲起來。

新文學運動的初期，禁書的口實，和清朝又有了不同。那時候的國務會議裏，曾經有過『取締新思想』的議案，牠明白地指出了所要禁的是什麼，不再借風化做幌子，對張三李四了。而且有一個時期，簡直連口實都沒有，就這麼默默地禁去，燬去。使讀者，作者，出版者，大家都有一點『出其不意。』

在這『出其不意』裏被禁燬的，就有胡適文存和自己的園地之類在內。

清末的講究維新的人們，到了五·四時期，有許多早已捧住經書，抱緊孔孟和國故黨打做一路，覺得兒子們的行為，實在看不入眼了。他們所過得慣的，依然是舊

有的環境。歐化太富於洋氣，革命則迹近造反；而況乎女子要參政，學生要罷課，夫妻要離婚；『離經叛道』可惡！『的了呢嗎』可惡！而要消滅這可惡，自然就只有禁止和壓迫，——尤其是那些宣傳新文化的書籍。

所以，新文學初期的禁書，大抵是出於新舊的衝突，除了『新』這一個罪案以外，是別無什麼理由的。

一九一九年，北京國民公報有一篇文章，論新舊的衝突，說：

『今日之新思想，實有一種不可遏抑之潛勢力。必欲逆此勢力而與之抗，徒然增一番新舊之衝突而已。……昧者不察，對於新者，嫉之若仇。果使舊思想在今日有可存之理由，記者亦將是認之。而無如其否也。記者往嘗讀書，常懷一疑問，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許人有是於其間？昔日之帝王實以是術愚民，今而後非其時矣。』

這話是極不錯的，而且也痛快。然而對於後之『帝王』及其奴才們，這希望却

還嫌太高，太樂觀。胡適文存和自己的園地的被禁，就是一個好例。

而且緊跟着這個事實的，我們還有更多的——近於童話的事實，在安徽，有人因爲一瓶紅墨水而被捕，四川曾經鎗斃過讀政治經濟學書的人，魯迅先生的吶喊和郭沫若先生的落葉，都會鬧過命案。至於雜誌書籍的被禁，幾乎每處都有，每月都有，那確數簡直無法舉出來。而五·四時候的戰鬥者，新文學初期的被壓迫者，到現在也走上了老新黨的覆轍。劉半農先生既已禁『密斯』於先，到了最近，胡適之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又在懷疑新文字的推行了。弄來弄去，還是這一套老把戲。

然而這其實是無足怪的日子默默地流過去，時代跟着在轉變，由十九世紀而二十世紀，由帝制而民國，由安逸而危難，由受朝貢而被侵辱。我們的人民大眾，也將由閉塞而開化，由落後而前進，由忍受而怒吼。我願意從文網裏掙扎出來，毫無愛惜地，送這些學者們沒落下去！

八月三日。

釋放四題

一 奴才見識

四週的聲音已經靜寂，夜是漸漸地深了。聽窗外，又瀟瀟地下起雨來，而且還吹着風，坐在當窗的地方，居然有了一點淒冷的感覺，我猛的想法：現在已經是秋天了。

但一般人所標榜的肅殺之感，是沒有的，我並不想做悲秋賦或秋聲賦。不過倒記起了一點閑事：『夫秋，刑官也，』據說民國以前的死罪犯，都是秋後處決的，這叫做『順天時』。現在是不是依舊這樣呢？我不很清楚。然而『天時』大概是還在『順』着的，清明掃墓，聖誕祀孔，對上司打鞠躬，見公帑塞腰袋，一點也不會弄錯。但這些又常常使我忘記現在是民國，每到秋天，總覺得彷彿是殺頭的時候，要替獄裏的囚犯，不平甚而至於捏一把冷汗。

捏一把冷汗，因為我就看到過這事實。

然而今年却有點不同，因為這幾天的報上，就正登着，說是要釋放政治犯了。但只有有功革命者爲限。這所限的，像是一條緊寬帶，可以緊，也可以寬的。牠倒底將是緊呢？寬呢？我不知道。有許多情形，小民是不能知道，而且也不應該知道的，因為這是國家大事呀！

不過釋放大概是還得釋放的，原來這早已被當作一種恩典。統治階級有可慶幸的時候，自己得意之餘，這才想到獄犯，偶然來一次大赦，古已有之了。過去的事證我不想舉，揆以近例，宋哲元將軍的對於北平會考的學生，批了『一榜及第』，就正是因爲自己高興的緣故。如果重叫那些學生做起文章來，第一句一定是：『高興之爲用大矣哉！』但這是我的料想，其實他們早已『一榜及第』，不必再做八股了。

然而倘是獄犯，這就很難說。監獄可以出得來，也仍舊可以進得去的。前年希脫拉先生的誕辰，大赦天下，巴伐里亞的報紙上，說是當地釋放了二千個獄犯，千古盛

事，漪歎休哉！但是，實際上釋放的，却只九十九個人，而且其中的二十五個，第二天又給抓了進去，後來繼續抓進去的，一定還很多。這九十九個人裏面，在今夜，究竟還有幾個人，能夠自由地，望得見這正在下着雨的天空呢？

德國也許並沒有在下雨吧，但是，也一定不會晴朗的。

而我的所以覺得『很難說』，就正是因為這緣故。自從釋放政治犯的消息在報上登出以後，各方面就來了批評，連平日唯唯喏喏的奴才們，也覺得不能緘默，喊喳喳，私議不已。自然，發表出來的，仍舊以歌頌爲多數，但也有撅起了嘴巴，斜視着眼睛，表示着不服的，那宏論道：

『我以爲政治犯和反革命之不可赦，爲天經地義。縱該政治犯及反動派以前確曾盡力過革命，然自一度反動以後，已經自墮其革命偉績，值不得中央去記憶他。我以爲對於這班反動派，只有像蘇俄那樣以快刀斬亂麻的辦法，逮捕不到，下令通緝，逮捕之下，判以極刑，明正典刑……』

我很想喝采，可惜提不高喉嚨。這喝采並非因為他說得有理，或者唱得高聲，使我佩服得感動起來。倒是因為他糊塗。他不但糊塗得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中國的地位，眼前的形勢，而且還曲解了反動的事實。這樣的傢伙我疑心他是閉着眼睛，或者根本就沒有眼睛的，倘使有，大概也只看得見主子的眼角，睫毛一動，就以爲意有所屬，但其實是他自己的瞎想。

倘不瞎想，而又曾經開過眼睛，他不但可以明白眼前的形勢，中國的地位，而且也一定會知道中蘇的所謂反動者，是有着怎樣的不同的。近年以來，中國的大捕反動派，是在九·一八以後，一·二八以後，塘沽協定簽字以後，華北問題發生以後。爲什麼要在那些時候反動？他們所反動的是些什麼呢？有人也許以爲這正是「乘間」搗亂，但我們却可以看出一點基本的精神來，那就是：他們要掙扎！他們不安於做奴隸！

在現實的形勢下，釋放不安於做奴隸的人們，是不應該有什麼條件，也不得有

所謂限止的。釋放政治犯並不是一種恩典，而是一種需要。腐敗的細胞要沒落下去，消滅下去，然而中國是有着她的前途的，她還要靠着健全的細胞來生存，發揚，進展。她要走到一個新的階段去。

二 大國風度

在一篇短文裏，我提到優勝劣敗，以爲人們應該在這塊匾額下求自存。但有人却說這是鼓勵弱肉強食，是大國民的風度。

拿優勝劣敗來替弱肉強食作註解，這是歪曲，是無恥的搬引，和主張反動派應該殺頭，却盲目地引蘇聯以自解，並無不同。那主要的錯誤是不看事實，弱肉強食不但利己，而且還損人，然而優勝劣敗却不是理由呢：牠沒有血盆似的大口。

而且，也沒有所謂大國民的風度。

不過這『有人』倒也說出了一個真實那就是：倘是大國，一定有風度，這風度

是什麼呢？是弱肉強食。在阿比西尼亞人民的血堆裏，我們看見了墨索里尼。在印度人的透盆（Trench）上，我們看見了英國紳士，在東三省人民的掙扎裏，我們看見了日本軍閥，同樣，在囚犯的非刑裏，我們也看見了統治階級。

尤其是上面所提到的希脫拉。

對於釋放獄犯，希脫拉先生不但誣報人數，而且凡是放出去的，一定還要捉回來，讓他們繼續在獄中受苦。國社黨相信監獄裏沒有人類，只有豬羶，傷害獄犯是每一個黨人的天職。這些獄犯每天得和牛尾鞭，木棍，冷水親近幾次，他們大抵被打得糜爛，這才血肉模糊地死去。有一次，一個天主教醫院裏的醫生，接受着一個連肚皮都被打得裂開了的犯人，不及醫治，死了，這醫生看不過去，把犯人的各部分拍了照，送到內閣去，請求設法禁止這種殘酷的行爲。他要做地獄裏的救世主了。然而結果呢？却是連自己也被抓進去，飽嘗了牛尾鞭的滋味。

這是卍字旗下的仁政，是大國的風度。

中國的從前的監獄，牆上大抵畫着一隻虎頭，所以叫做「虎頭牢」，獄門就建築在虎口裏，這是說，一進去，是很難再出來的。德國的監獄裏雖然用種種野蠻的方法來撲滅人類，但是他們是不肯自認，也決不用虎口來形容自己的。國社黨集中營的牆壁上寫道：「各人自己想想吧，爲什麼到這裏來的？」那措詞真好呵！

不料有一個小商人却居然漏了網，逃出了德國，他公開地報告：「我被拘留了二十四天，吃過十七次皮鞭，灌過兩次冷水，上過一次絞架，好幾回失了知覺。但是我天天想着：我是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我想不透。因爲我並沒有犯罪呀！」

這是真話，並沒有犯罪呀！

然而，這個小商人是犯了罪的，因爲他是猶太人。但也不單是猶太人才犯了罪，非德國的，犯罪；皮膚有色的，犯罪；從事文化工作的，犯罪。這些或者被送進監獄，或者被驅逐出國了，總之，是都沒有領略大國風度的資格。記得莉莉·珂貝到上海來的時候，說是近來要在居留在德國境內的作家裏找一篇好小說，必須到集中營裏去

我去。戰爭，挺進隊，恐怖主義，種族的仇視，書籍的焚燬，這說明了德國還賸了些什麼。法西斯蒂國家劇院的總導演說道：『提起文化來我就要抓手槍！』我們也真可以聽見這切齒之聲的。

但是，德國的報紙上，却常常宣稱着大批獄犯的釋放，五百呀！一千呀！一以見法西斯蒂教化的成功，一以見希脫拉大量的寬容。然而事實上，國社黨的處置異端，除了放逐和格殺以外，是別無其他辦法的。這是言行的矛盾麼？是的，但也正是大國的風度。

有世界，現在也一定有大國，而且有大國的風度。我們的也不算小。監獄有的；拘留所有的；皮鞭，鐵槓，火鉗，老虎機，都有的；雖然沒有猶太人，然而却有『想不透』，這『想不透』早已化爲童話，却又真實地反映在L先生的筆下了。這一回的釋放，我希望牠不是德國式，也就是不要太多大國的風度。

三 他們的意見

在全中國一千多所舊式監獄裏，這是其中的一所。

有一天，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值班的看守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胖大漢，愛喝一點酒，今天也許是多喝了幾杯，也許因為天太熱，昨晚晚上不會睡覺吧，他張開着嘴巴，閉着眼睛在打盹。滄滿着油汗的光頭慢慢地垂下去，垂下去，只一頓，又很快地抬了起來，蒼蠅老是喜歡在他的頭上撞。粗大的右手下意識地揮動着，像是在趕蒼蠅，又像是在抹鼻子上的汗珠。

斜對面四號裏的兩個年青犯人，在低聲地談論着，接着是一陣放高了喉嚨的哄笑，看守張開眼睛，瞪了他們一下，立刻又閉上了，打着鼾聲。

四號裏的談話並沒有停止。跟着時間的進行，鼾聲的響亮，他們談話的聲音也高起來。

「媽的，偏他們有家！」一個濃眉毛的，年紀較大的青年說。

「我還聽得一句，說是報上登着，要釋放政治犯呢。」那個面色蒼白的青年接下去。他的舉止比濃眉毛來得文靜，說話的時候，左手撫摩着右手臂上的血痕，一條條都發了紫。

「什麼政治犯，釋放，關我們的屁事！」

說完了話，濃眉毛的視線移上了鐵格窗，當着窗格，外面有一只蜘蛛在織網。

蒼白臉搖了搖頭說：——

「不是這麼講。你打傷了地主，本來不是什麼政治上的事，但他們硬說你是×黨，擾亂治安，有着政治背景，那當然是政治犯了。至於我，因為參加愛國的遊行，大概也是政治犯。對於我們，不能說是毫無關係的。」他說着走了開去，監房裏暫時靜寂着。

「你以為這就可以釋放我們麼？」濃眉毛沈吟起來。

「倘使不是嚷着玩玩，當然得釋放的。」是很堅定的回答。

這出乎意外的希望使濃眉毛變得激動了。他在這個監獄裏已經有一年多，自從來了這個年青的伙伴以後，日子過得一點也不覺得寂寞，而且從他那裏聽得了許多新鮮的事情，學得了許多有用的知識，他再也不想離開這裏了，然而，却偏偏要釋放。

蒼白臉在監房裏踱了個圈子，重又走到濃眉毛的前面，站定了，看着對方的鼻子說——

「好伙伴，現在的田野該是很好玩的吧！釋放以後，我們去騎在小溪邊沿的青草地上，任意眺望着。藍的天，白的雲，自由的鳥兒飛着，多麼好呀！」他抬起頭來望着天花板，彷彿要從那裏找出天空來。

「不！我不想釋放！」

「什麼？」蒼白臉吃驚地叫了一聲。

「我說，我不想釋放，」濃眉毛重復地說，比前更加激動了，「我已經沒有家，沒有自己的土地。爹給地主害死了，妻子被逼跑了，孩子是我自己摔死的。我在外面沒有朋友。有的，都是些迫害我的勢力。我情願在這裏挨藤條，我不想釋放，我到這世界裏幹麼去！」

胸聲瀰漫在整個的監獄裏。

蒼白臉又蹙起步來，跌入了沈思。走到近窗的地方，猛的回過頭來，眼睛朝着地面：

「你的話說得不錯！這真是一個問題。譬如我，因為激於熱忱，去參加遊行，吃盡苦頭，還不是爲的要愛國！我的心不能死，我的血不能冷，幾個月來的牢獄生活，更堅定了我的意志。如果把我釋放了，仍舊不能讓我去參加愛國運動，這釋放對於我有什麼用！恐怕隔不了幾天，我仍舊要被送到這裏來。」

「對！對！有地主在，釋放也是徒然的。」濃眉毛回答。過了一會兒，又握緊了拳頭，

大聲地說：「我要找他去算賬！」

這聲音驚醒了正在瞌睡的看守，他抹了把前額，嘴唇的兩角向下一彎，兩顆桂圓似的眼睛凸出來，向着濃眉毛射過去。

蒼白臉拉了濃眉毛一把，在屋角的地上坐下來，低聲地說：

「伙伴！別這麼興奮了，事情正會變幻哩！等釋放的命令一下，也許會說你不是X X黨，却不過打傷了一個普通人；我呢，不過破壞了馬路行車的秩序，都不是政治犯，不能享受大赦的恩典的。」

四 應該有愛國的自由

且不論政治犯的帽子可以隨時戴上，隨時脫卸，當不得真。即使打傷地主和參加游行的，的確確是政治犯，在目前，也還是不允許釋放的，爲的是他們無功於革命。這無功於革命就絆住了濃眉毛和蒼白臉的腳，絆住了許多政治犯的腳，使他

們見不到天日。

然而無疑地，這是削弱了釋放的意義的。

據一個老於看守生活的人告訴我，近年以來，監獄裏有一個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年青的犯人的激增，這些犯人大抵是情緒熱烈的，有良心，有才幹，都是很好的青年，他們所以進監獄的原因，是爲了政治的苦悶。

他們是沒有罪的。

然而也沒有功。敵人的侵略，漢奸的出賣，已經使全中國的人民有聯合的必要，我們是不能忘記在監獄裏的這一份力量的。所以我說，釋放應該是一種需要，而不是一種恩典。因爲是需要，所以要切實做去；因爲不是恩典，所以要一律看待。不管他有功無功，張三李四，在國家到了危亡的時候，是力量，就應該拉在一條戰線上。

但自然也還得顧到釋放以後的事實。

茅盾先生在給青年作家的公開信裏，有一段說：

「我們可以從另一方面去回答「聯合」起來將如何而「戰」的問題。以爲這應該是要要求愛國的言論自由。這不是創作的問題，因而這是每個愛國的作家立即可以出馬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愛國的言論自由，在有些特殊的地區，簡直還沒有最小限度的愛國的言論自由！充滿了抗敵熱忱的文學作品並不是能夠通行無阻的。在愛國的旗幟下「聯合」起來的作家們應當先爲「愛國的言論自由」而戰。」

這意見是正確的，而且也實在是當前的急務。不過茅盾先生的這封信的對象是青年作家，因而就偏重於作家的任務。在這裏，我以爲應該更擴大，更廣泛地說，我們要爲愛國的自由而戰。我們要有愛國言論自由，也要有愛國的行動——例如集會，遊行等等的自由。

把囚犯從牢獄裏釋放出來，我以爲，這只能算是做到釋放的一半；另一半呢，應該是同時又把他們從愛國——言論和行動——的箝制裏釋放出來。這才可以說

是完成了釋放的使命。

這才可以說是真的把自由還給了獄犯，真的把自由還給了中國的人民。
中國的人民應該是自由的，愛國的。我們要爭取愛國的自由！

窗外的雨愈下愈大了，閃電時時帶來光明的消息。在黑夜裏，我望着天空，希望明天有一個晴朗的日子。

九月二日。

謠言種種

因為翻看着阿Q正傳，我這樣想：倘使當年的阿Q，真的去加入了革命黨，對於未莊，會引起什麼影響呢？一時倒也不容易找出答案來。但自然，這不過是一種設想，如果這設想成了事實，有一點可以預料的，那就是：未莊的人們第一件事是替阿Q找祖墳，找到以後，就互相議論着這風水如何如何地好；或者阿Q是由精怪轉胎的，他的前世是一只大烏龜。再不然，就說阿Q住在土穀祠裏，有一夜下起大雷雨來，半空裏降下一個金甲神，替阿Q換上一副貴骨頭，從此異樣起來。——然而這傳聞的本身，其實也正有點異樣的，因為他不像是事實。

不像是事實，這就大概是謠言，然而倘無這樣的謠言，阿Q就無論如何做不成革命黨，他只得被送往法場去。

謠言也，真像是爬天的雲梯。

而且有些人物還的確由此爬了上去。屋頂上的狐狸，魚肚裏的字條，澤邊的大蛇，古之刁滑者，就正是靠着這些成名起家，甚而至於統治着天下的。因為那謠言證明他們有來歷，借此嚇退敵人，壓服愚民，實在比刀槍兵馬更省事。

然而可惜是謠言。

由謠言起家的，大概也還要因謠言而敗家。這並非善惡的果報，倒是因為看得多了，大家學了樣。『赤帝子』雖然使漢高祖登上龍位，霸佔了四百多年的天下，然而桓靈末世，謠言紛起，『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原也不過是一個謠言，無足輕重的，然而又好像的確斷送了漢家的天下，替劉氏子孫鼓着最後的喪鐘。一面却捧高了另一批人。

謠言也，真像是爬天的雲梯。

然而却又是奴隸們的糧食。他們不但以此自慰，也以此自活的。相傳張獻忠誕

生的那夜，他的後來的塾師，因為在東嶽廟裏避雨，却看見東嶽大帝在請客，爲的是這位煞星要下凡。爲什麼要下凡呢？「奉上帝勅旨，」應「萬民劫數，」正是準備來大殺一番的。這可見浩劫早經註定了，但其實是謠言。而奴隸們却啃住着這謠言，承認了張獻忠的特權，信服了自己的命運。安分地，毫無反抗地，他們活下來了。

這使中國的歷史延長到五千年。

但謠言雖然把奴隸們弄成安分，長壽，却也使他們糊塗，怠惰，依賴。五千年後的現在，時代進展了，而有些人們，受盡壓迫，却還是在望血光，論星宿，等候着「真命天子」的出世。甚焉者還要去上勸進表，但這卻必須是通得文言，懂點法律的人們，這才做得出來的。

然而，這時候卻又罵謠言。

謠言既然可以假作事實來愚民，藉此起家，事實當然也可以混做謠言來蒙民，而且靠這救國了。今之賢明者，大抵都有着這一套：闢謠。協定簽字了，然而當事者說：

是謠言；主權出讓了，然而當事者說是謠言；學生失蹤了，然而當事者說是謠言；上勸進表麼？這當然也是謠言。

我們就大家相信這是謠言。

時間一天一天地流過去，到得後來，來證明這些到底是事實還是謠言的，往往就正是這事實或謠言的本身。

我也真想去找尋阿Q的祖坟去。

九月三日。

私議二章

一

柏拉圖 (Plato) 是有着他的理想上的共和國的，把藝術，財產，公道，婚姻等等想得非常週到，然而我沒有。這似乎可以證明我並不是一個思想家，不配有思想。但是一到空暇的時候，擎着報紙，坐在靠背椅裏，我就也有工夫來亂想一番。自然，亂想決不會想出一個合理的國家來，但却也不至於被那些不合理的誑話所蒙蔽，壓迫和導誘，恫嚇和攜手，瘋狂和正直，這一面的剝削，敲詐，飢餓，黑暗，就正襯出了那一面的飽暖，活潑，自由和光明，我一點也不糊塗。

這是說，我完全沒有失去自己的理智。

阿道爾夫·希脫拉現在是貴爲元首，目空一切了。但在五六年前，其實是很多

顧忌的。那時候，曾經有人稱他爲愚人的領袖，說他和他所領導的，都是些沒有頭腦的人物，當然更談不到思想。希脫拉因此非常生氣，要竭力拉攏有名的學者，來替國社黨解嘲，然而却一點也沒有成功。他的後來的放逐著作家，虐殺文化人，我疑心正是在報私仇，並非真有什麼根本的政策。但自然，殺逐一多，血迹愈明，也就可以算是根本政策了。

以胡鬧爲業績，這正是 *Nazis* 的精神。

而且也就是希脫拉唯一的本領。羅曼·羅蘭在一篇告青年書裏說：「法西斯主義有着許多假面具，他能夠認合各個國民的相貌，可是無論牠戴着怎樣的假面具，牠的實質永遠是一個，這就是：國家主義的強國主義。」這國家主義的強國主義，在希脫拉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提倡人種論，驅逐猶太人，禁止婦女活動，減少學校和圖書館，燒燬書籍，剝削勞工，進兵萊茵區，不可一世！然而却偏要愛護閉口運動，高唱鎗刺和平，他所施行的是愚民政策，所運用的是流氓手段，跳踉胡鬧，「吾道一以貫

之。」

然而倒底還是「貫」不通。

我因此也常常要替希脫拉之流覺得悲哀。因為流氓手段雖然能夠使紳士們狼狽，奏效於一時，但終於只有一時而已，跳踉既久，就必須會弄到連自己的褲子也沒穿，大出其醜的。這一次在紐綸堡的演說，英國方面的反響，便是一個好例子。

然而希脫拉的最大的損失，我以為，並不在於他的不能夠博得紳士們的歡心，而是在於失去了正直的人們的同情。羅曼·羅蘭在另一篇文章裏說：『我所愛護的德意志是那偉大的有着和平公民的國家，那視異族的幸福如自己的幸福，視異族的災禍如自己的災禍，而促進着種族和精神的結合的國家。那個國家是被帶十字徽章的人們所壓倒了，血淹了，弄齷齪了，這些人損失了德國的光榮。我曾反對過一九一八年後使德國受損害的那些不公道處；我曾要求修改那強迫訂結的凡爾賽條約；我曾要求德國和其他各國平權，難道你們設想以為我要求那些，是為的獎

勵那最不公道者，爲的幫助那自己壓倒一切種族的平權和一切人權的德國麼？希脫拉的國家社會主義是真正德意志的仇敵。我向真正的德意志呼籲來反對他！真摯，深刻，正確，羅曼·羅蘭的這些話，將爲全世界的有正義感的人們所擁護，所遵循，尤其是文化工作者。

我把「尤其」兩字加在文化工作者的頭上，不是因爲這發言者——羅曼·羅蘭是一個著作家，而是因爲在國社黨的治下，德意志文化已經受到殘酷的摧毀，已經跌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階段。希脫拉說：「文化的最大的完成，不能仰賴於異族，却要靠我們亞利安人和日耳曼人自己的智力。」又說：「人類一切文化的發揚，是大領袖們的魄力的產物。」但是，誰能相信這位小鬍子的魄力裏，會產生出所謂文化，而這文化又將發揚開去呢？事實上，一九三三年以來，許多文化人被虐殺，被監禁，被驅逐了，這些文化人裏，有相對論的發明者愛因斯坦，有生物學家布朗克，有藝術家萊因哈特，有文學家亨利希·曼，馬利亞·雷馬克，路德維希·雷恩等，這些人

們，是人類中的優秀份子，是德意志文化的推進者，發揚者。陶樂賽·湯卜生女士說：「這些流亡外國的藝術家，著作家和科學家，已經被國社黨開除國籍，失去了德意志公民的資格，但是他們畢生的工作，都浸潤在德意志思想裏，嚴格地說起來，只有他們才配稱為德意志文化的真正代表人。」

這指出了希脫拉的人種論的荒謬，同時也證明了，真能夠發揚德意志文化，真能夠代表德意志文化的人們裏面，並沒有希脫拉在內。

只有驅逐，虐殺，監禁這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的，才的確是這位希脫拉的確是Nazis的黨徒們。

法西主義者常常說，××主義各政黨只知道破壞，這其實是不確的，有蘇聯為證。實際上，Nazis才真是只懂得破壞的政黨。牠用殘酷的手段格殺了前進的人物，摧毀了真正的德意志文化，而自己又至今還沒有拿出嫡系的文化成績來。希脫拉的我的鬥爭一書，雖然也被中國的徒子徒孫們所稱道選為標準書，捧之上天，但

在德國牠的銷售完全是出於強迫的，那淺薄早已爲世人所不齒。至於愛威爾斯（Hans Heinz Ewers），喬斯脫（Hans Jost）之流，壓根兒只能寫幾部下作，要希望他們替Nazis文化打什麼基礎，這好比要抵抗十萬雄師，却拜鼓上蚤時遷爲大元帥，捧着元帥印，仍舊在屋角上探頭探腦，跳來跳去。

我想：無論是誰，是都會料到這結果的糟糕的。

但更其糟糕的是：自從希脫拉柄政以來，德國境內的書店，學校，圖書館，電影院，有許多相繼關閉了。雜誌的銷數也大大地跌下去，跌到半數以下，希脫拉自己主持而出版的內部的德國，是文藝雜誌裏最大的一種，第一期印了二萬部，第二期跌到只印一萬部，第三期再跌到只印六千部，一點一點跌下去，我不知道牠現在跌到怎樣了。因爲這還是兩年前的調查。

然而現在也還有可以調查得出的東西在。轉述費神，不如照抄一段新聞在這裏，那藍本是九月廿七日的立報。

「同盟社特訊自國社黨統制言論後，德國報紙的種數和發行份數都大減。比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得政權前，幾減一半。據柏林市統計局調查：一九二八年僅柏林一市，發行的報章和雜誌共計二千六百三十三種，現在減為一千五百八十四種；日報在一九二八年為百四十七種，後漸次減少，現在僅八十三種；而各報發行份數，也非常減少，合全市八十三種報紙，總數不過一百萬份而已。更可注意的，為全市幾無報版，要臨時買報，很不容易，大抵須直接赴報館購買。」

要買一份報紙，便得跑到報館去，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國度。——但這樣的感覺只限於我們旁觀者。倘在境內，却不免要腳底皮起泡，眼孔裏冒火，化有趣為麻煩了。希脫拉的那張四年期頭的支票，現在已經可以證明，不過是一張隨意濫發的空票子，持着這張空票子的德國人民，等到明白沒有地方可以控訴的時候，就必定會訴諸自己的力量。

我忽然悟到柏拉圖先生的『共和國』並不是只為想想而作的。

堅硬的鐵錘敲在古老的樹幹上，樹皮起了斑點，腐朽的部分瑟瑟地落下來，委在地上，被踐踏在執錘者的腳下了；然而健全的部分，一受到鐵錘，立刻就發生反響，吼出了洪大的聲音。爲自己——或者更確當地說，爲整個樹身的生存而抗爭。

一接觸到現實，個人主義是無法存在的。

卽如上面說過的柏拉圖共和國 (Plato's Republic) 吧，原不過是作者的烏托邦，但牠的影響及於後世，却也發生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不只是精神上的逃世地了。前些時候，有人告訴我，某雜誌出了一個北平特輯。這好比接到一個躺在醫院裏大病着的朋友的來信，我當時非常高興，連忙去買來看時，卻原來藏在裏面的，並非報告病狀的書信，却是宣傳福音的教義。喝豆汁，吊嗓子，上稷園品茶，到天橋拆字，往廣和樓捧角，太平盛世，猶歎休哉！

是的，這些「獐麝休哉」也許會引起人們對於北平的懷念，但是，比起柏拉圖的共和國——這簡直是藥方了——來，究竟算得什麼呢？

而且北平也的確並不只這些。牠曾經是敵人慾壑裏的自由市，學者幻想裏的文化城，長官計劃裏的游覽區；牠雖然有太監，有小腳，有官僚氣，有「瑟瑟地落下來」的腐朽的部分，」但却也有血，有肉，有聲音，有爲着整個民族的生存的抗爭。

有了後者，這才覺得瑣瑣屑屑的不夠。

然而，也就在這瑣瑣屑屑的福音裏，我找到了知堂先生，他告訴我們北平的好處，和對於眼前的北平的感情，他說：「現在不但不是國都，而且還變了邊塞，但是我們也能愛邊塞，所以對於北平仍是喜歡。小孩們坐慣的破椅子被決定將丟在門外，落在打小鼓的手裏，然而小孩的捨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這段話會被編輯先生引在後記裏，用以自況，可見是十分重要的了。實際上，恐怕也真是比較重要的幾句。除了老舍先生的眼淚，果軒先生的感嘆，曾經爲着這古城的末日的命運而

嘆息，此外，就只有知堂先生的這種「小孩的捨不得之情」了。邊塞的號角，終於吹入了苦雨齋，打動了這古井似的心情，使我們的苦雨翁也無法「靜坐讀書」，保持其老人「應有」的態度，而發起「小孩」似的「胡鬧」的脾氣來。

但我並不「驚異」。我相信：一接觸到現實，個人主義是無法存在的。

不過知堂先生的比喻，却有着不很貼切的地方。由我看來，北平雖然「變了邊塞」，却畢竟還不是「破椅子」；雖然「將丟在門外」，也不全是由於自己的「決定」；雖然將落在別人「手裏」，這別人又決不是「打小鼓的」。問題並不這樣簡單，也並不這樣輕鬆。

然而這却確是知堂先生的說法，因為他正在「小孩」似的依戀着呀！

我因此又想起另外一件事來——記得日本的議員三上參次，在貴族院裏演說到中國的國號，道是：「中國妄自尊大，僭稱中華民國，而我方竟以中華呼之，冒瀆我國之尊嚴，莫此為甚！後應改稱支那，以正其名。」云云。這演說也會使知堂先生

覺得忿忿然，寫了一篇文章，斥之曰「老人的胡鬧」和他這一次的「小孩的捨不得之情」並列起來，是可以相映成趣的。

知堂先生的指責三上參次的「不甘寂寞，趨時投機，自忘其醜」對於斯地斯人，實在很切當。但他又引了兼好法師的「徒然草，芭蕉的閉關舞，傅青主的筆記，來證明老人的應該『讀書靜坐』，『隨緣隨盡，聽其自然』却頗有點傷了『小孩』的天真了。他說：

「……這裡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鬧並不一定在守舊。實在却是在維新。蓋老不安分重在投機趨時，不管所擁戴的是新舊左右，若只因其新興有勢力而擁戴之，則等是投機趨時，一樣的可笑，如三上棄自由主義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論雖似轉舊，其行爲則是趨新也。」

其實正因爲以思想論是轉舊，合了三上這樣老人的脾胃，這才趕緊搗毀了自由主義的堡壘，而投入法西斯主義的潮流的，他其實何曾要趨新。章太炎先生不也贊

成過新生活運動麼？白話一寫成語錄，就頗爲老先生們所喜歡，也正是因爲這緣故。

於此可見三上之流的『老悖』那原因並不在趨新，而是在戀舊。這只要看看法西主義的不能拉攏新人物，只收羅了一些舊東西，就可以明白了。知堂先生的文章，是歪曲了事實的，他大概急於要替戀舊的人們做辯護，這才攻擊維新者。其實老年人和年青的站在一起，趨時維新，是一種好現象。這樣的老人，如果生在強國裏，就決不會發侮辱鄰邦的謬論；反之，生在弱小民族裏，也一定會肩起苦難的責任，不至於去躲在齋頭，玩骨董，喝苦茶，專講閒適的，他還要明事理，辨是非。

爲什麼呢？就因爲事實決定了這些。

十幾年前，周作人先生在一篇短文裏說：

「近來有一羣守舊的新學者，常拿了新文學家的「發揮個性，注重創造」的話做擋牌，以爲他們不應該「而對於爲文言者仇讎視之」這意思似乎和我所說的寬容有點相像。但其實是全不相干的。寬容者對於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

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為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的勢力所能干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正如壯年人的聽任青年的活動。」

這末後的『正如』實在『正如』得恰到好處。無論壯年人或老年人，對於青年的活動，是都應該寬容的。但自然也應該加以批評，使他們不致跌入外新內舊，借屍還魂，例如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泥淖裏去。至於年齡，大可不加限制，無論青年老年，倘要生存，就必須有鬥爭，知堂先生斥三上爲『胡鬧』，其實三上的『鬧』並不錯，錯的是他的『胡』不分皂白，把老人的活動一律斥之爲胡鬧，這本身也正是一種胡鬧。

在年齡裏埋下了冷嘲，他必須會變成真實的新興流派的暗殺者。

近年以來，在中國，復古的招牌一塊一塊豎起來，孔，孟，關，岳，讀經掃墓，都已紅極一時；文壇上的大小學者們，不論作文做人，都想逼近明末，因為他們要戀舊而掩護着這戀舊的，也正是一個『老』字。

不幸北平又偏是養老的所在。

這就無怪乎青年們的血，要被古物，平劇，風土，廟會，豆汁之類所掩蔽了。太老和太少的成績，如此如此，我幾時才真能從知堂先生的身上，找到一點『中庸之道』呢？

十月六日。

紀念魯迅先生

朋友們，把我們的痛苦，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尊敬，集中在一塊吧！不論人們用着怎樣的榮譽來表彰這位偉人……但最美麗，最神聖的墳墓，却在我們的心頭。

——羅曼·羅蘭：和高爾基告別

高爾基在提到俄羅斯的灰色的大衆的時候，他這樣說：——

「他們裏面有許多人做着十年以後人生會怎樣愉快的美夢，但從沒有人問一問自己，如果我們只是做夢，倒底有誰來使人生愉快呢。」

我也是一個善於做夢的人，許多年來，看慣了卑污，欺詐，威脅，殘殺，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怎樣醜惡的社會裏，那結果，就不免常常有憤世的想頭。然而我畢竟並非佛子，還不能「超凡入聖」，又不是莊生，也無法做到「唯無是非觀」的境界，我分明

的感到這眼前的現實的醜惡，爲了要暫時擺脫那苦悶，於是乎就做夢。

不過這夢却做得比俄羅斯的灰色的大眾還低能。我覺得：倘使要中國好起來，使她的人民有比較像樣的生活可過，十年是決計不夠的。所以我的夢常常拖到二十年後，三十年後……一個悠長的時期裏。這樣好像就虛無起來了，但我仍舊相信：有一天，愉快的日子終會到來的。

至於到底是誰來使人生愉快呢，我却一向沒有想到。及等讀了魯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先生通信的機會，以至面領先生的教誨以後，這才漸漸地把這種虛無的思想克服過去了。因爲我在他那裏領會到真摯的感情，和忠實於自己的希望的努力。倒底有誰來使人生愉快的問題，不但就此想到，而且也立刻解決了。答案只是一個：從那時起，我也知道隨時努力於自己的夢想的實現，不再一味做去了。

這以後，我的匕首和投鎗，就有了目標。

我和魯迅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自由談投稿以後了。從一九三三年的夏天起，我隨時寫些短文，投到那時候的申報自由談去，文章是並不一律的，但大抵以抒情和記事爲多數，起初似乎很太平，然而華自由作，後來竟也寫些感想，發點議論，由此鬧出亂子來。因爲那時候，魯迅先生用筆名在自由談上寫稿，大家都知道，但終於不知道他化的是什麼名。我的名字，自由談以外，是不常見的，因爲寫得並不多。於是那些所謂「看文章專用嗅覺」的文豪們，就疑神疑鬼，妄加猜測起來。他們在我的文章裏嗅到一點異端氣，却向魯迅先生「嗚嗚不已」，在那時候的青光和晨曠上，大排叭兒陣，表面上是圍剿我的，骨子裏却暗暗地指着魯迅先生，大有刀口兩面磨之勢，糾紛由我而起，想起來，常常不免於歉然。

但我並不認識魯迅先生，只得由他去。

這時候，小報上可就熱鬧起來了，有的說我不是魯迅，有的說我終於還是魯迅，真是議論紛紛。爲了避免使別人蒙不白之冤，我就用了一個比較固定的筆名，但有

人說：這也是魯迅。直到如今，施蛰存先生還不肯相信天地間有我這麼一個人存在，這對於我，真有一點『和尚在此，我却何往』之感了。

但我其實並沒有跑掉，可疑的倒是那些文豪們的嗅覺。

大概是因爲自由談不是同人刊物，投稿者缺少碰面的機會吧，到得第二年的年初，編輯先生願意掏腰包，請大家敍一敍，約了幾個人，除去兩位太太外，其餘都是經常的寫稿者了。坐下來，恰好滿滿的一桌。

那一天，我到得不算遲，但先我而去的，連主人已經有五個了，魯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互通姓名以後，他笑着說：

「你做文章，我挨罵！」

接着就談到叭兒們的陣容，怎樣談法呢，現在記不清楚了。但即使記得清，我想，也還是不說的好。這並非因爲『叭兒今已化騰蛇』應該省事，倒是爲了記憶已經零落，長此掇拾，不免把思緒攪亂，我將只有沈痛，寫不出文章了。

然而無論如何，魯迅先生的簡短有力的言語，即使到了現在，也還時時在我的耳邊浮動，不易於忘却。早些時候的革命文學家，喜歡把他畫成冷酷，今之隱士，又怪他多疑而易怒，好像一輩子不容易親近。這其實是不確的。和魯迅先生在一起，我從來不發生什麼壓迫之感，也沒有惶悚的心情。正相反，向他不但可以請教學術上的問題，也不妨談談私事，我覺得：長者的教導和儕輩的熱情，是匯集在他的一身的。

那次吃飯，雖然有幾個是初次碰面，但也有他的老朋友在座，所以他談得很多。到了現在，這一桌裏的人，有的提倡過幽默，到西洋去著書了；有的做過官，上東洋去講學了；有的在繙譯；有的在弄古書；有的並無爭執，却默默地疎遠起來；有的雖經論爭，却仍在同一目標下努力。而最可哀痛的是：我們竟失去了大家一致敬愛着的魯迅先生，回想起來，又豈僅一點感慨而已。

凡是接近過魯迅先生的人，一定會神往於他的對工作的認真，和那種偉大的

爲人的精神的吧。他總是那樣地積極的，「夢着將來，而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抱了非常堅決的自信。他不但自信，而且也信着中國的大衆。他說：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一類的人們，就是現在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爲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在這樣堅強的自信力下，中國正在製造着自己的前途。

日本的報紙上，登着魯迅先生的談話，一談到中國的前途，他好像總是悲觀的，這給了周作人先生很深的印象，到得現在，終於把魯迅先生判定爲「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了。據我看來，這一轉，是莫須有的。魯迅先生相信着自己，相信着中國的大衆，那信念，永不動搖。只有對於另一羣人，對於在這另一羣人手裏的

中國的前途，他才是一個絕對的悲觀論者。他看清楚了：「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對「荒淫與無恥」抱悲觀，是一種自信。

魯迅先生的偉大，就建立在這種自信力的上面。他不爬上去幫兇，也不躺下來裝死，不投降，不妥協，一枝「金不換」，掃蕩了黑暗的一切，直到臨死以前，還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戰鬥的提示。

至少，近十年來，他是一點也沒有虛無主義的傾向的。

不過在文學上，周作人先生說他長於整理，却還不算「立異」，「異」的是只提這一點。

魯迅先生長於創作，有吶喊，彷徨等書爲證，是事實；長於繙釋，有死魂靈和他的對於繙釋的意見爲證，是事實；長於整理，有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以及在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和尚未付印的古小說鈎沈等書爲證，也是事實。凡事實，雖有參差，

却決非愛憎所能掩。

古小說鈎沈尙未出版，我們看不見，且不提吧。卽就已經出版的幾種而論，有見解，有系統，有虛心的探求，十分謹嚴。他從來不肯把古書當爛膏藥，像那些搬運家一樣，在自己的文章裏胡貼一陣。「夜讀」既不亂「抄」，「風雨」尤忌瞎「談」，他有的是銳利的眼光，認真的精神。

誰說他不長於整理！

然而魯迅先生整理古書，却不會被古書所整理。

有一次，他對我說：「弄古書，要沒有道學氣，以避免迂闊和拘泥；但也絕對不宜有才子氣。」

過了一會，又微微地嘆息着說：

「要那樣，卽使求之今人，也是很難得的。」

對於他的話，我並沒有深思。因為我正神往於他談話的姿勢，那種嚴肅而又誠摯的態度。我想：倘使他有閒，又高興談，即使接連着談幾個通宵，也不會使人厭倦的。

「費點工夫，你可以整理出一部文網史來的吧？」

我吃了一驚。那雙灼爍的眼睛注視着我，在等待着回答。我只得囁嚅着說：「這，我的能力怕夠不上！環境是一種阻礙，而且對於古書，我不過隨便翻翻，從來不打算在這上面用大氣力！」

「隨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須不隨便亂寫！」

他想着，把手裏的煙頭拋掉了，嚴肅地說：「是的，還是多看一點外國書，對於你，這是更爲有益的！」

叫我多看一點外國書，也並非不經思索的敷衍。

前年秋天，我在有一封寫給他的信裏，說自己很願意學學日文，借此可以多看看

一點書，並作繙譯時候的參照，請他給我介紹幾本日文的學習書。回信來了，他勸我劃出三四年工夫來，先學日文，其間也帶學一點俄文，並且不要間斷。他又告訴我日本繙譯界的情形，和學習日文所必須知道的幾點，那時候，他正生着病，在發熱。

過了幾天，內山書店關於日文書籍的目錄寄來了，書名上面加着箭頭的，是書店老闆的推薦，他就在所推薦的書裏挑了五本，我當時因為一次買不起，就自己選買了兩本。但後來讀的，却並不就是這兩本。

而且一共也只讀了兩個月書。

兩個月後，我的學日文計劃失敗了，其中的緣故很多，一時說不清。但魯迅先生仍舊給我鼓勵，勸我自修，不要間斷。我又終於間斷了，而且還索性完全放棄牠。所以放棄的緣故也很多，一時說不清。但我得承認一句，艱難猶如鋼鐵，只有奮鬥的火力可以溶化牠。然而我沒有，我因此更其想念魯迅先生了。

這以後，有許多日子不會碰到他。也沒有通信。

直到今年春天，因為往江灣路去找一個朋友，回來的時候，才又在一個地方碰到他。他的臉色很顛悴，有咳嗽，但說話還是那麼地有風趣，使人失笑，又促人深思。

我們坐下來，談着閒天，自然，這閒天總離不了文壇。正如某先生所說，魯迅先生在私談裏，也常用有趣的比喻，來臧否人物的，但即使是否吧，他也總留着餘地，寄托着希望。說他對同一陣營裏的人會『格殺勿論』，是誣陷。被魯迅先生『格殺勿論』的，必須是無可救藥的昏蛋。

「叫他屈服，要不然，就消滅他！」

當我問起他的健康的時候，他嘆息着說：

「我想做的事情多得很，但現在，也要為體力所限了。」

沈默了片刻，他問我道：

「你前回說的那一段事，有沒有把牠寫成文章的意思？」

「有是有的，但我現在還不能寫。」我說着，又反問：「你以為很可以寫下來麼？」
「可以寫。但其實也平常，在中國，這一類事情太多了。」

他的臉色有點悽苦，像是在回憶。

「寫了出來，是諷刺。也就因此，檢查老爺要把我的名字從中國驅除。但是，這却是一件頗爲費力的工作。」

說到末一句，他笑了。

這半年來，我因爲囿於人事，沒有去訪問過魯迅先生，對於他的病，也只能寫幾封信去問候，今年六月三日，是他病勢轉劇的時候，他在來信裏說：「我病加重，連字也不會寫了，但也許就會好起來。」

是的，誰不希望他好起來呢？

而他也終於好起來了。不料噩耗就跟在這「好起來」的後面：他終於渡不過

一九三六——這可詛咒的一年！大戰正待爆發，而我們已經失去了兩個最正直的，最愛和平的巨人。

這悲痛是世界的！

十年以前，魯迅先生反封建，反道學，反開倒車，進攻改良主義，進攻一切舊堡壘；十年以來，魯迅先生反帝，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掃蕩了幫閒藝術家，民族主義文學家，給新文學開闢了一條闊大的道路，替中國語文作了一次基本的改革，同時也爲民族革命戰爭留下有益的提示，撫育了堅強的實力。他才真是新中國的奠基者。

對於他的死，大衆的損失，遠過於個人的哀痛了。

然而魯迅先生的精神是不會消失的。死亡的對於戰士，是空漠；但對於活着的同伴，却是一種激勵。從此以後，愛先生的人，將會更愛先生之所愛，而更惡先生之所惡的吧。後死者的肩上，重起來了。

十一月一日。

關於「一柱樓詩」獄

我曾經借乾隆的上諭，談過胡中藻詩獄的成因，淺陋粗率，在所不免，這回又想談談「一柱樓詩」獄了。清代文字獄檔案關於徐述夔案件的記載，我沒有見到。現在所談的，是根據幾本私人的筆記。個人的見聞有限，而短文又不便於多所引證，那淺陋和粗率，當然還是不免的。

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人，乾隆戊午科舉人，著有一柱樓詩六卷，一柱樓小題詩一卷，和陶詩一卷，學庸講義一卷，選卷堂雜著一卷，想貽瑣筆二卷，論語摘要二卷。前四種於乾隆二十八年，由他的兒子徐懷祖刊刻行世，後三種則抄存家內，到得四十年案發後，就先後繳呈，加以銷燬了。他生前大概很服膺呂晚村，受其影響甚深。這證以後來審理這案件的大臣們的奏摺，說是：「此案已死之徐述夔，身爲本朝舉人，

編造詩集講義等書，敢將逆犯呂留良業經銷毀邪說，引爲宗據，已屬悖逆不法。云云，就可以確定了。足見那裏面很有一點激烈的排滿思想。就事論事，在清朝許多文字獄裏，一柱樓詩獄可以算是一件較有事實，而又並不十分冤枉的案子。

至於這案子的起因，據同一奏摺——大學士阿桂等奏會訊徐述夔案分別擬議摺裏說：

「徐懷祖前經置買同縣蔡嘉樹堂弟蔡耘田地數頃，契價銀二千四百兩，迨其身故之後，蔡嘉樹因地內葬有伊祖墳墓，於四十二年冬間，欲用銀九百六十兩贖回，向徐懷祖之子徐食田講說不允，隨經訐訟。維時該縣先已遵旨出示，查繳違礙書籍，本年四月初間，徐食田聽聞蔡嘉樹因伊不允贖地，欲將伊祖刊板書中違礙之處控告，該犯隨於初六日，將已刻各書並板片在縣呈繳，該縣涂耀龍當卽批候閱示。至初九日，蔡嘉樹亦將一柱樓詩等書並沈德潛所作徐述夔傳在縣呈首，其呈內聲稱：恐有違礙，未將語句摘出。該縣因見傳內稱其一柱樓詩集業已付梓，

並列有徐述夔所著未刻書名，而徐食田所繳已刻之書，尙未全備，於十一日出票指名傳繳，徐食田復於十六日將其未刻抄本三種繳縣，批候解局……」

豪紳們的田地糾紛，往往就成了蕩產殺頭的導火綫，這一回，也還是如此的。縣官批令徐食田撥給蔡嘉樹墓田十畝，本來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了。而蔡嘉樹忽然研究起徐食田繳書的日子來。被他打聽着的，偏偏不是第一次——初六——的日子，而是補繳——十六——的日子，於是他認爲徐食田自首在自己告發以後，縣官受賄，改告爲首，有意替徐食田開脫。就把一柱樓詩裏悖逆的句子摘出來，告到江甯藩司衙門裏去。藩司幕友陸琰，在呈詞後面批了：「與爾何干！」飭發揚州府謝啓昆，行提卷犯查審，又在行文裏批着：「搜羅書籍，原爲明末國初，有著作悖謬，詩章諷刺，實有違礙者，俱應收解奏繳。至講論經傳文章，發爲歌吟篇什，如只有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悖逆實迹者，將首舉之人，卽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條。倘係蔡嘉樹挾嫌，妄行指摘，思圖傾陷，亦卽嚴訊擬議。」等話，這時候，一柱樓詩集等書，已經由東台

縣解呈江甯書局，但因為沒有粘簽，又發回該縣加簽去了。關於陸琰批詞的經過，和江甯書局的內幕，可以看江甯布政司陶易的供詞，據供：

「江蘇省辦理收繳遺書的事，原在江甯設一總局，派委略曉文義的屬員數員，在局司事。遇各州縣繳到書籍，彙成數千部，送我衙門，轉呈總督核辦。至此次東台縣稟送徐食田呈繳伊祖的書本，我因正值天旱求雨，所以縣稟及一柱樓詩等書，實在不會寓目，即經局員擬批發縣加簽。迨六月中，蔡嘉樹到我衙門控告，我幕友陸琰就批發揚州府查辦。並於書辦催稿內，添加傾陷反坐的話。我也不會細看，就畫行批發了。及至學政劉墉參奏後，我從徐州查災回來，檢閱文稿，就對幕友說：文書辦得大錯了。他說：會奉過聖旨，自首免罪，此書徐食田繳在先，蔡嘉樹又來告他，這樣批也不算大錯。我說：到底是錯了……」

徐食田繳書在先，東台縣沒有改告爲首，這是事實；但繳書在先還不能叨沐「自首免罪」的皇恩，却也是事實。因為乾隆朝對於繳呈違礙書籍的規定，自首固

可免罪，知人欲告而自首，是只准減罪，却不准免罪的。徐食田自首的日子，距蔡嘉樹告發只有三天，河水已混，無論如何也洗不乾淨這祖遺的罪狀了。陸琰的所謂「奉過旨意，自首免罪，在這裡已不適用；不過他的批令揚州府嚴訊，」倘係挾嫌，即以所誣之罪反坐，」由我看來，還不失爲持平之論，不過這持平之論放在乾隆御用的天平秤上，就不免顯出偏徇來，這也是必然的。

一柱樓諸書除了引用呂留良的「邪說」以外，被認爲最悖逆的，是他自己的詩裏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這兩句。此外被指摘的，還有：「莫教流下土，久已混蒼薰；」「螫龍竟誰從；」「重明敢謂天無意；」「市朝雖亂山林治；」「江北久無乾淨土；」「陪髮非今制，無爲詔獨清；」「不知警蹕清塵日，可有情形觸屬車；」「乾坤何處可爲家；」「舊日天心原夢夢，近來世事益非非」等句，這裏面有明顯，有隱晦，有事實，有羅織，可就不能一概而論了。但最有趣的，是列名校對的徐首髮和沈成濯兩人的名字，據那些審判老爺的意思，以爲兩人「命名之義，均毫無情

理，而四字連屬，則係隱刺本朝薙髮之制，『所以就等於「植黨狂悖，尤爲可恨」了。現在再看這兩人的供詞：

「徐首髮供：因初生時髮長，乳名髮兒。九歲從徐述夔讀書，爲之取名首髮，並告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故字爲受之。曾聞徐述夔言：本朝剃頭，不如明朝不剃好看。且自稱其學如在明朝，可與唐荊州董思白相仿，如今人看不出來的話。至後只從他讀了兩年書，後來即另從師，改名首發，應試入學，現有學冊可查的。又據沈成濯供：幼時從徐述夔讀書，爲之取名。並聽見徐述夔說過明朝有頭髮，如今剃了頭，就是濯濯的意思。並據各供：校書名字，係徐述夔故後，伊子徐懷祖刻書時，自行列入。」

供詞裏面，有些話的出於牽扯，是一看就可以明白的。這和如今的犯人聲言在捕房裏的口供，是迫於環境，不得不招，有同樣的隱痛。卽就徐述夔的替他們命名而論吧，雖像出於故意，却也算不了諷刺，更當不起造反。然而結果呢，不但首髮成濯，連

腦袋也一齊搬家了。

既不留髮，又不留頭，這才真是亡國者的好榜樣。

一柱樓詩獄的結局，徐述夔徐懷祖父子已死，照凌遲律，剝屍梟首；正犯之孫徐食田徐食書，斬立決，親屬連坐；校對徐首髮，沈成濯，藩司陶易，幕友陸琰，斬立決；爲和陶詩作跋的毛澄卽黃斌，杖一百，流三千里；知府謝啓昆發往軍臺效力；知縣涂耀龍杖一百，徒二年；沈德潛撤出鄉賢祠，革去官銜謚典，仆毀御賜碑文。後來除了所有「斬立決」改爲「監斬候，秋後處決」外，是別無什麼變動的。至於原告蔡嘉樹，却一無所得，倘非「皇上」特別開恩，險些兒也被誅了「早屬知情，不卽舉首，及因爭訟田土，挾嫌告發」之罪了。

豪紳們常常有一種夢想，以爲借別人的手來壓倒對方，自己就可以出頭。所以他們利於爲奴才，也利於爲漢奸。然而，因清朝文字獄而流的血，畢竟浸漬了志士的雄心，淹沒了滿洲的天下了。告訐之風未歇，志士之血不乾，這是值得深思的。

十一月廿五日。

盛世的悲哀

因爲翻看關於徐述夔一柱樓詩獄的文獻，却找出另一件案子來，那就是所謂殷寶山案。這案件比徐述夔的詩獄發生得早半個月，但比起徐案來，那情節，却細小得多了，就是在清朝許多文字獄裏，也還是不很重要的一件。

但雖不重要，却也是大官們借此博取辦事幹練的名聲的好材料，據江蘇學政劉墉的奏摺，敘述那經過說：

「臣在金壇辦理試務，有丹徒縣生員殷寶山，當堂投遞一紙，題曰：「芻蕘之獻。」極言江南省風俗，人心，官常，學校之壞，甚屬狂悖。當即拿交府縣收禁。卽其中搜出詩文兩本，除鄙俚不通外，內有「記夢」一篇，語句荒唐，心事曖昧，應行究訊。現在移知督撫辦理。並將作序加批之人究出，一併訊辦……」

記得王先生曾經說過：奴隸是只准奉行，却不許言議的。清朝的那些主子們，手裏施行着愚民政策，嘴裏却總是「一視同仁」，「愛民如子」——這些爲漢人所服膺的古訓；但倘有人真以爲「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討好去，那就一定要大上其當了。我看這殷寶山也正是上當的一個。他指摘時弊，而又自稱曰「芻蕘之獻」，足見並無惡意，遠非會靜舉發雍正的九大罪狀可比。「極言江南省風俗，人心，官常，學校之壞」，他一定自以爲非常忠心，當堂遞呈，正是想藉此進身，要叨沐「皇上」的殊恩，由奴隸升到奴才去的。然而結果却特別壞。下面是乾隆對於這「芻蕘之獻」的批評：

「殷寶山所呈「芻蕘之獻」，深誣士習，民風，吏弊，竟以爲耳聞目見，無一而可，其人必非安分守法之徒……」

乾隆的諭旨裏，還指出殷寶山所做岫亭草裏的一篇「記夢」裏面有：「若姓氏物之紅色者是。夫色之紅，非卽姓之紅也。紅乃朱也。」這幾句，以爲「該犯自高會

以來，即爲本朝臣民，食毛踐土，乃敢繫懷故國，其心實屬叛逆，」於是乎就「罪不容誅」了。一提到朱字，就會是「指稱勝國之姓，」就會是「繫念故國，」就會是「罪不容誅，」這實在批派得離奇。但由我看來，乾隆所恨的，大半還是那「芻蕘之獻。」爲的是：這芻蕘竟敢「無一而可。」

清朝到了乾隆的時候，是十分鼎盛的。所謂「景運龐洪，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代同堂，」因此他也自以爲是一個了不得的皇帝。在有着了不得的皇帝的盛世裏，當然不能有稅政，既然沒有稅政，就不該「耳聞目見無一而可」了。倘竟要「無一而可，」這就必須是「叛逆，」「罪不容誅」的。

於是乎殷寶山的罪案就坐實了。

奴才做不成功，這真是大悲哀。但殷寶山的失着，是失在遲生了些時，——或者竟是早生了些時——他如果生在吳三桂引兵入關，洪承疇認賊作父的時候，清室的專制權柄尚未在握，他又真能通文言，懂法律，那就只須上一道勸進表，聲言擁護

專制政體，則法制委員會主席之類的肥缺，豈不到手了麼？

然而他畢竟生在號稱鼎盛的乾隆的時代裏，奴才做不成功，真是盛世的悲哀。——但這悲哀是屬於想由奴隸爬到奴才去的人們的。除了這一類人以外，則即使「幸」逢亂世，也只有流血而已。

十一月廿六日。

隨思錄

把五·四文學運動的源流，一直追尋到明末的「公安」和「竟陵」這是雅人們的特權，惟有他們才看得到，說得出的。俗人們就不作如此想。但也並非昧於往古，他們不但知道明末，也知道明末以後的清朝，清朝——這却是一個大反動的時期。

說是反動，就因為斷送了明末的學風，化通脫爲凝練，返空疏於樸實，排除心靈，專研經學了。「公安」「竟陵」的文學，早已掃蕩無餘。倘說五·四的新文學運動是發源於明末的，經過這一個反動期，豈不是變成斷根蘿蔔了麼？

斷了根，也就是絕了源，年代一久，因緣漸少。倘還要硬認三袁鍾譚爲祖宗，這就是牽扯。

由牽扯而成的是泥淖，更不是什麼源流。

有人把清朝的學術思想，劃分爲三個時期：一、明學反動期；二、清學全盛期；三、西洋文化輸入期。想起來，是不錯的，但這三期裏，以末一期去今最近，因其影響而引起

的變化，也最大。

新文學運動自從發動以來，引起了不少反對，至今還有人在打噎，咽不下去。所以使這些人咽不下去的，究竟是因爲牠古化，還是因爲他歐化呢？倘是後者，這就不難找出源流來。

但請千萬不要有「古」癖，不然，就會想起馬哥·李羅來，連這歐化也會扯到元明去。

然而古法也有可以翻新的，「披沙尋金」主要的是在於能選擇。

兩年前，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的時事類編上，登過一篇由張仲實先生翻譯，蘇聯文學顧問會的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那裏面，講到詩的作法說：

「在地方報紙或小刊物的時論欄裏，我們可以看到有這樣的語句：『我們施行徹底的和平政策，但我們受內戰和帝國主義干涉的經驗，定要鞏固我們的國防，練習精確的射擊，在要緊的當兒，不空耗一彈。』」

詩人阿塞葉夫 (N. Asseyev) 把這相同的意思和情緒，表現如下

「我們不願發動決鬥，

但是我們記着柏列柯浦，

總是保存着鐵箍，

來對付白的頭顱。」

同樣的事，在阿氏說來，更覺流暢，清楚，明白，熱烈，動人。阿氏的話極其和諧雋逸，竟成了一首很流行的歌。

問題在那兒呢？這兩個引證的意思是不是一樣呢？是的，是同樣的。

不過，第一個引證，說得乾燥呆板；第二個引證把口號譯成藝術描摹的語言，有音韻，有節奏罷了……」

信裏又把上面所引的兩段東西，逐句加以分析比較，指出不同的地方來。隨後，又將詩人馬雅柯夫斯基（W. Mayakovsky）寫葉塞寧哀悼詩的經過抄下來，使初學寫作者能夠看到那推敲的苦心，一面又從旁加以指點，切實明瞭的，確比『創作講座』、『小說作法』之類，來得更為易懂，有益。可惜目前的中國，並沒有這樣的教材。提拔新作家是一句口號，永遠掛在先進者的口頭，却從來不見有切實的提拔的辦法，——我這裡說提拔，是含有培植的意義的，僅僅在刊物上給無名作家以發表作品的機會，算不得是提拔。

但我的所以說古法還可以翻新，却是因為在古之上海文人的手裏，倒曾經有過這樣的教材。十年前，現在已經搖身一變而為實業家，但那時候却還在弄筆桿的

天虛我生先生，印過一部文苑導遊錄，一共十冊，每冊前面有一篇社說，等於現在的講座，是專談創作的方法的；後面分駢文，散文，詩，詞，筆記，小說等門類，彙收着由他改定的學生們的稿件，以及他們的原作，使讀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先後的不同處來。此外還有和學生們討論創作的通信，以及自己的近作，等等。

這方法很切實，而且有益，是可以學取的。現在雖然有不少以提拔新作家自命的刊物出現，却還沒有成名作家肯在自己的作品後面，同時也印上這作品的未定稿，使人們看得見那增刪修改。因此也終於沒有這樣的教材。

這里我又想到批評界，還想說幾句。

我們的過去的批評界，似乎很熱心於理論和原則的搬取，却缺少對於某一作品的具體的分析和批評，因此就往往落入空泛，使讀者只聽見名詞，却不了了於這名詞實際的含義。用幾十萬言來說明什麼是寫實主義，還不如選幾篇寫實的小說，

加以分析，指點，批判，對於作者和讀者，同樣是更爲有益的。

我這樣說，並沒有輕視理論和原則的意思。但理論總不能夠離開實踐——實際的應用。

在今日，連前進的創作家們也在聯合起來，嘲笑所謂批評家，這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批評家們替自己安排下的泥淖。

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不但是應該互相尊敬，而且也應該互相了解的，這裡需要的是聯繫。但據說近來的『好現象』：是作家們都離開了『理論家』和『批評家』，集在一堆，大罵不已了。於是就有人說：『這是『批評家和作家』的關係之間很大的進步的好現象。』

但是，『進步』得奇怪，『好』得神妙！

即使所說的批評家和理論家，都是打了括弧的，確要不得的吧，然而要使『現

象』『好』起來，我想：也還得做一點超乎『離棄』和『大罵』以上的工作。

中國的大多數的民衆，因為教育不普及的緣故，常常是比較落後的。五·四以來的新文藝，不會顧慮到這一點，所以一直沒有能夠流佈到他們的隊伍裏去。到了現在，爭取落後的羣衆，應該是新文藝作家們的當前的急務了。

而實踐這當前的急務的，是通俗化運動。

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作家們總不願意自己的作品，只在少數的讀者中間流通，而失去更多更大的影響的。中國的史丹特爾 (Stendhal) 一看見自己的作品不能暢銷，就不免有『命運』『寂寞』的感嘆。但寫起文章來，不管是『差不多』，差得多，却又一齊向艱深的一面走，決不肯引用口語，講究通俗的。

艱深像一道鐵柵，使羣衆和作者隔離，這樣，『命運』大概是還要『寂寞』下去的。

關於實施通俗化，有人主張少用新名詞；更有人主張排除歐化，以為『一個民族的文藝，總是被壓在外來的影響下，是創造不出獨立的民族的文藝的。不能成爲獨立的民族的文藝，是斷不會接近那個民族的真實的大衆的。』

我同意『少用』說，却反對絕斷不用。我想爲了使中國語的文法更趨精確起見，用幾個『對於』、『××地』、『決不過分』爲了使大衆明白他們的時代裏的實際情形起見，用幾個『毒瓦斯』、『電流』之類，也不算過分。世界上的確有那樣的東西。但要少用，慢慢地增加，而且要給以註解。遷就大衆的口語，目的是在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因此也要增加他們必需的語彙。用幾個歐化的語法，名詞，與民族的獨立無關，與『獨立的民族的文藝』更無關。

不過，用中文寫商籟 (Sonnet)，跟王爾德 (O. Wilde) 學唯美主義，却是應該趕緊排除的，這不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大衆的需要。

大國度裏有大國民，也有大話家，有「專務其大」的論者。一個筋斗翻到十萬八千里，這是中國的俚談，然而也是古訓。今之博士，對於所謂抵抗的計劃，一開口就是五十年，嚇得死人。文壇上的寫商籟體，學王爾德，是「古」癖，也是「大」癡。

現實主義的創作，不壞；蕭伯納，威爾斯，羅曼·羅蘭，不壞。但倘要學取，却必需挑選到十九世紀的王爾德，游離了現實的唯美主義，古典主義。爲什麼呢？除去一切物質的條件和意識的關係外，其中有一個原因：不學則已，一學，就學到那些「不壞」們的祖宗，所以，更不壞。

但這是有「古」癖和「大」癡的學者們的見解。是一個笑話。對於認真的讀者，我願意告訴他們：倘不是畸形，沒有一個子孫，會比他的祖宗們更壞的。

十二月廿五日。

我淌着冷汗

元旦前四五天，一家相熟的書店，送了一份日曆來，這日曆是陰陽合刊的，紙版上面還有人物畫，印得頗爲精緻。聽說立報正在舉行日曆展覽會，不知道裏面有沒有這一份？倘使有的，又不知道輿論怎樣？至於我自己，收到以後，看了一看，就放在旁邊，丟開了。心裏却不舒服起來，彷彿受着壓迫似的。

爲什麼呢？我不明白。現在想起來了，是爲着紙版上面的畫圖。

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喜歡運用歐化語法的，一定是西崽，不配談文學，以近來文苑的氣焰而論，有這樣嚴厲的規定，是可能的。好比上海租界上的公園，禁止「中國人與狗入內」一樣，同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傑作。但是到了現在，只就公園裏已經有了中國人這一點看來，我想，文苑裏恐怕也終於不免有西崽，不過他們並不熱

心於歐化，爲了滿足洋主子的好奇心，倒往往是道地的國粹家。比如吧，那家送我日曆的書店，就是專賣西書的，這和做西崽的比起來，雖有貧富之分，却並無高下之別。然而贊成陰曆，不必說了，便是印在日曆上面的畫圖，也都經過細心的挑選：歌德，托爾斯泰的肖像，反動派，不好；凡奈斯，亞普羅的玉照，有傷風化，也不好；最好的是我們自己的祖宗，固有的道德。

然而我的所以感到不舒服，却並非爲此。印在那張紙版上面的，是一個古裝的讀書人，正在鋤地，地上有一堆被掘出來的金色的元寶，旁邊站着一個懷抱嬰兒的女人；那神情，不喜不悲，十分『叵測』。我也並非以爲讀書人不該發橫財，例如掘地得金，買中航空獎券之類。然而我總覺得不舒服，那原因，是因爲由於畫裏的題識，我明白這所畫的，就是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埋兒。

我知道古人之中，有這麼一位郭巨先生，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候，還在故鄉的高等小學堂裏念書，因爲愛玩成性的緣故，常常在課堂裏做歪詩，印寫小

說書的繡像，照上海文壇上那些『隔岸』吶喊的志士們說起來，實在不很正經，但我自己似乎並沒有這樣的顧慮。可喜的是一到了歲尾年頭的時候，總可以得到許多好玩的東西，最爲我所欣賞的是年畫，竈君門神的臉孔看厭了，就只買那些專門畫給孩子們閱覽的一種，這裏面有故事，而且還可以鋪開白紙，慢慢地臨摹起來。自然，這不是名家的手筆，也不像北平王麻子所作的那樣，能爲雅人所熟知，然而我還是愛好，佩服，勤於學習。其中就有二十四孝圖。

然而因此也就有反感。當我看到郭巨埋兒的時候，就十分驚異於這位父親的殘忍。但是，我得老實招認一下，天理國法之類的感想，委實一點也沒有，我只覺得這故事不大好。第一：我的爹娘並不殘忍；第二：從來不知道做人家的兒子，竟還有被埋的義務。因而不免懷疑起來，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又恐怕竟有這樣的事情。於是乎就反對，發生惡感，變成『激烈派』了。

及等看到新文學的書籍以後，才又知道在我以前，早已有人反對過，我並不是

一個「創作」家。「好語往往前人說盡」這真是一種悲哀。但一面也高興於自己的不孤寂，原來遠在清朝，早已有了同志了。我於是又樂觀起來，以為從專制到民國，從封建到革命，時代已經前進，郭巨先生的法寶，早已失去效力，為大家所唾棄了，然而不幸的是，竟事事出於意外。

這是說，我的樂觀的肥皂泡，立刻就破碎了，但也不單是因為這一份日曆。雖然這日曆上面印着郭巨先生的事蹟，廣告似的宣傳開去，也一樣使我悲憤。然而我更覺得悲憤的，是許多在無形中活埋着兒子輩的事實：教科書修改了，但並非因為這教材已經過時；給孩子們看的書報出版了，但並非因為要增進兒童的知識；電影廣告上的「小童擋駕」是在說明這影片的淫豔，特別適合於大人們的胃口；工廠裏的招收學徒，是要不出代價，而榨取孩子們的血汗；至於每到亂離的時候，那就更像變戲法的離不開小孩子一樣，必須把青年們教訓一頓，或者亂殺一陣。但自然，一面也總在稱道他們，說他們是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真將成為未來的主人翁麼？我於聯

大着自己的眼睛之餘，每一沈思，往往就不免於淪冷汗。

舉一個現成的例證，今天立報上就有宋雲彬先生的一篇短文，敘事是真實的，裏面有這樣的文字：

「我不幸已經做了父親，並且我的兒子已經在中學校裏念書了，去年魯迅先生逝世的時候，我正在家生小病，他從學校裏回來，我對他說：『魯迅是值得我們崇拜的，我明天想去送葬，可惜在生病。』到了魯迅先生下葬的那一天，我的病還沒有好，而他居然借同了三四個同學從江灣跑到萬國公墓去送葬，也許他們是看熱鬧去的，我也未加深究；但我並不會覺得他們去送葬是錯的。

「過了幾時，他忽然對我說：『爸爸，我懊悔去送魯迅的葬。魯迅原來只會罵人，並沒有什麼學問的，他這次突然死去，原因是窮得沒辦法，問人家借錢被拒絕了，一氣氣死的。』我沒有話可以回答他，只好反問他道，『誰這樣對你說的？』他傲岸地回答道：『先生說的！』

「又過了幾天，他突然責問我道：『爸爸，你常常說什麼帝國主義，你可知道白帝和赤帝的分別麼？我們以前被赤帝奪去了外蒙古，後來又被白帝奪去了東北四省，所以我們應該先打倒赤帝，再和白帝算賬。』我知道這一番話又是先生對他說的不必再問，只好對他苦笑……」

我淌着冷汗，覺得這樣的手段，實在比郭巨先生還要卑劣！那位中學校裏的「先生」雖然也在熱心地掘着泥坑，活埋後一代，但我斷定他決計掘不出黃金來。爲了使明天的中國能夠光明點，我也不同意宋雲彬先生的辦法。宋先生說：「現在要我們做父親的『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倒還願意，但『寬闊光明的地方』在那裏？即使我們知道有寬闊光明的去處，也不敢指示給他們，怕的是他們沒有到達那去處，已被塞進狹窄黑暗的場所了，此後，不但不能『幸福的度日』，怕連合理的鬼都做不成？而況現在負有教育青年責任的『先生』們，正在努力把許多『黑暗的閘門』重新裝起來，我們要肩也不勝其肩，這有什麼辦法

呢？『辦法是有的，而且只有一個。那就是仍舊把『黑暗的關門』肩起來仍舊指示給他們『光明的去處』，即使走不到，或者因此爲黑暗所吞沒，也不管。『合理』的人做不成，『合理的鬼』也不希罕做。這才真是郭巨先生的兒子輩的出路。

時光也真過得快，一轉眼，我自己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擠入爸爸輩了。雖然窮困，但把他們埋掉的心思，是一點也沒有的。而且我將和一切企圖活埋他們的惡勢力搏鬥，不能讓他們去做黑暗的扈從！我熱望着：在我的兒子輩的世界裏，將不會再有郭巨型的爸爸，也不會再有替郭巨先生做廣告的日曆，雖然我現在還在淌着冷汗。

一月廿五日。

愷撒和羣衆

我曾經看過『僑蘇外工出版聯合社』出版的却派耶夫的英譯本，也會經看過由這書的原本改編而成的，中文名字譯爲夏伯陽的電影。這故事所給我的印象，前後兩次，是一致的：我驚異於表現在這史實裏的羣衆的力量，覺得他們懂利害，明是非，有着確切的取捨，決不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愚昧。而且我因此還想到古今中外的羣衆，其實也並不一定愚昧的。某先生看了莎士比亞的愷撒傳，就恍然於羣衆的『盲目』，『沒有理性』，並且由此決定自己『還需要一點做人的經驗』，這是過去的話柄了。時隔三年，現在是不是有了那樣的『經驗』？我不知道。然而，莎士比亞所描寫的古代羅馬的羣衆，雖然愚昧，其實是有理性的，他們也要認一認是非和利害，並不盲目。不過因爲處身在黑暗裏，雖然開着眼睛，也仍舊一無所見而已。某

先生只注意羣衆的五官，却忘記了愷撒的時代了。

然而，文章的重心，却並不在此。他還要比中國於羅馬，「痛心」現在，「痛心」
「近幾百年來，」「鷄來迎鷄，狗來迎狗」式的羣衆。「愚昧，」「盲目，」「沒有理
性，」易被「煽動，」當然還是免不了的罪名。但是，我因此又想：某先生是忘記了現
實的情形，忘記了愷撒式的制度所給予羣衆的壓制了。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多的先
天的低能兒。

便是在古代的羅馬，也沒有。

愛好自由，憎惡帝制的羅馬公民，在愷撒的治下，一批一批地被殺戮，被監禁，被
驅逐了，終於只賸下一些灰色的，不敢有什麼希望的奴隸。因此，愷撒的背後，有着輔
翼他的野心的軍隊；元老院裏的共和黨，却連一個後盾也沒有。這不是偶然的。對着
關在籠子裏的禽鳥嘆氣，怪牠們不能遠飛的人們，是冷笑羣衆愚昧者的典型。

然而冷笑家以外，世上也還有熱心的志士。

紀元前四十四年，愷撒在元老院裏的仇敵龐倍（Pompey the Great）的雕像腳下，被刺殞命了。莎士比亞用着寫實的筆調，卓越的藝術手腕，描寫出這個不可一世的英豪的末路，當勃魯脫司（Marcus Brutus）跟着卡司卡（Cassius）把刺刀戳過去時，愷撒驚異地喊：

「什麼，勃魯脫司，你也如此？那就讓我死吧！」

愷撒死了，羅馬的子民們重複有了自由和光明。不料在幾千年後的現在，愷撒式的制度却又復活過來，墨索里尼不是要重建一個羅馬帝國麼？倘說二十世紀的意大利人民都是「鷄來迎鷄，狗來迎狗」的羣衆，我決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中國只有這樣的羣衆。

卽就近事而論，關外的義勇軍的抗戰，國內的學生工人的救亡，充分表示着中

國羣衆的有理性，不昧於是非。不過在客觀環境的限制下，有時不免消沈，這並非他們本性的愚昧。

契訶夫筆下的俄羅斯的羣衆，不論屬於那一個階級，總是灰暗而沒有前途的，但是，一出現在福門諾夫和綏拉菲莫維支的書裏，卻又十分活躍了。綏拉菲莫維支爲鐵流中譯本所做的序文裏，說到那些「襤褸的，赤足的，飢餓的」民衆，參加革命時的狼狽情形，接着就說：

「可是，當他們經過了難堪的艱苦，經過了殘酷的鬥爭以後，他們鍛鍊出了驚人的組織力，驚人的紀律性，和深刻的了解，只有用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才能從死的重圍裏脫出來，才能得到未來的優美的生活。他們於是擊破了敵人，同蘇維埃的主力軍聯合到一起了。」

這才是羣衆的真實的影子。時代進展着，二十世紀的蘇聯的羣衆，畢竟不同於羅馬帝國了，然而又豈僅蘇聯而已。

一月廿六日。

關於歐化

林琴南先生的介紹西洋文學，那精神，是值得佩服的。然而他的認司各脫（W. Scott）的文章裏有史記筆法，却終於不免是一個笑話。近幾年來，從事翻譯的人一多，文學的譯語也漸漸地精密起來，但還沒有能夠打消那些鄙薄歐化者的口氣。一提到翻譯的時候，總還是誣蔑：或曰崇洋，或曰西崽，或曰奴化，或曰買辦心理，堆堆都是垃圾。我疑心他們真要回到周秦以前去，從此變成「自大」狂。幸而到了最近，論調却似乎顯出輕重來，二月二十日的青光上，有一篇題作小問題的文章，那裏面說：「無論何國的語言文字，外來語的引用是免不了的；例如一切新發明的機械名稱和專門術語。但外來文法或風格的引用並非免不了的，更非必須的。Radio與Telephone是世界通用的名詞，但英文的文法與風格決非世界通用的。」

文法與風格

『……………』

『可怪的是：現代一般青年不會見到這些簡單的事實；他們甚至盲目地引用外來文法和外來風格。引用的時候既非因為本國文無法表白某種抽象的理論，也不是因為他所引用的外來文法或風格能夠加強他的表現力。更可怪的是：這種引用時常出現於最時髦的文字中，而這外來的文法或風格，又是他們稱爲「我們的敵人」的文法和風格。

『這是一個「哀莫大於心死」的問題。』

哀莫大於心死，「問題」實在並不「小」。但採用外來的文法和風格，據我所知，是要取其長處，來補救自己，那出處的爲友爲敵，其實是儘可不管的。倘使發明電燈的和鎗礮的竟是「我們的敵人」，難道也主張不得採用，而情願在菜油燈下舞槍弄棒，或者赤手空拳的站在黑黢黢的地方，專等着敵人的來襲擊麼？倘非必不得

已，我看是沒有這樣的傻子的。中國語文上的所謂歐化，是想增進語言的表現力量，使其更趨於充實和豐富，所以要博採衆長，既無友敵之分，也不限於「英文」——至今並無主張單單引用英文的文法和風格的人。所謂「英文的文法與風格決非世界通用的文法與風格」，是毫無對象的夢囈。

而且，作者以爲「機械名稱和專門術語」的引用是免不了的，但外來的文法和風格，却並非必需。這其實也是夢囈。歐化的句法，初看起來，好像是通俗化的對頭，但這並不是絕對的；有些地方弛反而可以使文意或語意更爲顯明，有裨於讀者的理解。舉一個例，作爲語言學家的林語堂先生，是也反對歐化的，他曾經說：

「……今日寫作之人……通篇文句，做倣西洋，無一句像中國話，名爲前進摩登，實則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做英文之受動語氣，——林先生竟至於不敢說被動語氣，有趣得很——「競爭市場」曰「競爭着市場」，做英文之分詞體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做英文之狀詞語尾，

「人」曰「人們」做英文之單複分別……」

「底的」少用，因而也好像難懂，但「玻璃被打破」的對於「玻璃打破」，「競爭市場」的對於「競爭市場」，「人們」的對於「人」，究竟那一種切於實際，易於了解呢？林語堂先生雖然斥爲食「洋不化」，但我以爲，即使站在通俗化的立場上說起來，這幾個歐化語法的引用，也是必需的。

這實在太出於小問題一文的作者的意外了。而可怪的是，作者雖然承認「機械名稱和專門術語」的引用的「免不了」，但一面仍舊不服氣，所以又說：

「然而即使是外來語的接受也是有限制的，因爲語言文字有一種特殊的彈性：除了迫不得已的時候，它還是要把外來語在它的模型裏重鑄一過的。就是無可改造的地名，在有些國家的文字中還要塗上一層本地風光的色彩。例如倫敦 (London) 在法文裏變做龍特爾 (Londres)，巴黎 (Paris) 在意大利文裏變做巴黎琪 (Parigi)，照時行的說法，還可說是語言文字的天然防禦力。」

「因此，中國文字雖在近六十年中容納了不少的外來語，但 Radio 並未照讀音稱爲雷電華，而稱爲無線電，德律風三字在上海人口中也慢慢地變成電話。」

我且不舉英文的 America 一字在法文爲 Amerique，英文的 Shanghai 在法文爲 Changhai 那樣字母遷就發音的例子，卽就模型這一點說，「雷電華」的對於 Radio 不是也早已經過方塊字這個模型了麼？而且在發音上也略有不同。照小問題作者的意見說來，這里也早已有了「語言文字的天然防禦力」了，爲什麼又作別論，以爲不如「無線電」呢？

思益堂日札裏記清朝道光年間福建提督達洪阿和台灣觀察姚石甫所做的關於英國的圖說，那開首說：

「英吉利國又稱英機黎，或作膺吃黎氏，通稱紅毛。在大海極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國都名蘭鄰，北枕大山，名哀隣。隔海而南，與賀蘭，佛蘭西，大呂宋鄰近，相去皆

千餘里；又有咪利堅，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約萬餘里，國皆強大，不相統屬……』

這里面的譯名，有的準確，有的錯亂，但現在大抵都蛻變了。卽就 London 而論，改『蘭鄰』爲『倫敦』也就頗爲不壞，牠足以粉碎那些捧住 Londres 而沾沾自喜者的口實。

其實語言文字的演變，決不像某些個人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一國的語言文字，雖然大部份由於本國的遺傳，却隨時受着生活習尚所改造，和外來語的影響，單語一經引用，語法也往往起了變化，這是自然演變的結果，既沒有什麼政治陰謀，也無關於世道人心。盲目地搬取固然不足爲訓，但不管清紅皂白，一律加以排斥，却有點神經衰弱，我看這倒是『心死』的候補者。

二月二十日。

「提起時代」

要「莎士比亞化」，不要把主角變成時代的傳聲筒，而要具體地描寫現實。

——卡爾·給拉薩爾的信。

自從烟之先生在大公報文藝欄裏提出了反「差不多」的口號以後，文壇上又熱鬧起來了，北平和上海的有些報紙上，還曾經出過專頁，「京」「海」兩派的角色，一齊登了台，生丑互見，悲喜雜呈，一時也真不容易看出結論來。但有一點却是明白的：對於清算公式主義的原則，已經得到彼此之間的承認，現存的爭執，不過是對於這病症的看法，和牠的所以形成的原由。烟之先生的意見，是把病根推在作家們的「關心時代」上，而一面又把這「關心」只往壞處想，「趕逐風氣」，「媚悅流俗」，「憑脊髓在反應某種活動」，一句話：趨時。

據說這「趨時」就造成了「差不多」的現象。

這現象是不是存在的呢？參加論爭的人們都說是存在的。我看事實也的確是如此。短短的十幾年來，文壇上每有花樣，也總有沉滓。趁隊起哄，大喊大叫，等到風頭一過，烟消雲散，什麼都還依舊：「說來差不多」就此結束。三角戀愛小說流行了，凡小說，篇篇都是三角；方塊詩流行了，凡新詩，首首都是方塊；「革命的尾巴主義」一經罵掉，代之而起的，是所謂感覺主義派的「啦啦體」；前年幽默尚未去世的時候，又何曾不紅極一時；而現在呢，則又成了「慷慨派」的天下，其言曰：「國難嚴重，再等不及洗鍊我們的筆，我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真是威武得很！但這是在學時髦，並非『記住時代』，『時代』向前進行着，而他們却一個個腐爛了。」

真能「記住時代」的人們，是不會腐爛的。

普式庚逝世一百年了，而全世界還在熱烈地紀念他，爲什麼呢？爲了他以自己的自由思想，勇敢地向現狀挑戰，暴露了沙皇治下的污迹，「記住時代」巴爾札克

是法國十九世紀的保王主義者，他的作品，却爲二十世紀的青年們所愛讀，爲什麼呢？爲了他看出了當時法國上流社會的醜態，而無情地描寫了出來，替他們唱着輓歌，『記住時代；』日本作家長谷川如是閑在提到契訶夫的時候，他這樣說：『他（契訶夫）一方面既重負着爲自己時代之科學者兼善良的市民之責任，而他方面在其藝術上又透澈當時俄羅斯社會各方面的客觀的真實，所以他自身一方面完成了時代之健全的市民部分，而他方面在藝術上又得顯示當時俄羅斯的全貌。』這樣的藝術是不朽的，但也因爲『記住時代。』

自然，一面也沒有忘記藝術。

烟之先生看出了『差不多』的現象，却錯怪了『時代。』因此他所想出來的補救的辦法，也不免落了空。其實呢，『時代』畢竟是還不該忘却的。便是『顯揚幽隱，宏獎乖僻』也還得從是非和好壞做起。世上固然也有因爲別人都吃富於滋養的食品，爲了立異，自己就發誓要吃毒菌的怪人。然而這是怪人，要不然，也一定是滑

人，並無「獨立識見」可言，是不足爲訓的。

清算公式主義的大路，我想只有加緊生活的體驗這一條。烟之先生的煩惱，如果真是「焦灼於時代束縛了獨特的個性」，那末，該是十足地「紀德式」的了。羅曼·羅蘭在批評蘇聯文學的缺點的時候，也曾經指出過：蘇聯的作家們因爲參加客觀的大衆活動，因而在作品裏缺少情緒和思想的澈底處理，缺少作家的獨創性。他由衷地指出了：蘇聯的作家們應該追隨莎士比亞或者愛斯凱羅斯的路途，將夢和行動連結起來。這雖然是蘇聯的事情，而且也不免有「轉販」之嫌，但因爲牠的正確，畢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第諾莫夫在一篇批評高爾基的戲劇葉戈爾·布萊權夫的文章裏，以爲高爾基所會的藝術手法，是實行「莎士比亞化」的。他不用希勒的描寫方法，因爲「希勒用現成的思想上的結構，用這個無危險的而對於有些戲劇家是危險的扣針去扣緊典型，結果是把思想拘泥於現成的方式中，就是說拘泥於空洞的典型的方式

中。」第諾莫夫又說：「高爾基善於將實際的這些推動力應用於心理方面，應用於思想方面，這些推動力就不僅成爲外界的推動力，而且也成爲內部的推動力。這里內外是一致的。這里，心理，意識都成爲環境的反映。」

內外一致，這說明了「藝術」固然不能「忘了」而「時代」是也還得「記住」的。作家們不應該僅僅把自己的作品當作時代的傳聲筒，或者時代的攝影機，却應該具體地描寫這一時代裏的現實，而使夢和行動連接起來。

這倒也可以免除刻板的公式主義的弊病，而應該成爲作家間創作的基本信條的。

三月十五日。

性愛和文學

性愛在藝術裏所佔據的地位，正和牠在人生裏一樣，是十分廣闊的。無論那一個國家，或者那一個時代裏的文學，總是或多或少地，描寫着牠。因此也常常引起拘謹之士的不滿，而構成了所謂「妨礙風化」的罪案。新近的例子，則有愛爾蘭小說家赫克狄等四部小說被禁的事情。某報上的一張文藝週刊，報告了我們如下的消息：

「愛爾蘭文壇素來多事，今年春天又有四本新刊小說遭了文網，受到禁止發賣的處分，原因是內容有不乾淨的嫌疑。這四本小說都是名家之作，一本是赫克狄的「綠獅」，一本是格拉克的「克西耳的唱歌人」，一本是俄法朗的「孤鳥」，一本是康拉絲的「山景」。據「綠獅」的著者赫克狄說，依他個人的觀察，這四部小說的禁止，雖然在愛爾蘭的銷路完全停滯，但這幾位作家本人對於這

事都處之淡然，倒是愛爾蘭的智識份子對於這事已紛紛作不平之鳴。許多大學教授已向法院最高當局請求開禁。這事到最近已有新發展，因為檢查委員有一位忽然出缺，接任的費龍，是一位戲劇家，而且又是筆會的會員，這是稀有的遭遇。想來對於這幾本小說該有一種新處置吧？」

誠如這消息所說，愛爾蘭的文壇，一向是多事的。在那里，對於性愛描寫的取締，真是嚴厲之至。伯納·蕭的華倫夫人的職業，詹姆斯·喬易斯的猶力西斯 (Ulysses)，韋爾斯的恩·凡羅維卡 (Ann Verovica) 都會被指為淫書，而遭禁止。連大家認做是英國國寶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在愛爾蘭清教徒的眼裏，也變成是有毒的了。他們慨嘆着世風的不古，而神往于維多利亞時代禁慾的偉業，隨時隨地，總想盡着自己的力量，把歷史拉回去。

但自然，這是並不可能的。

卡爾浮登 (V. F. Calverton) 在他的現代文學裏性的解放裏說：

「今日描寫性慾的淫恣，不是使人驚奇，也不是使人悲痛。私生子，雜交，巴黎賤女的午夜狂慾，地窖裏的淫聲怪響，在現代小說裏，早已見慣了，現代婦女穿着長不掩膝的衣服，蹣跚於通衢之中，如果給維多利亞時代的純謹之士見了，將會非常地驚奇的吧。這種對於性的新態度新倫理的傾向，都是舊倫理和舊社會的崩潰的證據。」

這說得很好。簡要地傳達了今日小說裏性慾描寫的社會的根據。凡寫實，雖有選擇，然而卻並無避忌。性愛的描寫，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要打破資產階級的傳統思想，而建立起新的倫理來。但自然，唯性交是趨，非戀愛不寫的小說商，却是應該趕緊排除的。

這也正是一種選擇。

現在歐洲的文壇上，比較有名的作家，除了上面說過的以外，還有勞倫司（D. H. Lawrence），卡柏爾（J. B. Cabell），德爾（F. Dell），德萊塞（T. Dreiser）。

安得生 (S. Anderson) 們，都會犯過所謂『妨礙風化』的罪名，而受到了猛烈的攻擊。至於那些較早的作品，如盧騷的讖梅錄，波迦西奧 (Boccaccio) 的十日談 (The Decameron)，奧維德 (Ovid) 的愛經 (Ars Amandi) 等等，因為有了介紹和繙譯，早已爲我們所熟知了，自然，那些繙譯過來的，大抵都並不完全。

有許多所謂淫書的英譯本，凡是猥褻的地方，是都印着原文的，這是比較聰敏的辦法。最惡劣的是刪節，例如阿爾志跋綏夫的沙寧吧，俄文原本的第四十一章裏，有着這樣的文字：

「第一剎那間顯在他面前的是一個不平常的神祕的樹林，樹下的深沉而不動的陰黑，月亮的奇光，女人雪白冰清的軀體；她那緊閉的眼睛，迷人的濃厚的氣味，發狂似的劇烈的慾望。

「這回憶使他的整個身軀充滿了倦洋洋的，甜蜜的顫悚，但是，有什麼東西針扎他的太陽穴，握緊他的心臟，於是那幅零亂而不堪的圖畫詳晰的記到他的

心上來，他記得自己並未帶着任何的願望，把女郎摔在草地上面，她並不願意，却直在推開，掙脫，他看見自己已不能而且不願做這事了，却還是爬到她的身上
去。」

在第四十三章裏，當猶里唱着悲涼的調子，準備到花園裏自殺的時候，碰到了麗萊亞，問了一句話後，又有這樣的幾句：

「麗萊亞到河邊去同勒森且夫幽會，回來的時候受到親吻，感到非常的暢快和幸福，誰也不禁阻他們相見，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行，但是在荒園的空虛和靜默裏，在祕密裏可以有一種尖銳的刺激，因此，親吻更加顯得急昂，使麗萊亞觸到新的願望。」

但在堪南 (T. Carman) 的英譯本裏，是沒有的，刪得一點也不見痕迹。

金瓶梅和玉嬌李在中國的出現，正當明朝的中葉，有人因進獻紅鉛，房中術，秋石方，而得做大官的時候，這風氣也影響到士流，這些書裏，就都有着猥褻的描寫，但

更多的，却是世態的描摹，對畸形社會的揭發。所以雖稱淫書，其實是別有重要的一面的。沙寧也如此。牠的出版，是俄國革命後不久，新的文學對於性愛問題賦與了過大的注意的時候，阿爾志跋綏夫也同樣地受到責難，他曾經非常忿慨地說：

『……還不會把握了我的理想的一羣模倣者，急急於把沙寧的成功移轉成他們自己的利益。爲要使在讀者的眼中貶落我在沙寧之中所欲表現的東西，他們便使文壇充滿着齷齪淫穢的作品，而大大地中傷了我。』

對於中國新文學裏的性愛描寫，我也這樣想：我們當然不能拿猥褻的描寫來挑撥或者迷惑讀者，更不當不顧一切地專寫性愛。然而却也不須故意地迴避。卡爾浮登說得好：『在現在這個時候，因爲資產階級的壓制的反響和新的解放的狂熱，所以文學就有側重於性慾的現象。但在將來，我相信是一定會消滅下去的。一到家庭漸次崩潰，勉強的結合和婚姻的束縛漸次解除，性的神祕和糾紛，將由澄清調和而消滅了。一到私有財產制度破壞，新的倫理便產生，性將不會爲人所放大，也不會

爲人所縮小，不爲人所尊崇，也不爲人所輕視，不爲人所隱藏，也不爲人所表彰。今日性却爲人所放大，所表彰，用做文學的題材或主題，這是階級崩潰，社會瓦解時候的自然趨勢。」

但在今年中國文壇的情形，是不同的，那主張是封閉。寫過棘心的淑女蘇雪林倡導於前，繙譯過迦桑諾伐回憶錄 (The Memoirs of Jacques Casanova)的片段的紳士施蟄存響應於後。蘇雪林女士的高見，我在另一篇文章裏說過，這裏不再提了。施蟄存先生看了中流二卷一期裏的一篇報告，錫是如何鍊成的，便抹煞了那文章的意義，僅僅從那裏面摘出幾句比喻，洋洋得意的說：

『如果這篇報道文學的好處就在這幾節文字裏，我當然無話可說，否則，編者和作者都似乎患着嚴重的露陽症了。我雖然不是一個清教徒，但在目下的創作界中，却想來一個淨化運動。』

不知是那一本書裏說的了，說是曾經有過一個高僧，從小出家，清修到老，名譽

是很好的。當他臨死的時候，因為沒有看見過女人的陰戶，因此念念不忘，無論如何也死不了，情形非常痛苦。他的徒弟們幾經商議之後，就決定去僱了一個妓女來，脫下衣褲，讓他看一看，這高僧見了妓女的陰戶後，這才恍然大悟：『嘎！原來是跟尼姑的一樣的呵！』

對於施蟄存先生們的淨化運動，我也作如是想。

四月廿二日。

紀德往何處去

自從安德烈·紀德的從蘇聯回來發表以後，首先向他喝彩的，是德國和波蘭的那些法西斯蒂的報紙，牠們不但下流地嘲笑着蘇聯，而且一面還想借此拉攏紀德，張開着兩臂歡迎他。這和四年以前，我們的賢明的作家們，硬引紀德爲同調一樣，不過是一向情願的巴望而已。

這就因爲「實際上紀德還是從前的紀德，一些也並未走樣」的緣故。

人們也許會問：在從蘇聯回來的這本小書裏，紀德不是說了許多蘇聯的壞話，而且還因此挨着全世界前進人們的痛罵，毫無回復的餘地了麼？我將回答：是的。但我以爲，這却不能作爲紀德又轉變了的論調的根據。雖然他的確有着一個多變的生平。然而他的變是合乎歷史的發展的。紀德說過（一九三三年）「在很長的時期

裏，我只瞧見我的前面有着空間和我自己的熱心的照射。但現在，我却向着什麼東西走去，我知道我不確定的希望在某處組織起來，我的夢想正在變成事實……』實際上也確乎是如此。及到這次在從蘇聯回來的敍言裏，他還是說：『我們所夢想的，我們所不大敢希望，但是我們意志和力量却傾向着的事情，在那里已經實現了。一個地方已經存在了。在那里，烏托邦正在變成現實。』這說得多麼明顯，多麼肯定。紀德在浪子回家集裏所描寫的先知埃爾·哈其（El Hadi）已經在沙漠上找到了一個真的海洋，一個真的綠洲了。紀德以六十幾歲的高齡，表示了對新社會的熱望的關切的擁護，這正是一個徬徨苦悶了一生的 Moralist 的歸宿。有些人們竟把紀德四十年來努力所得的結論，當作變把戲一樣，以爲只要喝幾聲彩，就可以使他再變一下。然而紀德畢竟並不是走江湖的，這終於不免是單戀。

自從一九三二年以來，紀德發表了他的日記，參加了 A. E. A. R. 主持了法國作家擁護文化同盟，昭示了他的反戰反法西斯蒂的業績。他的名字，就時時在

正直的人們的眼前閃着光，而在另一羣人的嘴邊，却漸漸地冷落了下去，正如他改宗以後，不被克勞德爾（Paul Claudel）之流所滿意一樣，紀德是活在戰鬥裏的。在中國，那些曾經引他爲同調的人們，大概是恍然於彼此之間的距離了吧，也是一字不提。到得最近，法國的郵船把從蘇聯回來載到了上海，這才又得意忘形，互相搶譯，滿嘴裏都是紀德了。那醜態，和別德納衣的所謂『不斷領袖』的徒子徒孫們對照起來，真要好看了。

安德烈·紀德是一個渴求生命的人，充滿着青年的活力，然而他所遭遇的，却是一個悲劇的生涯。有人以爲他如果在另一個時代，別一個世界裏，在文學上，一定會有比現在更好的成績，我想，這是確實的。然而歷史終於殘酷地把他安置在這個時代裏了。在過去，他所賴以活命的，大概就只有爲他自己的熱心所照射着的『眼前的空間』，而也就因爲這，紀德才達到了真的人生，達到了進步的營地，『雖以生命赴之，也所不惜』。這口供是誠摯的。出諸紀德之手，入於世人之目，牠是會保

留着永恆的光輝的吧。

然而紀德究竟爲什麼寫出從蘇聯回來那樣的書，說了那些中傷的話的呢？這也是人們急於要提出的問題。

紀德在那本書的敘言裏說：『我的氣質生成是這樣的：對於那些我所願意永遠稱讚的人們，總是取着極端嚴格的態度。一味恭維是摯愛很壞的表示，而且我爲說話的時候不矯飾不顧忌，則對於蘇聯，以及牠爲我們所代表的立場，那貢獻就更重大些。我的所以要提出我的批評，是爲了對於蘇聯以及牠所已經完成了的奇蹟的敬佩這理由；也爲了我們對於牠還懷着期待這理由；特別是爲牠容許我們有所希望這理由。』我是確信世界上有所謂『愛之則嚴』的事情的。而且還以爲，單就紀德那一面說，這本書也真是屬於這一型。所以他雖有過份的責備，一面還有由衷的歡欣，欽佩和稱讚，他敘述了莫斯科娛樂場裏快活而熱情的氣氛，他再三致意於在蘇聯境內人和人之間關係的密切；他傾心於秩序和美；他稱頌波爾式伏合理

的教育；他描寫文化公園裏幸福的工人，壯健機警的青年，明朗活潑的兒童。他用縱笑和眼淚來刻畫出自己的高興。在今日，我想，世上決沒有第二個國家，會像蘇聯那樣，使紀德感到如此地興奮的。

但是，歸根結底，紀德畢竟是浪費了他的奔放的熱情了。在從蘇聯回來這本小書裏，他以敬慕和頌揚開了端，却讓誣囂和中傷佔去了後半部。我說誣囂和中傷，是一點也沒有過甚其詞的，雖然紀德的存心並不如此，但那結果，却的確落在這樣的泥淖裏了。紀德自以為這不是一本可以給敵人利用的書，但是事實是非常顯明的：書一印出，彩聲就起於敵人的口中。紀德能無歉然於這結果麼？

那本小書的出現，有些人說是紀德受了維多·綏奇的勸告，是「又轉變了」的證據。這其實是不確的。我以為紀德寫這本書倒是因為他不能習慣於新的環境，太不善於改進自己的緣故。真理報指他為法國小布爾喬亞的忠實的孩子，這很不錯。這種人的特點是看事游離，而對自己的主張，却又過份固執。

愛倫堡在一篇叫做紀德的路的文章裏說：「釋迦牟尼說所有的人都會歸依他；一部份由犧牲的路，另一部份由功業的路，還有一部份則由勞苦的路。現在歐洲知識份子的最優秀的代表所藉以達到勞動社會的路是非常不同的。正義的感覺，被激動的意識，憤慨等等，推送着一部份人。另一部份人則服從着冷靜的理智，消滅騷擾與混亂的慾望；這是那些革命的建築師和數學家。也有一些是受了英勇的鬥爭的誘惑。還有一些並不十分注意建設的問題，僅只因爲憎惡闊人而加入勞動社會。此外還有那些宿命論者，他們懂得了將來是什麼人的。這是數不完結的，有多少人便有多少路。」紀德是憑着自己的一腔熱情，因爲憎惡布爾喬亞的道德，而加入勞動社會的，這是他四十年來的結論。在剛果紀行裏他揭發了非洲殖民地統治者的行爲，却並沒有非難殖民的原則，他永遠「談着改革的必要，而並不是革命。」

紀德說過：「……我感覺着我的知識的欠缺，並且這種欠缺之感是日漸加深的，政治，經濟，財政一類的問題都是我所不敢輕易涉足的領域……」就是這次他

對蘇聯的批判，例如說蘇聯的一般情形都是差不多的，太一律了，沒有趣味；蘇聯民衆所能到手的日用品都是簡陋的；在蘇聯，批評不能跳出總路線以外等等。在在都顯出了他對政治經濟的無知。

自然，蘇聯是有缺點的，但隨時都在改進。要烏托邦變成現實，不但需要不斷的努力，一面也還需要時間。紀德難道以爲現實也像理想一樣，一經出口，就已經十分完美了麼？倘不，那就應該時時記住：「蘇聯是在建設中。」而且，現在也還不是可以發表過份吹求的批評的時候。紀德說過：「我們並不是爲了鬥爭而愛鬥爭，而要鬥爭的，是爲了鬥爭的成果才熱愛鬥爭……」紀德現在是忘記這話的意義了。他的態度是輕率的，也惟如此，這才招來了痛罵和離棄。

然而，從過去他的對宗教的鬥爭看來，紀德是不至於就此變成蘇聯的敵人的。他也許仍舊將固執着自己的偏見，但無論如何，卻不會離開進步的陣營。紀德在那本小書的結尾說：「近來，蘇聯積極地援助西班牙了，這對我們表明：蘇聯是還能夠

振作起來的。』紀德對西班牙既然如此關心，他是一定會明白什麼是西班牙的敵人，什麼又是西班牙的內奸的。在這里，紀德的路非常明顯。他現在正在深思，沈默會使他有一個清明的腦子。

四月廿五日。

關於文藝翻譯

兩三年來，翻譯的作品漸漸地多起來了，跑到書店裏一看，五光十色，差不多都是這類的書籍，俄國的，法國的，英國的，日本的，什麼都有一點，真可算是文壇上的好現象。但是，關於翻譯的理論——例如譯法的研究，譯文的批評之類的書籍，却又少得很。九卷一二兩期的文學裏，登過一個特輯，那就是由陳憲和先生譯出的，關於翻譯問題的意見，全文共十四篇，是由巴黎國際文化合作社，向各國的文化人徵集來的。作者既係名家，而且大抵弄過翻譯，知道個中的甘苦，所以無論是討論，是批評，是報告，對於譯人，尤其是文藝翻譯者，都是親切而又有益的。

在目前，中國的譯人們，也正需要這樣的提示。

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在那些社會關係相類似的國家之間，常常是相互地影

響着的，例如中國之於日本，英國之於美國，法國之於俄國等等，其間都有着拆不開的關係。但是，即使是社會關係不相類似的國家吧，個人之間的影響，却還是存在着的，中國雖然有過四歲九個月就能辨別四聲的神童，却並沒有生來就會做詩的文學家，偶獲成就，多由學習，這就需要有翻譯。高爾基在我的文學修養裏，提起自己所受的外國文學的影響，他這樣說：

「外國的文學，給了我許多比較的材料。那巧妙，也使我出驚。活潑潑地寫出形象來的人物，使我覺得好像碰着了實件。而且覺得寫出來的人物，都比俄國人更其積極底的——他們說得少，做得多。

「對於做着作家的我，實在給了深的影響的——是斯丹達爾，巴爾札克，弗羅貝爾這些法國的巨匠。我極力奉勸我們的「新人」們多看這些作家的東西。他們實在是天稟的藝術家，形式方面的巨匠。俄國文學還沒有他們似的藝術家。這些作家的東西，我是從俄文譯本看來的，但已經是夠覺到法國人的文章的力

量了。在濫讀了種種通俗小說之後，這樣的巨匠們的小說，是給了我意外的印象的。」

翻譯能夠幫助人們向廣博的文學寶藏裏學習，擴大創作的視野，增加比較的材料，使人們免於拘泥。高爾基的成功，固然是由於他的堅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豐富的生活經驗，然而這些法國巨匠們所給予他的影響，無論如何，是不可磨滅的。

這是文藝翻譯上的值得誇耀的史績。

在中國，翻譯的歷史是很古的。漢晉六朝，已經有了佛經的翻譯，到了唐朝，那風氣就更盛。然而文藝翻譯的興起，却是在清朝末年，政治的形勢要求着維新的時候。不過積習未除，那時候所介紹過來的，大抵是三四流作家的小說，而且總喜歡加上一個標題，或曰科學，或曰軍事，或曰偵探，這可以說是清末的政治要求的反映，但偶而也有香豔和滑稽，則是才子佳人式的老套頭。這時候，柯南·道爾 (A Conan Doyle)，焦士·威奴 (Jules Verne)，華雷斯 (Edgar Wallace) 大走鴻運，以林

琴南先生的盛名，也還要翻譯哈葛德（H. R. Haggard）的全集，足見那趨勢的惡劣了。

然而古之青年，幸而能夠讀到世界第一流作家的小說，却也確是從林琴南先生開始的。民國以後，雖然也有人譯過司各脫（W. Scott），狄更司（C. Dickens），雨果（Victor Hugo）的作品，但並不見得比林氏出色，而且那名目，都譯得非常古怪，如古室鬼影，繡塌豔乘之類，一看見，就使人覺得毛髮悚然。但更爲有趣的，則是一位文豪，把波蘭的故事改編成一個劇本，鑼聲響處，四個太監引了一個小生上來，唱道：『孤乃波蘭國王，拋尼脫司蓋是也。』情形是十分可笑的。

然而這確是那時候的文壇的實情。

接着是五·四運動起來了，翻譯又一度的非常興盛，但不久就被譽爲『天書』，從『媒婆』起，一直到『西崽』止，足足的罵了靠十年。讀書界不要買，出版界不肯印，死路一條。但後來有了轉機，及到前年，這才又第三度抬起頭來，需要一多，譯

品漸濫，這回也還是搶譯，誤譯，亂譯。然而一面也出現了認真的可看的譯品，良莠不齊，當然更需要識者的指點和分辨。然而那時候的輿論的主張是容忍，即使懂得原文，「明」知其不「妙」的吧，也不准批評。去年有人寫一點，就「謀殺翻譯」呀，「宗派主義」呀，「有灰譯者之心」呀的嘍叨了一大陣，彷彿只有閉緊兩片嘴唇，容忍一切亂譯，這才是文壇之福似的。但這真是文壇之福麼？實際上並不是。

文學上的關於繙譯問題的特輯，就是一個例證。

特輯里的文章，其中如嘉奈多（Enrique Diez Canedo）和紀德（Andre Gide）的意見，都是主張把譯文的好壞，加以批評和區別的，即使是「絲須」的錯誤，也要指出來，不該姑息。這真是模糊主義者的對頭。也許「好漢」們要說中國的情形不一樣，繙譯正在萌芽，加以批評，也就是予以打擊了吧，這意見是似是而非的。實際上，翻譯的在中國，能夠有現在這一點成績，也正是由戰鬥得來的。

林琴南式的文言譯本，到了現在，是早被淘汰了，古室鬼影式的才子譯本，也已

經少得很，不消說，這是批評和取捨的結果；一九一九年，胡適之先生出版了一本繙短篇小說集，他用經濟的手段，替我們譯了最後一課，譯了二漁夫，譯了他的愛人，譯了愛情與麵包，這里刪一段，那里削一節，使本來是短篇的小說愈加短起來，都德莫泊桑，高爾基，史特林堡，就在我們的胡適之先生的手裏，得到了凌遲的處分，現在的譯人，倘非不得已，是決不會再用那樣的手段的了，這也是批評與取捨的結果；一九三〇年，梁實秋先生在一篇翻譯的文章裏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現在的譯人，也決不會再相信這種「害人無窮」的「爽快」的學說了，自然，這也還是批評和取捨的結果。

譯文的需要流利——也就是順，是不成問題的，但牠必須是在忠實——也就是信的條件下，這才談得到。譯人們應該以忠實爲第一義。嘉奈多說：「論及現代的翻譯方法……我堅決地反對「改譯」(Adaptation)——至少當一個譯者引導

別人認識國外作者時不該如此。因為人們總是張冠李戴地強把莎士比亞弄成一個意大利人，把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和莫利哀弄成我國——指西班牙——黃金時代的戲劇作者。即令我十分相信他們所謂「語言的天才」這話也不能用作假面具以保護掩飾翻譯家的任性與偷懶。我們再不需要那種「不忠實的美女」了；忠實才是美麗之初階，而我們所需的正是又美麗又完全的譯品。」這意見是很好的，足供譯人的參考。但我想：除此以外，應該注意的，粗略地說來，還有下面這五項：

一、直譯並不是死譯，不一定要字對字，句對句；然而却必須正確地，一點也不遺漏地傳達出原文意義，保持着原文的風格。譯文不但要移植原作的內容，也應該轉達出原作的形式，即使不能夠做到絕對的一樣，却應該於最可能的限度內，求其相似。

二、原文美妙的地方，尤其是有詩意的比喻或者象徵的地方，應該如實地傳

達出來，倘使因為習慣環境的不同，不容易為讀者所了解，不妨多加註解。

三、翻譯一篇東西，對原作固須有切實的理解，對原作者的思想，生活，環境，尤須有充分的明瞭，這才可以免去許多誤解。

四、原本必須慎加選擇，對讀者求其有裨益，對自己求其能勝任，

五、多看別人的譯品，多查字典；自己的譯文發表以後，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批評，不以「好漢」們的姑息和寬容為惠澤——這也正是一種不使自己變小的辦法。但自然，一面也決不應該自以為大過於一切的。

七月二十日。

少年隊伍的魯迅先生

留在我的腦裏，至今還有深刻的印象的，是兩幅這樣的相片：

第一幅是關於高爾基的，地點是在衣爾庫茨克的學校裏，他坐在一羣孩子的中央，用手撫摸着其中的一個的頭角，笑着，顯示着母親似的愛念和溫存，四圍是健康的笑臉，靈活的神情，以及浸淫在長者的關切中的依戀。第二幅也是關於高爾基的，一九三四年八月，全蘇作家會議在莫斯科開會，幾個學校裏的少年先鋒隊去訪問他，他拿着一張畫像，正在解釋着什麼，親切的裏面滲雜着認真和忍耐。

當我讀了高爾基給他的孫女們的信，以及瑪爾法·畢斯柯娃的所謂「你以為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赤待我們這樣好，是因為我們是他的孫女嗎？」的時候，我更明白了一個偉大的人物的心地。在真純鮮紅的孩子們的兩頰上，塗着我們的

作家的心血，牠孕育着未來的光明和希望。

於此，我也記起我們的被稱爲『中國的高爾基』的魯迅先生來。

中國舊社會的堡壘，一向是對準着女人和孩子的。女則，女誠，三字經，神童詩，乃至幼學瓊林，就都是鎮壓婦孺的法寶。長幼有序，內外有別，危急的時候，殺妻，飢餓的時候，食子，久已成了我們的先輩的公論。在這『公論』的下面，後起的孩子們，漸就委靡，終於長蕙顛碎，成了游魂似的東西了。較爲強橫的是熬受，及等掙扎到先輩的地位，也來同樣的一手，使吃人的歷史得以永遠繼續下去，但是，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魯迅先生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首先喊出這口號。其實豈僅口號而已，這是暗夜的閃電，悶天的響雷，鐵屋子的透光洞。許多年來，舊社會的禮教約束着他，他衝殺，攻打，毫不屈服；腐敗的政治壓迫着他，他抗爭，批判，毫不屈服；橫暴的指揮

刀威脅着他，他抵禦，追襲，毫不屈服；御用的文學家圍勦着他，他突擊，掃除，毫不屈服。但是一等到孩子們把什麼放在他的身上時，他就低下頭來，默默地承在肩上，「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即使因此受到相反的答報，也還是「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始終沒有怨言的。

他以偉大的心靈貫穿着千百代。

「我不惜以最壞的惡意，來猜度中國人。」這話，不但發乎憤激，而且深含熱意，就是俗語的所謂「愛之則嚴」的意思。但這樣的「嚴」，在魯迅先生的生活裏，也只加諸前代或者同代的人物，對於後一輩，他是只有愛，只有寬容，只有信任的。

然而却因此常常得到惡意的酬報。

民國成立以前，魯迅先生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裏教化學。有一次，在教室裏試

驗輕氣燃燒，一時忘帶火柴，走出去拿時，他告訴學生，不要動搖輕氣瓶，否則混入空氣，燃燒時是會爆炸的。但他拿着火柴回來，點上火，輕氣瓶立刻爆裂，手裏的血濺滿了襯衫和講台，他連忙去看坐在前面幾排的學生，却發現他們於他回來之前，早已避在後面了。

在自己痛苦的時候關切着別人，而別人，早就乘着這關切，暗暗地設下了坑他的陷阱。

民國十年左右，魯迅先生在北京的一個世界語專門學校裏，擔任一點功課。天花流行了，學生們大抵都不會種過牛痘，於是他就竭力煽動他們去種痘。然而大家因為怕痛，磋商的結果，是請他首先種，作為青年的模範。於是他在前領導，後面跟着一羣青年，跑進校醫室。北京的春天還帶着寒意，他脫去衣服，點上痘苗，再穿好衣服，回轉頭去看時，那些跟他同來的青年，却早已溜得一個也不賸了。

他感到了無可如何的寂寞。

到了上海以後，又有青年從廣東跑來，要求先生幫助，供給衣食，住房，零用。先生被人「圍剿」的時候，這位青年担心會受到連累，突然對先生說：「他們因為我住在你這裏，連我也被看不起了。」臨走，還說他是賣了田出來的，先生應該替他買回田來。幾年以後，這位青年又從廣州來了信，說：「原來你還沒有打倒，那麼再來幫助我吧。」

以愛臨人，得到的却是這樣冷酷的結果，凡肉心，當之是無不灰涼的。然而先生却無介於懷，藏在他的胸口的是一顆不滅的火球，不凡的心地，他愛護着一切青年，不管他的老子怎樣。他永遠是以最好的善意去猜度天真的孩子，少年，乃至較大一點的青年的。

所以他仍舊要為年青的一代辯護。

一九三三年五月，黃膺白氏做了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委員長，走馬上任，不

料專車到了天津，被投一彈，犯人當場捕獲，次日就梟首，據說還只十七歲，是受日人的指使。

對於末兩句，先生就提出了這樣的保留：

「但我要保留的，是『據供係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為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衆公認爲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於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體力，攜着竹筒或撲滿，奔走於風沙泥濘中，想於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數了……」

這並不是溺愛式的空論。他是從那時候的政府的方針，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的組織，黃膺白氏的本身，來體驗出事實的。他以為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五年，「在那掛着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

這真是一句預言，到後來，我們不是終於聽到了「身後是非誰管得」的歌聲

了麼？

然而我們的少年的頭顱已經掛起來了。

關於兒童教育，魯迅先生也有精闢的意見。有一次，在一處吃飯的時候，說到現在的辦兒童教育者，偏於空談，效果甚少。他就說了一點自己對孩子的教養，日子一久，所說的話，我也記不清楚了。大抵和他後來寫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裏的差不多，記得還有兩點：其一，是說洗澡的時候，常讓孩子和自己在一個浴盆裏，這可以免除孩子將來發生對於性的好奇心；其二，出門的時候，多就實物，詳細地加以解釋，以擴大孩子的眼界。

關於海嬰，也有如下一段話——

「有一次，他問我道：『爸爸！你什麼時候死呢？』你看，他剛生，就要問到我的死了。」述說着這話的時候，魯迅先生親切地笑着，使人覺得他好像是一個有鬚鬚的

小孩子，無論在精神上或者肉體上，他都還非常年青。

魯迅先生注意急急就篇，太公家教；注意玩具，連環圖畫，看圖識字，小學教科書；也注意別人的兒童的行動和言論。他視所有的孩子如自己的孩子。

一九三三年九一八紀念日，貴陽的小學生集合游行，教育廳長譚星閣以汽車向游行的隊伍衝去，死傷學生四十餘，大抵都在十歲上下。他看到這消息，氣得了不得，爲文抨擊，逢人便告訴。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七日，申報的兒童專刊上，登出了一篇署名夢蘇的文章，叫做小學生應有的認識，主張中國人倘使殺害外國僑民，應該罪加一等，他讀了這文章，氣得了不得，爲文抨擊，逢人便告訴。這不但因爲他具備着民族的意識，也因爲要把孩子們從刀口和毒藥裏救出來，他不忍人間有「嬰兒殺害」的慘劇。

然而他却活在這樣的地方，活在這樣的時代。

孤往絕詣，以偉大的精神，戰鬥於「無物之陣」，魯迅先生的業績，大部分是爲

着後一代而建樹的。他永遠是少年的隊伍。在未來的世界裏，他將得到更多的欽仰和更大的崇敬。

一九三八，九廿三日扶病寫。

關於歷史題材

大概是新的一年又開頭了的緣故吧，這幾天，正有許多人在替過去的一年算清賬，文藝界自然也不能例外。我還沒有翻檢過那些賬單，出入盈虧，兩無所知，祇記得前些時候，有人批評到文藝的一般現象，那病根是模仿，差不多。關於這，我以為如果真有差不多的現象，與其說是在於形式方面，毋寧說是在於內容方面。作家的筆尖既經集中於抗日反漢奸的一點，而上海的環境又是這樣地狹窄，拘束；同一的題材，多多少少地使形式受到限制和決定，落入了類似的窠臼。爲了促進表現的方法，擴充題材的範圍，使形式達到絢爛多采的場面，那末，對於歷史題材的運用，實在是一條不容忽視的路途。雖然這路途在現在還不免於十分荒蕪，但這正有待於大家的開闢，有待於大家的躬行的。

首先，我以為應該展開關於這一問題的理論。

說起來已經很久了，當『賽金花』在上海上演的時候，劇作者協會曾經主催過一次座談會，那記錄，後來就登在文學界第一期上，我還記得有一位先生的意見，說是在他看來，歷史題材是第二重要的。這對於鼓吹作家的筆尖集中於現實這一點上，非常之好。但是，仔細一想，其實也並沒有明顯的一二可分，題材雖然有新舊，但在作用上，對於現實的針砭，却是完全一致的。

文學的對於現實，具備着反映，分析和促進的任務。但那方法，却並無限制，九·一八過去了，一·二八過去了，七·七過去了，那仇恨却還存在着，沒有過去。牢牢地刻在每一個人的心裏——或者縮小起來說，牢牢地刻在每一個作家的心裏。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在過去，我們還不會見過反映或分析這些大事變的作品，這是未發的寶藏。牠的對於事實的教訓，決不在新的事件之下。

在這一點上，筆不是一把刀，而且也應該是一把鎚，我們需要發掘。

但這裏也有一個主要的條件，凡所擷取的題材，必需是和眼前的現實有共同感的事象，這樣，才使人們易於「聯想」。從「聯想」裏得到實際的教訓。

在爭取落後觀衆這一點上，某些歷史題材，是比時事題材更爲勝任的，因爲日報的流行，遠遠不如里巷之間的所謂閑書——舊小說之類。有些人從來不知道戴季陶，汪精衛，却沒有不曉得濟癩僧和秦檜的，這是因爲他們曾經唸過佛，賣過國，因此有名了麼？並不是的；倒是因爲在古老的口頭或是舊小說裏聽見過，非常諳熟。譬如上面說過的「賽金花」劇本吧，據說上演的時候，招來了不少比較落後的觀衆，太太，小姐，哥兒，還有所謂「生意上的女人」，自然，一方面是因爲賽金花是一個出名的婊子，狀元夫人；另一方面，却是因爲他們看過孽海花，或者聽見過關於賽金花的傳說。

——如果他們看見了舞台上扮演出來的賽金花，也一定可以看見漢奸羣像；他們帶着感嘆回去。但是，難道就不帶着一點憤怒麼？

這憤怒將推動覺醒，這就是扮演者的成功，劇作者的成功，也就是運用歷史題材的成功。抗戰文藝是必需爭取落後羣衆的，牠不能放過可以抓取的機會。因此，也不能不運用通俗的，爲大家所熟悉的歷史題材。

然而歷史是悠長的，抗戰文藝的目標却着重於目前，如果現在有人寫了一本黃帝和蚩尤——姑且認這也是歷史吧——打仗的小說，這就不但難於模擬，而且對於讀者，恐怕也不免有點飄飄然，無關痛痒。

爲了材料的便於搜集，事實的務必正確起見：勿求之於太古。

關於遴選近古的歷史題材，我也有一點意見，在一篇關於國防文學的感想的文章裏，曾經有過這樣幾句話：

「關於古代的和域外的史實，因爲國防文學的讀者對象是廣大的羣衆，所

以我個人的意見，以爲岳飛文天祥不必復活，抗金拒元的戰爭裏，有千千萬萬岳飛和文天祥，是不能不復活的，我們所應該描寫的，是整個的羣衆的鬥爭，如義和團事變，五卅運動，美國的獨立戰爭，保加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我們不能抹煞正確的史實，更不能忘記我們的讀者對象。」

我至今還以爲個人的英雄典型無須塑雕，羣衆的力量却不能不注意。在抗金拒元的戰爭裏，特別強調軍民的力量，這並非不忠於史實，實際上，正確的史實倒正是如此的。因此，與其宗正史，還不如多多地參考野史，例如關於明末吧，則燕都日記，揚州十日記，東塘日節，江上遺聞，風倒梧桐記等等，就都是很好的材料。

夏衍先生在一篇叫做歷史與諷喻的文章裏，提到一個頗可注意的問題。因爲有人批評他的「賽金花」劇本裏對於民衆反帝的原始反抗情緒分析得不夠，他說：「我希望能夠從八國聯軍聯想到飛揚拔扈，無惡不作的「友邦」，從李鴻

章等聯想到爲着保持自己的權位和博得「友邦」的寵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鮮血作爲進見之禮的那些人物，但是，我却絕不希望讀者從原始的農民暴動聯想到今日的民族自衛運動，更不希望讀者從那無組織的烏合之衆的失敗，聯想到救亡自衛的前途。」

選取了歷史上的某些反抗而終於失敗的題材的時候，一定會有這樣的徬徨。解決這徬徨的辦法，首先是要有環境的烘托，和對於這事件本身的精密的分析，否則，就會落入失敗主義者的悲觀的泥淖，得到了更壞的效果了。

歷史題材的選取，實在是一種艱苦的工作，牠並不像眼前的事實一樣，有着基本的線索可尋。第一，需要廣採博覽；第二，需要辨別真偽；一句話，對於運用歷史題材，作者非先有如炬的眼光不可。

廿八，一，廿五，改作。

心上的暗影

剛剛把小的一個孩子收殮完畢，送出門去，第二個孩子還沒有脫離險境，妻發着一百另四度的高熱，躺倒了。如果六道之說是存在的，我就決不相信自己還活在人間，但眼前的事實又怎能否認呢？這分明是對跳動的生命煎熬，是滅亡的恐怖。我也還有血肉的心，來抵禦一切人世的橫逆，但是，請不要讓我看見這嫩芽的摧折吧，我曾經用心血灌溉過。

我也知道，作爲眼前的主要的任務，是拯救生者，但對於這逝去的幼小的靈魂，却又苦於未能忘却。夜深了，病者有了一個暫時的沉寂，我的激盪的感情也逐漸低落，一靜，暗影又緩緩地爬上我的胸坎，爲了保持病者的安寧，這哀思無可寄托，在悲痛中，我嚙碎了自己的心。

默默地，我拾起一些零落的記憶來。

大約是兩個月以前吧，小的一個孩子忽然發了熱，初起的時候，因為症狀模糊，頗使我手脚無措，過了兩天，終於找出他的病源了：爛耳朵。這已經是第二次，但我很擔心他還夾雜着別種病症，所以讓妻帶他到附近的一個公立醫院裏，看過耳朵以後，又去小兒科裏診察口腔，檢查肺部，結果是什麼都很好。祇是營養不良，體力衰弱點。我於是遵照醫師的囑咐，去買了一些乳粉和魚肝油來，一面又繼續替他看耳朵。

由於生活的煎逼，六七年來，我養成了晏睡的習慣，四週的聲音已經靜寂了，連妻也入了睡鄉，我還獨自在燈下工作着。自從孩子抱病以後，自然也得分一點心去看護，黯黃的燈光下，對着孩子們『純樸可愛』的睡相，不知怎的也有了淒涼的感覺：『他的面頰，以健康和血氣而鮮紅。他的皮膚，沒有爲苦慮所刻成的一條皺。在那不識不知的崇高的顏面全體之後，豈不是就有可怕的黑暗的運命，冷冷地，惡意

地窺視着麼？」（有島武郎：孩子的睡相。）

我的心沉下去了。

然而孩子的病並不嚴重，他還是和先前一樣的活潑。每次，當我拖着疲倦的身體走進家門的時候，他就飛快地從走廊裏迎出來，迅捷的腳步載着矮矮的軀體，後面是他的兩個哥哥，他們同時都「爸爸！爸爸！」的喊着，彷彿鴨棚裏剛放出來的小鴨似的，二張嘴幾於無法回答。我蹲下來，這最小的一個便把兩手圍住我的頭頸，小的臉孔貼上我的左頰，我感到溫暖，一接觸到孩子的親熱，困倦的心又蘇甦過來了。

閭里間有一句這樣的話：「公公婆婆喜歡長孩兒，爸爸媽媽鍾愛小兒子。」但在我，是無分彼此的，他們同樣是我的生命枯枝上的嫩芽。不過因為小的更需要照顧，在身邊的機會更多，所以也顯得較為親近而已。說也奇怪，這小的一個的確和我很親熱。每天早上，總要從他的母親的被洞裏爬出來，和我同睡幾小時。有時候，妻因

爲不願驚醒我的安眠，拉住他，他便「爸爸！」的吵着，一直等我把他拖進自己的被洞，才又呼呼地睡去了。

這並不是幸福，這是苦痛，我終於受到命運的捉弄。已經逐漸就痊的孩子，熱度又突然增高了。我們祇得再轉小兒科，這回診察的是一個女醫生，她量了熱度，一面又檢查了口腔，終於冷冷的說：

「這是痧子，就要見點了。」

「痧子，不礙事吧？」妻顯然有點着急。

那位醫師撇着嘴，祇顧在聽對面坐着的男醫師的閑話，連頭也不會回過來。

「不礙事吧，醫師！」我怕她聽不見，就接着說。但她正談得起勁，等我第二次再問時，卽又扮成嚴肅的臉色，冷冷的說道：

「體力衰弱，抵抗不住。」

「有什麼辦法沒有呢？」我小心地問。

她沒有回答，又和對面的男醫師去搭訕了。

『抵抗不住，有什麼辦法呢？』妻重複着。

『沒有辦法！』她信信的說。

我不發火，我柔順到了可驚的程度，爲了孩子的生命，我們都變得低聲下氣了。妻似乎還沒有放棄得到一個圓滿的答案的企圖，於是又追問道：

『不能打預防的針麼？』

『不能！你趕快抱回家去吧，這裏還有不會出過痧子的孩子呢。』

不耐煩的神氣裏包藏着一顆殺人的心。但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這一對連一點粗淺的醫學常識都沒有的青年。『這裏還有不會出過痧子的孩子，』這也許是真的，我自知有把自己的孩子和他們隔離起來的義務，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我們離開了那個醫院。

然而我記得牠，我記得那個女醫生，我將不斷地投以憎恨和憤懣。

看看抱回家來的孩子，病情確乎非常危急了，我感到痛苦，慌亂，然而無可告語。那個女醫生的冷冷的面孔又在我的腦際出現了，我彷彿聽見『沒有辦法』的喊聲，我感到痛苦，慌亂，然而無可告語。朋友替我介紹了許多醫生，我覺得這些醫生都很好，然而彷彿也都靠不住。我猶豫，無所適從，但在這樣迫切的時候，也知道應該立刻打定主意。妻已經聽從鄰居的勸告，決定把他送到一個最負時譽的痘痧專科那裏去。我感謝她們，她們替我決定了這難以決定的問題，然而到了如今，這感謝却終於落了空，成爲我的畢生的懷恨了。

對於軒轅歧伯之流的門徒，我是一向沒有什麼信仰的。然而奇怪，這一位却居然十分開明，他不但用熱度表測量熱度，按時間細數脈搏，一一記入了調查表，而在開完藥方之後，還叫我抱着孩子，到一個西醫那裏去打針：預防肺炎。我的不澈底的弱點終於暴露出來了，這態度竟使我十分滿意，決定讓他診下去。一面又奔走張羅，終於得到一個朋友的幫助，打針服藥，十來元錢一天的用度，居然也能敷衍一時了。

「祇要眼淚鼻涕暢通，孩子的生命就可保全了。」有一次，醫生對着我們說。孩子的眼睛是水汪汪的，我們祇等着他的眼淚流下來。

大概是因為有名的緣故吧，醫生的診金雖是兩元五角，每天往診的人却總有一百五六十。爲了要避免久等，只得一早去掛號。天剛發亮，我就拖着疲倦的身子，揉了揉紅腫的眼睛，從靜寂的街頭穿過去。街燈冷冷地瞅着，一直送我到那座墓園的前面，去等候第一輛開出的勃司。墓園的古木抽出了茂密的枝葉，伸入天空，蕭蕭地在發響，濃蔭裏，偶然飛起一隻兩隻烏鴉來，牠們的翼子鼓動着我的心。我焦急地等着，等着第一輛開出的勃司，等着命運替我安排下的不可知的局面。

孩子一直昏迷着，遵着醫生的囑咐，我們不敢給他多吃東西，祇讓他喝一點米湯，又時時把開水灌進他的嘴裏去。咳嗽是暢的，紅點也渾身都有了，然而面色發白，眼淚不見流下來。他一天一天消瘦下去，我們也陪着一天一天消瘦下去了。

每天，從中醫處診了病，再去西醫那兒打針，我們不停地跑着，我幾乎攢脫了一

切事情，連吃飯也可以忘記。在這些日子裏，我才懂得了搶救兩字的意義，我從來沒有這樣閑散過，也從來沒有這樣忙迫過，這可怕的閑散和忙迫呵！

四五天後，孩子雖然沒有眼淚，病情却似乎減輕一點了，先是打針的時候有了痛苦的感覺。接着眼睛能夠張開，神智也比較清楚。我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兒，他便現出痛苦的臉色，舉起瘦削的兩手來，我把他抱在懷裏，他就靜靜地躺着，彷彿感到了安慰似的。給他餅干，也知道送進嘴裏去，然而我們不敢給他吃，連牛奶也加屏住，我們緊緊地記住醫生的囑咐，我們遵守着戒條。

這樣，我以為我們正在領他向着康復的路上走去，我以為我們並沒有走錯路。我們等着，祇要眼淚和鼻涕暢通，孩子的生命就可以保全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孩子的病雖然沒有更好，但也沒有變壞，我滿以為他可以脫離險境了，在生存的途上我們已經立下了一塊紀念碑，我每天企望着他的眼淚流下來。不料四月廿二日早晨，病勢忽然轉劇起來，鼻子扇動，儘是喘着氣。醫生用了扳

藥，然而沒有效。對於麻黃，石膏，龍齒，磁石之類，我完全失了信仰，決計送他到一個素來診慣的西醫那里去，據診斷：痧子的症象已經過去，肺炎也並不過於嚴重，然而孩子却實在已給餓壞，失了所有的抵抗力了。

我懊悔，懟恨，然而無可告語。我要趕緊從錯路上走回來。

由於繼續得到朋友們在人力上和經濟上的幫助，我約定一個醫師的助手，每三小時一次的替孩子打着兩種強心針：Coramine 和 Sparto-campure。但他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連眼珠也朝上了。給他服藥，喝開水，喝葡萄糖，喝鮮橘汁，他用嘴兜了去，又吐了出來。我無法去分担他的痛苦，祇要他還留着一口氣，我總覺得自己的責任沒有完，祇要他還有一點體溫，我總覺得他不會死去。他剛剛跑進人間，簡直還不會正眼瞧一下，他的前面擺着悠長的日子，他還得走更遠的路，體驗更多的生活的不同的滋味。

因為他不能下咽，難於服藥，廿三日早上，我又去請了一位西醫來，昨天的一個

是留美的，這一位可是留日的了，但他們的診斷却大都差不多。除了強心針以外，又打了維他命B，維他命C和 Grucose-D，也許是打得太多了的緣故吧，大腿上起了泡。然而這多量的藥劑竟不能發生些微的作用，孩子的病情終於愈趨愈兇了。

我並不感到絕望，讓我再來重複一句：祇要他還有一口氣，祇要他還有一點體溫，我終覺得他不會死去！也許明天就會痊癒，他將和從前一樣的爬過來和我同睡；他將用胖胖的臉孔來熨貼我的面頰；他將用小手抱住我的頭頸；他將『爸爸！』的親熱地叫；當我替他披上新的大衣，戴上猩紅的絨線帽，他將仍舊穿籠燈似的在房裏溜跑，不讓人給捉住；我會看到他的光輝的喜悅；當他用積木堆起了一座粗略的房子的模型時，他將仍舊搖側着頭，搖側着肩膀，『噯噯……呀！噯噯……呀！』的唱着，我會看到他的勝利的微笑。在無窮盡的未來的日子裏，我將在他的身上找到我的理想，找到我的無背於羣衆的利益的希望和要求。

我不相信他會離開我——永遠的離開我。

大約下午兩點鐘的光景，他的向上泛着的眼睛突然正視了，他看我，看定他的母親眼眶裏飽含着淚水，我以爲牠要流下來了，但是並不。在這淚水裏我看見了強烈的求生的慾望。他要活！他不肯離開我們，然而這廣漠的人世竟容不下一個小小的生命，在生和死的邊緣上他獨自掙扎着，我焦急地望着他在搏鬥，我無法幫助他，他歎一口氣，終於又把眼珠上泛了。

這聲音永遠在我的耳邊繚繞，這是最後的嘆息，這是幸福的喪鐘！

三小時一次的打針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然而孩子的氣却愈喘愈急，腳趾漸漸陰冷，脈息也越發細弱了。我不相信他就會這樣死去，雖然還沒有到規定打針的時候，我趕緊又去催助手來替他打了一針，然而這有什麼用呢？不可避免的瞬間終於隨着暗夜到來了，廿三日晚上八時一刻，當我仍舊拿着開水送到他的嘴邊的時候，他又看定我，彷彿想哭，然而哭不出聲音來。嘴角剛剛向下一彎，祇這麼一彎呀，然而就在這一彎裏他斷了氣，什麼都已經完結，他的眼淚流下來了，我們企望了多日

的眼淚流下來了。

我想逃避，我想躲藏於無人之境。在這一個世界裏，我的幸福已被剝奪。求生的掙扎，惜別的眼淚，祇有我看見這一個臨終的苦臉。這一切都和歡樂的回憶揉在一起，成了我的心中的暗影了。

對於死的無知，我也無異於我的一個六歲的孩子。對於生，我又懂得一點什麼呢？如果說這真是一個筵席，孩子，你爲什麼要先我而散去，你爲什麼要先我而散去呢？

五月廿六日寫完。

瓜蔓集

一

我愛詩人的想像，因為牠美麗；但是，我更愛戰士的經歷，因為牠雄偉，剛健，沉痛，主要的是真實。

孫毓棠先生在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上，發表了一篇題做談抗戰詩的文章，正如這題目所提示，全文是由時代對於詩的關係，來說明作者對於抗戰詩的意見的，但其中也觸到了一些基本的問題，如作者不相信詩能夠大衆化，不相信詩適宜於宣傳，過分強調了作詩的技巧，等等。

「因為現在有許多抗戰詩被一般嚴格的批評家罵爲「口號大全」或「抗戰八股詩」者，都由於寫詩的人自己太不下工夫，太隨便，並且只講宣傳而不講

表現。有些詩人太熱心了，寫詩時心裏先就打定了主意。打算這篇詩出去便可以激動許多讀者的抗戰情緒。我以為這種寫作的心理完全錯誤了，因為我覺得拿詩來作宣傳工具是宣傳中最笨的方法……簡直是自費力，不可能。詩在今天的世界上本已走到末路，成了少數人的東西了，（我不承認詩能大衆化，即使能大衆化，也沒有什麼好處或價值，因為即使大衆化了，大衆也不會喜歡詩。）我不相信這些喜歡讀詩的少數人，得等到讀抗戰詩，才能引起抗戰的情緒。所以我想費工夫寫抗戰詩的人不如改變一下自家的心理狀態，專心致力於寫真正文學的詩，注重在表現時代。」

如果說天地間真有爲宣傳而硬去做詩的詩人，那末，我敢說，這是會失敗的，因爲他首先沒有真實的生活和感情。但我們也不能因這失敗而抹煞了詩歌的宣傳性，一首好詩在巧妙地表現出客觀的真實，激動讀者的情緒時，無論從那一面說，總是負起了教養的任務，盡了宣傳的作用的。

宣傳寓於『表現』的裏面。

不錯，我們應該『表現』，更重要的是：應該『表現時代』。

能夠真正『表現時代』的詩，雖然出諸個人的手筆（所謂個人表現），却決不能和這時代裏的羣衆的要求相違背，所以在內容上，先就不會缺乏大衆化的成份了。從內容決定形式這一定理來看，我們相信詩歌是可以大衆化，而且也毋須去擔憂大衆的不接受，不愛讀的。

我要重複一句，主要的是能夠真實。

二

一提起大衆化，我想，詩歌和其他的文藝部門，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如果在小說裏有說評書，說相聲，唱新聞，民間故事，民間小說等等的大衆形式；在戲曲裏有灘簧，蹦蹦戲，篤篤班，文明戲等等的大衆形式；在詩歌的園地裏，我們不也有，山歌

民歌，小調，時曲，鼓詞等等的大衆形式麼？而且，我們知道詩歌的產生，原先就不在宮庭，不在沙籠，不在象牙塔，而是在里弄裏，田野間，牛背上的。

這不但證明詩歌能夠大衆化，同時也說明了大衆對於詩歌的愛好。

顧前瞻後，文藝大衆化這一個口號，可知是在文化程度發展得不夠平勻的階級社會裏，才能存在的，在明日的世界上，大衆和小衆既不對立，牠也將完全失去憑依，不得不歸於消滅了。

現在的提出這口號，我想，其實是要消滅這口號。然則又何必遑遑呢，聰明的詩人們！

三

不過文壇上也確有使人遑遑的現象，却並不是文藝大衆化的問題。到這裏，又要觸及我們的一批敬愛的譯者們了。

在目前，譯品的需要的迫切，也正無異於大衆化的文藝。無論是小衆或是大衆，就抗戰說，就文藝說，以至於就抗戰文藝說，都有向先進的友邦學習，聽取他們的批評的必要。我們的譯者們應該怎樣慎重地來負起這責任呢？對於一般的文藝翻譯，我曾經私擬過這樣的應該注意的五點：

一 直譯並不是死譯，不一定要字對字，句對句；然而却必須正確地，一點也不遺漏地傳達出原文的意義，保持着原文的風格。譯文不但要移植原作的內容，也應該傳達出原作的形式，即使不能夠做到絕對的一樣，却應該於最可能的限度內，求其相似。

二 原文美妙的地方，尤其是有詩意的比喻或者象徵的地方，應該如實地傳達出來，倘使因為習慣環境的不同，不容易爲讀者所了解，不妨多加註解。

三 翻譯一篇東西，對原作固須有切實的理解，對原作者的思想，生活和環境，尤須有充分的明瞭，這才可以免去許多誤譯。

四 原本必須慎加選擇，對讀者求其有益，對自己求其能勝任。

五 多看別人的譯品，多查字典；自己的譯文發表以後，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批評，不以『好漢』們的姑息和寬容爲惠澤——這也正是一種不使自己變小的辦法。但自然，一面也決不應該自以爲大過於一切的。

然而一輪到抗戰文藝，一輪到有關於祖國的文章的時候，我們的態度是應該格外嚴肅的。爲了節省時間和物力，不但對原本應該慎加選擇，而且所做的工作也應該有系統，有緩急，有衡量，使彼此不相衝突；能細心，能認真，能專注，使原作不被糟蹋，而貫穿在這兩者之間的，是時間和組織。

有這樣的需要，有達到這需要的決心。

但事實怎樣呢？就以被稱做『孤島』的上海爲例吧，不錯，由於環境的特殊，翻譯在上海是相當興盛的，我們有了資本論的全譯，有了列寧全集中譯的選印。但在另一方面，卻又瀰漫着搶譯的風氣。新近，在同一時期內，湧出了七種不同的愛國者

的譯本，其他如華北前線，西行漫記，不准敵人通過等等，也都有兩三種乃至靠十種的譯本；譯文方面，聽說也有人把第三次國民黨代表大會譯成了第三黨會議。諸如此類，無疑地，是應該加以克服和改進的。

然則怎樣去克服和改進呢？謝貽徵先生替我們擬定了兩項辦法：一、由出版者成立一種協調，共同商定翻譯計劃；二、每年舉行翻譯考試。張友松先生卻以為這方法有流弊，他主張由全國有志翻譯事業而又具有切實努力的決心的人們自己結合起來，組織一個或幾個翻譯學會，來研究，推討，出版刊物，批評譯品，指導後進，發表心得，以及負責校訂會員的譯作等等。

我同意於張友松先生的辦法，由翻譯工作者自由結合起來，組成幾個團體，但這幾個團體必須保持經常的接觸，避免工作的衝突，否則，大可利用團體，由個人之間的搶譯，擴為宗派之間的搶譯，因此引起更多的糾紛的。

我的說利用團體，也並非無的放矢。因為在上海，已經有過這樣的故事：

一個同人刊物的編者，向一批文壇指導者去拉稿，他們點點頭，唯唯喏喏，答應了，然而卻並沒有稿子寄過來，後來也終於拉得了一兩篇，卻是幾句不三不四的門面話，這編者抓了抓頭皮，終於給登載了。然而立刻招來了批評：不夠前進呀！缺乏戰鬥性呀！而其中說得最爲激昂的，卻正是自己祇寫過幾句不三不四的門面話的那位文壇指導者。

然而這不算壞。我們的編者終於學了乖，存心警戒，對於這些文壇指導者們的文章，留意細看，漏洞一多，就實行退稿了。不料退了一篇新的批評家的稿子，因此惹怒了詩人，批評家，指導者，開會討論，集中攻擊，這同是斷定編輯者在造就個人地位。於是的一致決議，要用團體的力量，壓迫這同人刊物的編者，來登載「他們的朋友」

的文章了。

我拾起我的憎恨，投過去。

五

我的憎恨爆烈了，但那火星，並不觸及這團體的本身。因為我知道，除了被強奸，被利用來作為壓迫個人的工具以外，有些事情，是必須通過團體的關係，用羣的力量幹起來，才有成效的。但切忌的還是宗派的觀念。

關於選集的編印，也如此。

在上海，去年曾經印過一部第一年，雖然由私人印行，但因為得到許多文化人的幫忙，翻翻內容，不算壞。今年又出版了第一年的續編，據說裏面還有雜文，據說雜文裏也有我的文章，買來看時，卻原來是一篇關於五卅的小文，而我的着眼點又是偏重於西洋文化的介紹的。為什麼要選這篇與抗戰並無直接關係的文章，去排在

號稱抗戰一年來的代表作的結集裏呢！我曾經用雜文的形式，畫過蛆蟲的嘴臉，打過敵人的嘴巴，我歌唱鬥爭，我進襲苦難，編者選了我的與抗戰並無直接關係的文章，是不是要取消我在這一方面的心力，封鎖我在這一方面的呼號呢？

但等我再去，看別的被選入的雜文時，我終於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那些雜文的來源祇是一個：譯報的副刊。我也祇爲譯報寫過一篇文章：這就是被選在第一年續編裏的一篇。

不錯，譯報的副刊是有牠的可愛處的，牠通俗，潑刺。然而要選抗戰一年來的雜文代表作，卻又如何可以以此爲滿足呢？我想，也許是我們的編者並不知道上海還有其他的副刊和期刊的緣故吧。

七月二十日。

我要逃避

夢裏的「江湖」

從亂書堆裏翻出了一份活葉文選，那是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一接觸到，我就立刻把它挪開，推落了。接着又從沉思中拾了起來，一個字一個字的默誦着。

現在已經是深夜。牀上響着孩子的鼾聲。在妻的凝視着的遺像前，我落入了更深的沉思。一個月來，由於喪葬救護而竭力支撐着的身體，不覺癱了下來，無端的感到疲憊和蒼白。看窗外，長夜正在進行，碧天如水，洒下一地慘白的月色。四圍是出奇的陰森，淒清。蕭蕭的秋風帶來了人間的世智，徘徊於生死有無之間，昏沉沉的頭腦蘇甦過來，我又分明的感到：妻已經不在人間，兩個孩子已經不在人間，三條活躍的生命相繼消逝，在艱苦中掙扎着的小小的家庭，也隨着粉碎。現在，祇剩下我和睡在

床上的一個六歲的孩子了。

讓寂寞吞蝕我的餘年吧，我感到疲乏。

七月以前，我親自殮了一個三歲的孩子；一月以前，我親自殮了一個廿七歲的女人；廿幾天前，我親自殮了一個五歲的孩子。他們都似朝花，具有着灼熱的青春，然而卻不能不默默地萎枯了。他們一個個從我的手裏逝去。我麻木，模糊，竟至於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是些什麼人。然而現在我明白了：他們是我的女人！是我的孩子！

而這所遭遇的又是死——永不復回的死！

我還能有什麼希冀呢？二十年來，飽嚙了人間的所謂拂逆，還不會挨近中年，卻又駛上了比有島氏更慘的命運。人世的旅途誠然是遼遠而又昏暗的，但我還得帶領活着的孩子走上去。我們真像酒轍裏的鮒魚，『相濡以沫，相煦以溼。』然而莊子說道，『不若相忘於江湖。』可惜此刻所有的祇是一個酒轍——一個破碎支離的

人家。

我們也曾有過小小的『江湖』。孩子年輕，從溼沫裏長大起來，也許會習慣於寂寞，忘記這曾經有過的優闊自如的生活的吧。可怕的是我自己還有記憶，像蠶絲一樣抽不完的記憶。鋒利猶如尖刀，輕颺猶如游塵，雖然『逼取便逝』，但它終於像肥皂泡一樣地壅積起來了。

這是夢裏的『江湖』，我被埋沒於記憶中。

我的對妻兒們賦與關切的，確是從驚風駭浪裏開始的，誰料波濤一經平定，面也就乾涸了。此時的一點悵惘，使我深深地懊悔了十年來的淡漠。在過去，我是一個出奇的忘了家庭的人物。這並非『公而忘私』，既沒有『三過家門而不入』之類的故事，也不像上海灘上的文藝批評家那樣，戴着臉譜，以文字作影射，暗報私仇，卻滿嘴裏都是『社會第一』。我還沒有修鍊到這樣的本領。忘了家庭，那倒是因為苦

於勞役，抽不出餘裕來和孩子們相對的緣故。早上八時出門，就這樣夾着書本，東奔西跑，一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夜闌人靜，這才踏着寂寞的街燈回去。家裏的大小事情，完全是由妻照料的。中宵私語，正是我們磋商家務的時候，她沒有一件事不和我商量，卻沒有一件事不預先安排定當。所謂磋商云者，其實不過是一種備忘錄式的通知，因為那安排，十九總是可以首肯的。

生長在舊式家庭裏，十幾歲上死了母親，她不但沒有留上一點灰黯的影子，卻反而由此養成了優越的處事的才能。偶有錯失，又勇於改進。和我相處十年，幾乎擺脫了所有的舊社會裏傳統的影響。我的性情，在或種場合上，常常是繁瑣的，感情的，而她卻正能彌補我的缺憾，更有決斷，更富於理智。

生活磨鍊着人，然而這究竟是成全，還是摧毀呢？苦難使她果敢，堅強；但從女性特有的氣質裏，她還保持着原來的優點：細心，周詳，柔和，尤其是耽於思慮——這末一着，雖然便宜了這小小的家庭，於她自己，卻是太過吃虧了。因為這終於成了她的

致命傷。

「唉，我倘使不好，你怎麼辦呢！」在病中，她常常這樣嘆息着。

她總是惦念着我，惦念着孩子們。即使在熱度最高，講着囁語的時候，也還是對生者的關懷和憂慮。這憂慮並不過分。沒有了她，我們是難以生活的。是我們吸盡了她的血，是我們殺了她！

而且，特別是我自己。

我又是一個出奇的不注意自己的人物。說得好一點，是隨便；說得壞一點呢，那該是胡塗。外面下雪了，而我還是拿着日常穿慣的夾衣，披上身去；昨晚脫下的襪子，今天就不知去向，東尋西找；連沒有洗臉，就跑上講台去的事情也有過。我是向來不大留心這些的。有一次，終於在一個學生的日記裏，看到了他給我勾下的自己的面相：「蓬頭髮，矗出着的鬍子，講起話來裝着手勢。」

是這樣的麼？我不很清楚，仔細想來，大概確是這樣的。倘使在朋友們的腦子裏

留下了較爲整潔的印象，那末，這就多半是經過我的女人的關切了——

「頭髮長足了呢！」

唔，又該去剪髮了

「換一換襯衫吧！」

呀！又是兩天過去了嗎？

「天氣放晴了哩！」

不錯，我的腳上還套着笨重的橡皮鞋。

浮泳於妻的心血裏，就這樣渡過了青春的小河，我看見了那條悠長的路。然而我毫不疑懼。爲的是在寂寞的旅程上，自信還有一個永久的伴侶，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關懷着我。如果說人生是一個戰場，當我挺着長矛衝向敵人的時候，她便是我護身的盾牌，緊貼住心胸，暗暗地承受着四面射來的亂箭。

長矛的功績也許會受到稱賞，然而誰會注意過盾牌的創傷呢？撫摩着這平凡

的斑痕，感懷往路，我爲自己的健康羞慚。

在這細瑣的對我身心的關切裏，在創傷的積儲中，歲月默默地齧蝕了她的華年。婚後四載，我們開始有了孩子。一個，二個，三個，她的健康因此受了很大的影響。三次生產使她向死亡跑近了幾步，然而我敢說，從那時起，她的心卻茁生了更長的根，更堅執地種在人間了。她愛我，她愛孩子們，因此也熱戀人生，熱戀工作，絮絮地爲我計劃着十年廿年後的事情。有誰懂得這夢似的「絮絮」的意義的麼？這是人情的最美的表現。

戰 爭

然而事實終於踏碎了美麗的夢影。

二年前，那時候我們已是兩個孩子的爹媽，住在上海北區的一間小房子裏，過

着平凡而又愉快的生活。大的一個孩子是四歲，第二個也已經三歲了。白天，他們追逐着學老虎爬，一個在前，一個在後，那邊叫一聲，這邊也跟着叫一聲，他們是創造得靈活，卻又模仿得巧妙。早上雙雙地跑來問好，晚上又並着頭酣睡。我們是生活在笑影裏，生活在人們的羨慕和讚嘆裏，貪婪地享受着人生，幾曾防到命運的惡意的窺伺！然而時間不可抗地流過去，到了秋天，妻的肚子又在蠢動，第三個孩子急待分娩，而由於虹橋事件的發生，上海的風聲卻一天不如一天地壞下來。雖然報紙上時時傳播着「和平」的消息，然而每個人都有了大風雨即將到來的預感。作爲一個中國的百姓，我想，對於時代的感覺，是從來不會像這一次那樣敏銳的。而且這敏銳的感覺也移進了我們的小小的家庭，和妻商量之後，決定把第二個孩子送到鄉下去。我還有點猶豫，妻的意志卻非常堅決，很快的整好了行裝，催促動身。她自己雖然大着肚子，卻不肯離開我，情願住在上海，靜待生產，我拗不過她，在一個悶熱的午後，忽地帶着次兒出門。正當離別的時刻，孩子只是呆呆地看着，彷彿有了重大的心事。

似的，妻的眼淚卻像檐雨似的流下來了。在這一瞬裏，我懂得了這一次的離別的意義。是那種力量使她堅決起來有什麼要使這不可避免的缺憾橫亘在這母子之間呢？

我要彌補，用血肉來填塞這缺憾的存在。

到了傍晚，因為擠不上輪船，終於又和孩子從碼頭上折回來。看着母子倆的熱烈的歡呼，擁抱，我的心底栽下了可憐的想頭：打算取消帶着孩子回鄉的計劃了。第二天，妻又固執地催我們走，一點考慮的餘地都沒有。自詡懂得這意義的我，有什麼言詞可以反駁，還有什麼比低着頭默默地出門更好的辦法呢！

感謝上蒼，我常常得到這超拔的精神的援救。

八月十二日早上，我們到了故鄉。帶着悵惘的心，我把孩子交給了母親，乘他笑着在欣賞雞埕裏的雞鴨羣時，我偷偷地溜了出來，踉踉蹌蹌的跳下船。然而從上海的電報裏傳來了更壞的消息。所有的輪船都停止駛滬。費了許多週折，才得於最後

五分鐘裏，趕上了一隻外商的輪船，行駛了半夜，牠把我帶到無邊的海洋裏，卻狡猾地拋下了錨。謠言紛紛地起來了，說是日艦將向客船開砲的也有，說是吳淞口封港的也有。這一切，都是對我的肉心的戲弄。焦灼，徬徨，苦惱，我從故園收回了那顆被扣住的心，卻飛向遠天的烽火中，那兒有一個孱弱的孕婦，一個須人護持的稚子，一個正待我們服役的怒吼了的祖國。

然而命運給我安排下的並不是一個快爽的立決，卻是零細的碎割，恣情的擲掄。幾經波折，終於在八月十三日早晨十時，輪船駛入了吳淞口，聽到了第一發鎗聲，我參加了民族革命戰爭的開幕禮。

這一晚，在舊寓飽聽了一夜砲聲，忽忽地料理了一些私務。十四日早晨，帶着妻和大兒，搬到了法租界西區的一所破舊的平房裏。工作忙起來了。從此以後，我又暫時地忘記了這小小的家庭。

就在戰事正酣的當兒，妻卻患起急性的痢疾來，躺在床上，幾乎瘦成了一副骨幣，完全不能動顛了。死的影子籠罩了她的疲弱的心。從醫師那里得知了這多次的努瀉將會影響她的有孕的身體時，我也暗暗的慌了手脚，餵食調藥，早晚都由自己來動手。她的深陷的眼眶裏，時時射出不滅的感謝的光輝來。這光輝，於今卻成了我的回憶裏的明燈了。我想，在生之途上，它將會永遠照視着我，照視着被遺下的父子，而作為有力的鞭策的吧。

然而經過醫師的幾次注射，幸而病勢漸漸地輕下來。她又有精神來懷念那千里外的孩子，以及為眼前的我和大兒的茶飯關心了。阿阿，我們這相依為命，吸着妻子和母親的血而長大起來的人物呵！

在妻的病體恢復後不久，戰爭從閩北移到了滬西，由於住所與火綫接近的緣故，鎗彈時時從屋頂飛過，平房在巨響裏發着抖，彷彿受着山風嘯括的危樓一樣。而第三個孩子卻於這時候見了世。經過了劇烈的掙扎，顛悴地躺在床上的妻，顯得分

外瘦削了，空寂的房間裏盪漾着嘹亮的嬰啼。在這年輕的母親的心上，又披上了一層親子之愛的薄紗。

鎗礮之類的聲音時擾亂着妻的安眠，使她驚悸地從睡夢中醒來。一張眼，先要動問我是不是在家。當她看見我坐在身邊的時候，才又合上眼皮，靜靜地去重作休養；倘不，可就要煩躁得從床上撐起身來，看定時計，盤算着我的行止，作着種種可怕的預擬。直等我平安地回到家門，這才放下了心。當我聽着她述說這預擬中的神話時，往往不免於失笑。——但是，懲罰我這無知的是現在的痛楚。阿阿！這能是可笑的事情麼？

揭去喧鬧，人們就碰到了難堪的沉靜。孩子彌月後幾天，大軍從上海退卻了，砲聲遠去，留在這『孤島』上的是無邊的寂寞。這寂寞長大起來，像一個海，海面上飄浮着無數的幽鬱的心。

七八年來，爲了一枝禿筆，我曾遭受過許多意外的災禍，蘸盡了妻的心血。這一

回，自然也沒有例外。在人言洶洶的當兒，終於得到了間接的通知，爲求減輕妻的掛慮，我們就悄悄的搬了家。

蟄伏在威脅之下的是冗長的歲月，時間拿着一枝彩筆，在人們的心上畫下了恐怖的影子。但是，戰鬥的上海卻像蜥蜴的尾巴一樣，雖然從本體上截了下來，卻依舊不斷地跳動着。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裏，我深深地愛上了這輕易不爲人所瞭解的都市，至於想死守着牠，如果說我的遭際是一幕悲劇，那末，我自己就是這悲劇的導演者。

看着第三個孩子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能笑，能說，能跑，我們的對次兒的懷念，也就愈益深切了。十幾月來，失侶的悵惘時時盤踞在大兒的心頭，無論讀書遊戲，他都需要一個同伴。這小的弟弟是一個不聽指揮的搗亂者，扯毀書本，摔掉玩具，這一切，都使他覺得煩厭，因此也更想念那在鄉下的弟弟了。他幾乎天天寫着不成樣的

信，吵着要我寄出去，信裏簡單到只有幾個字：『弟弟，你來，你來同我玩。』下面是歪歪斜斜的署名。

不可抗的是出自童心的真率的要求。然而命運不但欺騙了我，也欺騙了這幼小的孩子。今年春天，由於敵機的不斷轟襲，故鄉的風聲突然轉緊，我們的心底也就更無餘隙了，緊緊在裏面的是一團火，一個迫切的期待。這期待得到滿足：母親帶着孩子出來了。使我痛苦的是還得去回憶當時的歡愉。人們爲什麼要留下所謂『陳迹』呢？倘使在華筵盛張，興高采烈的當兒，想一想酒闌人散後的懊恨，淒寂，也許會收起他們的笑容吧，這雖然影響一時的豪興，卻爲往後的年月減去多少愁端呵！

孩子生怯怯的躲在祖母背後，年輕的母親立刻把他拉到懷裏，像皮球一樣的拍着，搖着，邊吻邊叫；大兒和三兒搬出了所有的玩具，讓這遠來的客人欣賞。愛把一切都溶化了。春在人間，春在這小小的家庭裏。

暗影

然而人間沒有長駐的春天，歡樂卻比春天跑得更快。正當我們貪圖這小小的團聚時，暗影終於悄悄的襲來了，她迅速地展開，罩住。——我感到無比的重壓。

鄉間的風聲平息下去，母親又作歸計了。妻和她商定，準備仍舊把次兒帶着走。什麼都已經舒齊。不能舒齊的是我的爲父的心胸，由於愛念的驅迫，我採取了相反的態度，堅決地不予同意。有什麼理由要讓我們重嘗這生離的痛苦？爲什麼要把孩子塞入烽火的氣氛中去呢？送走了淌着惜別的眼淚的母親，終於特強的把孩子留下了。回想起來，這真是可怕的佈置。我自以爲在戰亂中成全了他，不料愛念竟是殺人的兇器，使我不自知地成了人肉作坊裏的幫手，卻把自己的孩子綁在剝人權上，靜靜地等着宰割，等着這向我們劈下來的命運的鋤刀。

母親回去後不久，三兒病了，雖然時或發熱，卻不給我們一點應有的憂慮。他還

是照常的說笑，奔跑，彷彿沒有病苦一樣。然而他倒底病了。一誤於西醫的不負責任，再誤於中醫的不諳醫術，這小小的船隻，經得起礁石的幾下碰擊呢？爲了要從死神的手裏奪回我們的孩子，妻和我都用盡了心力。晚上，兩個人輪流看護，遞水給藥，一刻也不能安睡。尤其是妻，即使由我輪值的時候，她也還是醒着的。可詛咒的是我的無知和淺薄，我總以爲這是偶然的失眠，她是在等候着孩子的病體的康復；又怎麼會知道，她竟以自己的心血，當作了這幼小的生命的燃料，而默默地灌注着，燃燒着呵！

現在，這心血是枯乾了。這是爲我們而枯乾的。

孩子的病狀有過一度的轉機，首先是從昏迷裏獲得了知覺，他呵着小嘴，彷彿在訴說自己的痛苦，一面又提起瘦削的雙手來。我生平沒有宗教的信仰，但在這一瞬间，卻虔誠的皈依了，我皈依了一顆悲憫的心，一個無劫的世界。如果說宇宙是偉大的，我更在一切偉大之上。

然而決不放鬆的是「死亡」的黑手。聽信着庸醫的囑咐，我們終於失去了唯一的可以挽回的機會，卻讓孩子的病勢逐漸加重了。護持因此也愈形忙迫。這是無聲的惡鬥。掙扎又掙扎的搏打下去，我們受了希望的多少回的欺騙呵！四月下旬，在一個淒清的星期日的晚上，噩夢終於吞沒了我們。對着這爲痛楚所襲擊的父母作了最後一次的注視，掛着兩行眼淚，孩子悲慘的咽了氣。自始至終相信他不會逝世的，我，這時候就給呆住了。差幸妻已經暗暗地預備了後事——感謝上蒼，我又得到這超拔的精神的援救。——她默默地站在牀前，低着灰白的臉，除了眼淚在頰上爬行外，什麼都寂然不動，彷彿是一具俯視塵寰的臘像，在狂風暴雨裏，傳播着悲憫，堅忍，冷靜的種子。

哀痛，這在茫茫的人世裏是常有的際遇。出入歡場，逗遛逆境，何處不黏着酸辛。然而一經發揚，卽近淡薄，這樣的人，是幸福的。可怕的倒是沉靜的秉性。擎起了生命的苦杯，一聲不響的喝下去，喝着，喝着，這是終究會醉倒的呵！

對於這幼小的生命下了絕望的斷言，來診的醫生卻提出了題外的警告：勸妻好好的保養自己。我知道要緊的是給她休息，拉她躺下。而她也終於真的躺下了，張大着眼睛，發着一百另四度的高熱。

磨碎我的靈魂的是更大的苦難，我已經走進了但丁設想裏的地獄。這時候，次兒也傳染了疹子，到了非常危險的境地了。我一面籌畫款子，一面忙於請醫生，晚上就鬧着失眠。在沉鬱和痛苦的絞煎裏，生存失去了應有的意義。我的腦袋似乎脹大了許多，頸骨疲軟，四肢無力，然而精神卻亢奮着。在幾乎近於淒厲的呻吟聲裏，在陰慘的對於死者的追懷中，我竭力發掘那可以活下去的路，而且也終於把它找到了。這是我僅有的幸運。

肺結核

雨不斷地下着。是悽苦的散播着愁悶的日子。暫告康復的妻，又泄泄的發起熱

來，雖然十分輕微，卻幾乎天天都如此。看着這滯滯而又黏着的熱度，我恍然於病情的惡劣，竭力隱瞞，多方的加以譬解和說明。然而有什麼用呢？佛家護生，把螻蟻的生命看得像人命一樣，而醫師卻是把人命看得像螻蟻之命一樣的。雖然循環相似，其間卻有尊貴和輕賤的不同。當妻在醫院裏作着進一步診察的時候，醫師終於殺死了我的苦心，對着病者，率直地說出了她的病源的所在。

恩愛的牽絆揉傷了這年輕的母親的心。回到家門，對着高聲歡呼，飛快地迎上來的孩子們，她苦笑着。從顫抖的嘴唇裏拚出一聲輕輕的答語，就別轉頭去，在無語的驚愕中，泫然的流下淚了。

這是愛的陷坑，這是生命的沉淵。

人間有什麼藥可以醫好靈魂的病的麼？我將窮畢生之力，「寤寐求之。」然而目前所能做的不過是一些浮薄的慰藉：向書店買了幾本肺結核療養法，以及許多輕鬆而不費力的小說；定好牛乳和雞蛋；一面又竭力注意食物的營養，空氣的調節，

短時間的散步等等。原來的醫師處是不能再去的了。得到幾個朋友的介紹，就跑到 Y 醫師那里去，這醫師是留日的前輩，屬於所謂「德日派」，又是中醫的死對頭，在中西醫的論爭裏，頗會打過幾次顯赫的大仗。驗痰的結果，終於給病狀以更確切的憑證，然而卻並不過於嚴重：五個單位裏發現八條。據解釋，倘能好好的加以調養，是仍有復原的希望。誰不愛護珍惜這希望呢？好，我們就決定請他診下去。

在這些徬徨不安的時期裏，我也曾經考慮過種種的方法：易地，可是瀾漫南北的不都是血腥的烽烟，她又怎禁得起遙遠的跋涉！還鄉，可是縱橫家園的不都是敵機的影蹤，她又怎受得住重大的激盪！她需要靜靜的休息，然而這卻是動亂的年頭！她需要吸收多量的營養，然而這卻是瀝血的時代！

戰爭遠離了「孤島」，留在這兒的是更艱苦的掙扎。緊接着人頭案，現在是一起一起的政治暗殺，奴隸的命運在四圍裏招展。由於剝削的加重，日用品定價迅速地飛漲，人們在生活的重壓下喘氣。爲了三四元乃至七八元一天的醫藥費，我是連

喘氣的餘暇都沒有。這情形很傷了病者的心。當我背負着疲倦倒在椅上的時候，她往往嘆着氣說：——

「總是我拖累了你，總是我拖累了你……」

然而我還有餘力，抖掉這滿身的疲倦，重新振作起精神來。我要生存——生存在自己的希望裏。

自從明白了病症以後，妻是一直和孩子們分食着，但因爲住所狹小的緣故，不能有較遠的隔離。母子的情分又使她難於忘却，每到中夜，因爲咳嗆而不能熟睡，她就時時記起自己的孩子來：也許毯子沒有蓋好，也許被蟣蝨叮着了！就這樣輾轉徬徨，獨自消受着長夏的無聲的靜夜。

從六月到八月，病狀時好時壞，變幻得猶似大海洋裏的波浪，我們的感情也隨着在起伏。醫師驗定她沒有孕，肺病偏在一面。爲了作改換治法的準備，我就陪她到一家醫院裏，去照了X光的相片，大致都和診斷差不多：左肺上端有一個小洞，隔膜

上牽，右肺無異狀。

因為對於疾病的關切，時時從書裏和口裏，得到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據說肺結核還有三種外科的療法：一，抽隔膜神經；二，打人工氣針；三，開刀抽去肋骨。這三種方法裏，以第二種最爲普通，是肺科常用的療法。由於服藥的難於見效，更經幾位朋友的慫恿，我們就決定去試一試。我把這意見告訴了Y醫師，他也同意了。商量着怎樣把妻送入醫院去。

雖然到了秋天，氣候卻還是相當的悶熱。帶着幾分焦躁的妻，別過了孩子們，用手帕掩着臉，獨自跨上了車座。孩子們遠遠地站着，彷彿送着出征士那樣，大家都有一點肅然了。我担當着幾月來的苦難，却受不住這片刻的沉默，這沉默毀滅了我，我努力自持，卻終於淒然的泣下了。

醫院的病房是一帶低低的平屋，因為在熱天，顯得格外氣悶，據說晚上還多蚊子。護士的看顧又不週到，許多事情都得自己來動手。飯菜粗糲，無法下咽，只得由家

裏做好送進去。雖然過不慣這樣的生活，然而求痊的願望超越了厭惡的心思，在無可奈何下，妻只得住下了。

每天下午，安排好孩子們的事情，我就帶着點心和食物，獨自跑到醫院去。正當八·一三紀念前幾天，租界的戒備十分森嚴，許多小道都給堵塞了，我就盤盤繞繞的在路上走着，忽而想到孩子也許在哭吵了，忽而想到病人也許在踴望了，往往弄得滿頭大汗。妻和我見面之後，首先是問孩子們好不好？晚上睡得怎樣？可會想起他們的母親？永遠是這些話，彷彿說不厭，也說不完似的。住院生活的苦悶，醫師診療的隨便，很引起她的反感。更由此招來悲觀，結末常常是對於自己的病勢的失望。

然而我把她從失望裏撩起來，我們要鬥爭下去！

進院後的第三天，據說診察完畢，可以試行打針了，我在前一天已經簽了字。這大下午，趕緊跑到醫院裏去問時，出乎意外地，試驗的結果失敗了，隔膜黏住，空氣不能壓進去。妻的臉色很難看，她的心裏種下了更深的失望，打動了出院的念頭。據醫

師說，休養兩天，還可以換一個位置試試看。

我仍舊把她從失望裏撩起來，我們要鬥爭下去！

第二天一早，醫院裏送來了一張字條，拆開看時，可正是妻的親筆：——

張。

今天早上我吐了幾口血，此刻要你到院裏來一趟。請不必擔心，我的身體仍舊和平常一樣。和C先生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接出院去，我不想再住。請千萬不要慌張！餘面談。願孩子們安好！

嫩。

聽從醫師的意見，我又把她勸住了。並且告訴她吐血是肺病常有的現象，也許第二針可以打進去，也許打進空氣後病勢就會輕下來。懸在我們眼前的不就是那個希望麼？然而我把希望欺騙了她，而她卻終於斷送在事實的手裏。

第二次的試驗又告失敗了，針頭離開皮膚，立刻又吐血。這才知道先前的調查

工夫做得太隨便。打針的又非正式醫師，却不過是剛從醫學院裏出來的實習生，兩次吐血，正是由於手術低劣的緣故。

這一回，她是再也不肯住下去了。

得到妻從醫院裏出來的消息，彷彿乳燕見了含食歸來的母親一樣，孩子們拍着手，喧笑着滾攏來；妻也舉起雙手，似乎要擁抱他們，卻又突然放下了。我感到惘然。偷眼看妻，她的臉上正堆滿笑容，不錯，這是應該的，因為她終於又看到了她的孩子們。

出院以後，妻又吐過兩次血，平均計算起來，熱度也比較高一點。遵照Y醫師的囑咐，天天給她吃西瓜，一面又在服藥裏放入止血的成分去。在秋天漸漸地逼近之際，病勢似乎較有轉機了。

然而她還時時懊恨着人工氣針的治療，以為醫院裏是不該去的，對於吐血，總有着可怕的預感。

不料到了九月中旬，每天下午，病人又突然發起高熱來，第二天早上就退清。Y醫師也慌了手脚，以爲這是消耗熱，是肺病末期的現象，驗血的結果，卻發現了瘧疾菌。給服丸藥，熱度漸退，而渾身卻就從此黃起來，由皮膚到眼白，推而至於痰，眼淚，鼻涕等等，無不臘黃。體力也就越發顯得衰憊了。

感謝朋友們的好意，爲我殷勤地介紹醫生，然而在謬托「藝術」亂處方脈，啃着「國」字招牌過日子的中醫們的手裏，我是得到過慘痛的教訓的，決計不去試。這回擇定的是稱爲「肺病專家」的W醫師，也是留日的，和先前的Y醫師還是老朋友。但他率直地告訴我，妻的肺結核外又加了黃疸病，那成因，是由於多服了瘧疾丸 Atebrin 的緣故。

在W醫師那裏看了七八次，病勢頗有起色了。因爲居家苦悶，頗想出去散散步。雙十節那天，就帶着兩個孩子，和我一同到十里外去剪衣料。這衣料是我的，也有孩子們的，我們披在身上，又披在心上，這是永恆的暖意，是摯情的最崇高的遺留。

但在彼時，我總以為她是在逐漸康復的路上。

災禍的連續

一九三九年十月廿二日，那天是星期日，是我百忙中偷閒休息的日子，雖然白天去出席了一個小小的會議，但在黃昏到來之前，我已經回到家裏了。晚飯後妻坐在沙發上，和我閑談着家務，又計劃着明天怎樣和W醫師去商量打胎的事情。因為三天前，W醫師推翻了前醫的診斷，以為妻恐怕是有孕的，而這疑似的一點，終於給老於產科的C醫師證實了。我憂慮着她的體力，她對着櫥鏡，自己照了照，現出愉快的神情說：

『這幾天臉色好了一點，』一面又舉起手來，撫摸着手背，『你看，手上也生了一些肉。』

聽了這話，我也覺得非常高興了。——這是半年來少有的心境。

約摸是八點半光景，我勸她上床休息，自己卻還在燈下寫着一篇未完的稿子，直到十一時許，這才解衣就寢。剛一朦朧，却聽得咳嗽的聲音，似乎還有痰。扭亮電燈，看見了鮮紅的幾塊，連忙叫醒伴睡的人，倒了一杯冷開水，預備給她喝。血正在不住的湧出來。我抱住她，叫她喝下去，她低頭答應，喝了一口，血還是湧上來。

『努力自制一下吧！』我發急地喊。

『止不住呀！』她非常清楚的回答。

血還是湧上來。

『這回完結了！』聲音依舊是那麽清楚。

血還是湧上來。

『發，你去！』

說完了這一句，她的頭往後垂下了。被頭，墊毯，褥子，痰盂，地板，一片的紅色。我失聲痛哭，狂奔着去倩人通知醫師，但等醫師趕到時，卻只賸下胸口的一點微溫，和嘴

角的兩條血流了。這便是生命的結局！這便是希望的終的！

我從幸福的園地裏被摔出來，陡的，什麼都黑暗了。

然而時間決不給我以痛哭的餘暇。

我知道充塞在餘生的是更多的風暴，可是它來得太驟，打得太急了。我只有默默的忍受。

在妻逝世前四五天，次兒也發起熱來，一面又嚷着肚子痛，頭痛，帶到醫院裏去驗時，卻說是消化不良，服些藥水，就會痊癒的。我們相信着這診斷，暫時放下了焦灼的心思。

有什麼比輕率的信任更可怕的呢？這是鳩毒，人們往往於不知不覺中吞下它。妻的喪事料理完畢，次兒的病勢却又加重了，最顯明的是多了一個現象：嘔吐。我從哀駭裏掙扎出來，帶他到著名的小兒科K醫師那兒去。當他正在按狀凝思的時候，

我告訴他妻剛逝世，患的是肺結核。他驚叫起來：

『這是結核腦膜炎！這是結核腦膜炎！呵呵，這是無藥可醫的結核腦膜炎！』

是這樣一個霹靂，幾乎使我倒下來。醫師的說明加重了我的創痛，我完全失去知覺了。

然而我得生存，爲了孩子們，我要孤獨地鬥爭下去！

在廣漠的人間，在悠長的生命之途上，縱然我所捫住的是一串暗淡的日子，但對於孩子們的幸福，那是必須盡力來織造，來編成的吧。幼小者的病痛是爲父母者的地獄，對着這無母的孤兒，我肩起了所有的苦難。

彷彿在黑暗的原野裏摸索，也許什麼地方有一線燈火，我在等候，候着一個突然飛來的佳音。每天，帶着次兒到K醫師的診所去，打針服藥。一兩次後，孩子的病勢逐漸輕下來，連頭痛也不再喊叫了。到了第六次，K醫師就在診單上『結核腦膜炎』加下了一個疑問號，表示着自己的懷疑。

就在那一天的翌晨，孩子的神智突然迷糊了，手脚抽牽，症象很危險。請K醫師出診的結果，決定送入醫院，試行背脊骨抽水，注入一種僅有的新藥去。——這一種藥，是由一個丹麥醫師發明的。據報告，曾經在八個患者裏醫好六個，注射的時間是一天兩次，必需連續兩星期。但據介紹的雜誌說，這報告是靠不大住的，不過現在還沒有對症的良藥，只好姑且試一試。

「倘有效驗，我得趕緊做報告，這在遠東還是第一個哩！」K醫師鄭重其事地說。

憑着什麼能耐，進襲得這「遠東第一個」的倖門呢？我的感覺是沉重的。看着孩子的抽牽，真有無法替代的痛苦。

經過了三次注射，一切如舊，頗愛說話的K醫師，也突然轉成嚴肅了。他皺着眉頭，悵悵的說：

「他在走他自己的路呵！」

十一月三日晚上，孩子的病是達到彌留的境地了，打過強心針，依舊沒有效驗。K醫師就停了手，不肯再用藥。我苦苦地哀求，發瘋的纏繞他。他在病房裏陪着我，爲我說教，我感謝這殷勤臂解的好意，然而我看不慣這顆漠然的忍心。

「你應該去歇息了，我給你些安眠藥片。」

「不，請先爲孩子設法，再用些什麼藥吧！」

「不能，這會使他立刻咽氣的。」

「就讓他咽氣，讓他死得沒有痛苦吧！」

「不能！」

「我哀求你，讓他死得沒有痛苦吧！」

「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

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是這樣慘痛的情形：孩子的眼睛張得很大，注視着空茫，手脚不停地抽動，抓爬，這是在尋求活路，拉牽着自己的生命吧，我看不下去！到了半

夜，像囚犯脫了牢獄一樣，我從醫院裏逃出來，坐守着黑夜，再沒有勇氣去接聽第二天早上從電話裏帶來的噩耗。

然而時間仍舊不給我以痛哭的餘暇。

二十天後，我又接到家裏來的電報，告訴我年老的祖母，因為受不住哀傷的挫折，終於也擺脫了悲涼的暮景，戴着蕭蕭的白髮歸去了。

我只有沉默，躲入於冷冷的沉默裏。

人間獨語

時間是過了午夜了。靜下來，往事又沉重的爬上我的心頭，死者的影子，一個個在我的腦海裏出現，一切都和年前一樣，他們還恬着。

對於死，我沒有像希臘畫廊派哲人那樣堅忍的態度，我是感到哀戚的。然而卻

不願以自己的哀戚去博取別人的同情，在世人的所謂同情裏，那是掛滿着淋漓的鮮血的呵。

我只有沉默，躲入於冷冷的沉默裏。

爲了求得心的安寧，我要逃避。然而我還活着，離開了世情的摧毀，在死去的妻兒和活着的孩子之間，我找到了藏身的所在，默默地鑽進忙迫的工作裏，我決計活下去！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動筆，翌年一月改作。

株連草

—

不料又到了冷冷的細雨的夜裏。

人們都睡熟了，連狗聲也在疎落下去。我拮着一息的煙火，遙縈着遠天的烽烟，說不出是亢奮還是悲哀，我的心像一顆冰凍了的火球，盤旋於廣漠的空際，牠劃分了是非，善惡，生死，敵我，停留在無邊的冥想上。但是，也許是受着寒意的刺襲吧，不知怎的一來，幻想燙着事實，爲了雜誌上的一篇目錄，竟而撩起了一點血腥的回憶，這時候，我又意識到周圍是夜，是黑暗，是雨聲夾着狗聲。

我的心沉重起來，鉛一般的沉重起來。

這使我激動的並不是尋常的目錄，而是一份所謂「北京市政府警察局」的

禁書單。連刊物在內，被禁的一共有七百九十二種，我的一本文集也在內。這一本書，由於出版者的不負責任，在我所有已刊的作品裏，是印刷最壞，錯誤最多的一部。正如一個不成材的兒子一樣，每當朋友們提起它，我終覺得徬徨不安，「惘然者久之。」及到現在，知道它終於招致了敵人的憎恨，成了奴才們的獵獲物時，我的態度又完全改變了。說不出是亢奮還是悲哀，我的心不停地盤旋着，在北平，在上海，在日本，在一切陰暗的幽陬裏，我看見了那個網——殺人的網。

網的週圍掛滿着絲，飄動的絲，血絲。

然而夜終於深了，我的思緒也零落如血絲。有誰爲着嚴密的封閉和殘酷的虐殺而噤住的麼？死亡是黎明的犧牲，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也還是如此的。

二

揭開了封閉和虐殺，我認識了鬥士的足跡。

彷彿有人說過，日本的知識份子，是愛好和平的，也就因爲這一點「愛好」使他們失去了戰鬥的勇氣，終於不敢反抗軍閥的壓迫，成爲毫無力量的孱頭了。這對於一經打擊，就紛紛轉向，如林房雄，德永直，立野信之之流，的確是透骨的評論。但對於認真的革命者，這說法，其實是不大公允的。即使是在躲躲閃閃的理論裏，有時也會顯出堅定的立場來，這正是悲劇的材料，不能忘記的是日本的時代。

我們痛恨着孱頭的氣質，卻原諒了鬥士的作爲進取的戰術。

許多年來，正和有些別的國家一樣，日本的社會運動，也還是發端於知識份子的推動的。凡所禁壓，因此就集中在他們的頭上：監視，幽禁，鞭笞，鎗殺，乃至活活的打死，這曾經是日本的現實。及到如今，掛在統治階級的嘴角，用以爲示衆的材料，不就是知識份子的殘骸麼？

這一回，當然也不會例外的。

記得霍塞 (Ernest. O. Hauser) 曾說，「如果日本人民的手臂換成翅膀，

兩腿變做尾鰭，一定會更知道自己一點的。」然而我想，日本人民畢竟是被鎖在狹的籠裏，被幽在乾涸的泥沼裏，即使具了翅鰭，也還沒有高飛遠游的自由。在沉鬱死寂的空氣裏，背負着窮困和絕望，他們默默地飲泣着，送自己的兒子和牲畜上前線去。爲什麼要戰爭的呢？他們想不透，也永遠得不到合理的解答。

但在日本知識份子的心底，這問題，早已有了答案了。踏破了「雖知反抗卻又無力反抗」的影子，他們勇敢地散播着反戰的種粒：發行刊物，出版小冊，不但下鄉村，進工廠，而且還混入小學教師的隊伍裏，做着更遠更大的工作。這工作是堅實的。在進行侵略戰爭的中間，日本的軍閥們，也不能不時縮回他們的爪牙，來爬抓自己的頭皮了。

不錯，他們爬抓着頭皮，然而卻無補於內在的痛癢。

到了戰事發生後的第四個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頭皮終於抓破，因此而流起血來了。這就是所謂「人民戰線」份子的大檢舉。

什麼是「人民戰線」呢？軍部的解釋是含含糊糊的，忽而說是因爲左翼陣營裏正統派和勞農派的合流，企圖赤化；忽而說是由於無產黨評論家組合，全國評議會等團體的聯合，鼓吹反戰。誰又是「人民戰線」的領導者呢？軍部的指點也是搖搖幌幌的，這個說是議員加藤勘十，那個說是理論家山川均，第三個又說是勞工運動領袖黑田壽男。倒底是怎樣的呢？留給我們的回答也就是這含糊和搖幌：我們不知道。

然而倘要知道，其實也不難找出究竟來。曾任內相的末次信正說道：「我決計毫不遲疑地根除一切自由思想的殘餘。對於他們，尤其是自由思想發源地的東京帝國大學，我決計毫不加以容情。」可見除了軍部的寵犬外，凡屬日本的國民，就統是「戰線」派，各有各有被拘禁或殺頭的資格的。

檢舉的中心雖然在東京，但波延的區域幾乎遍及了整個的日本；拘禁的工作雖然開始於十二月十五日，但搜求的時期卻繼續了五個月十五天。及到一九三八

年五月三十日，這才由官方公佈了檢舉的結果——

「全國被捕者總計：一三〇〇名。內分新興佛教徒八〇名，政黨分子及勞動全協分子一二二〇名。

「提起公訴者：二三五名。

「警視廳直接檢舉者：四〇〇名。內分：新興佛教徒二六名，共黨二四名，全協五三名，全評三一名，政經研究所一六名，新協劇團一九名，五月會二〇名，勞動雜誌七名，雜誌街一名，帝大平民教育館三三名，東交組合一五名及其他。」

這些造反的人們裏，連和尚和工人在內，大抵都是知識份子——著名的知識份子。除了上面提及的加藤勘十，山川均，黑田壽男外，勞農派的豬俣津南雄，大森義太郎，向坂逸郎，鈴木茂三郎，荒烟寒村，稻村順三，伊藤好道，岡田宗司和中西伊之助；自由主義者的河合榮次郎；教授團的大內教授等等，也都在內。這是無餘的搜捕。在今日日本的國土上，只有剝奪了自由的牢獄，才是容納正義的所在。

然而牢獄以外的天地，也還是並不自由的。

末次信正的所謂對「自由思想發源地的東京帝國大學，我決計毫不加以容情，」是由衷的恨語。爲了要把學校轉成軍營，在肅清「可疑份子」的名目下，不但逮捕教授，而且還特派海軍次官平我爲帝大的教務長，於是能「掉槍花」的軍官，愛「出風頭」的紳士，就一齊登了講台。這回是預備去攻佔青年們的腦袋了。一番佛，一手指揮刀，還有誰敢不服的麼？然而出於意外的是：原來的師生兩面，大家都

不服。

爲了逃避這「合污」的「同流」，自愛的教授們紛紛離了校。

就在發表思想檢舉結果的那天，逮捕學生的行動開始了。東京警署裏派出警察，在大學附近搜查，從茶室和麻雀館裏，拘捕了學生四十四名，除了明治大學和東

京醫藥專門學校各一名外，其餘的都屬於早稻田。六月五日，又發動了第二次的逮捕，被捕者六十八名，其中有五名是女生，有七名是中學生，大部分是屬於日本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中央大學，外國語學校，東洋商業學校的。第三次的逮捕是在同月二十一日，落網者一百三十餘人；一個慶應大學的學生，在接見新聞記者的時候，發表了如下的被捕的感想：——

「我因爲下午沒有課，陪友人到金春電映院去看新聞片，不料後來警察把我們一個個帶到刑事部去，叫我們寫了誓約書，才放我們出來。我問他們：『看正當的映畫倒底有什麼不對？』他們說：『從學校回家之後，就不要出去了，如果要出去，須得父母允許，和家裏人一道出去才好。』這完全把我們當作小學生看待！他們又把手按在胸前說：『喂！明白嗎？如果不明白，就留在這裡再說！』但是，我們究竟爲什麼被拉到警察署去，這理由至今還不明白。同學們都和我一樣感到不滿。長此下去，東京的街道，我們簡直沒有行走的權利了。」

是的，被拉到警察署，或者押入拘留所，這理由，大抵是無法明白的。許多知名的人物，都默默地走入牢獄，毫不分辯。連曾經提出『支那軍之鬼畜性』說中國人是『鬼畜以上的東西』，希圖以此博得軍部好感的山川均，在被捕的那天，和他的夫人菊枝見面時，也只是沉默無語，冷靜地，吩咐她好好的哺養後院裏的鸚鵡。

爲什麼要不聲不響，俯首就範呢？我想，這大概就是所謂無言的沉痛吧：警察既不是可與分辯的人，衙門也不是可以分辯的地方。說不明白，還不如閉口之爲愈。

然而青年們是沒有這樣的世故的，上面提及的談話，已經可以算得『天真』了。而早稻田的全體學生，却還推派代表，向警署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但這又如何抗議得了呢？在五大學當局和警署的聯席會議上，終於招來了對這『抗議』的暗暗的答覆，據警署的表示：『警察方面，向來是以父母之心來實施取締工作的，所以……』

這還用說得麼？我不想抄下去。世上恐怕也未必會有愛聽謊話的耳朵的。

然而却不妨來看一看出自這『父母之心』的設施。

禁止拍照，禁止收聽外國無線電播音，禁止在公共場所低聲會談，禁止攜帶有關於中國抗戰的西文書籍，這些屬於政治範圍的箝制，早已成了週知的事實了。至於有關於經濟的禁用令，也在一批一批的公佈。西洋的影片，樂器，化妝品，娛樂雜誌等等，當然是要限制輸入的，連西文的教科書，也只有圖書館方能購買。西裝在逐漸減少，皮鞋已改用紙製。爲了節省汽油，就提倡徒步；爲了限制電力，就改用蠟燭；銑鐵製品如書架，燈架，書桌，電灶，水壺，剃刀，紡績機，洗染機，計算機等，一律都禁止使用；釘子，火柴，肥皂，紙繩，網，以及一切紙製品和棉織物，也加以嚴格的限制。及到最近，民政黨議員北聆吉，竟至於提議屠殺全國的貓犬，以節省飼料。這確是出色的打算，但從這里，人們也可以聽出末世的哀音來。

物質的享受回到了原始的狀態，精神的徬徨卻到達了痛苦的尖頂。

工人的工資一再減低，而工作的時間卻無限度的延長。最難壓止的是飢餓的火焰！爲了滿足這「窮迫」的心，日報上就常常刊登着有人拾得鈔票的消息。應付那些獨居的婦女的，則是馬路旁邊的皇皇的公告——

「凡有丈夫出征在異國者，家內賢妻，應早晚向神宮祈禱。爲保護丈夫在前綫安全計，並應縫製「千人針」，寄往慰勞，以完成武士道婦女之崇高美德！」

雜誌也競出着所謂「未亡人讀本」的專號，在這些專號裏，抱着尾巴主義的作者，正在大談其「愛慾自制法」，「生活之道」，「如何獲得幸福」，「職業指導」等等。這是無聲的鎗彈。作盡了「自制」的努力，卻不會「獲得幸福」；躲入了「指導」的下面，也沒有學會這「生活」的「道」。她們掉入於無底的惶惑裏。

從惶惑裏直立起來的，是索夫團的組織。

然而又豈僅索夫團而已。時至今日，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是由知識份子傳染給平民，又由平民傳染給士兵了。在川崎，在東京，在神戶，在秋田，都會有過因抗拒兵役而引起的騷動；在上海，在南翔，在漢口，在廣東，都會有過因厭惡戰爭而發生的自殺。同時，這運動也由消極轉至積極，由思想轉至行動了。大阪軍火庫的爆炸，陸軍省文件的被竊，這是見於日本國內的；寬橋的叛變，南京的屠殺，天津日本憲兵營的反政府言論，上海江南造船廠的反戰爭標語，這是見於中國的。在戰場上，更多的是覺悟了的日本士兵，攜着鎗械來歸，或者自動被俘的事情。

下面是日本各師團及滿洲派遣軍反戰同盟的傳單：

「士兵諸君：

「粉碎軍部長年的橫暴，這正是時候了。」

『殺害了國寶高橋，強迫了議會，犧牲了五十萬民衆，從大衆身上強奪了百萬萬稅金。這種傢伙，能夠放任他們這樣橫行嗎？』

『我們能夠做剝奪日本大衆生命和生活的走狗嗎？』

『請看拚死爲正義而繼續抗戰的中國民衆啊！不覺得害羞嗎？』

『士兵大衆諸君，抓住機會啊！』

『一定不白死，好好地設法打敗仗，敷衍戰爭，不要死！不要受傷，不要打仗！』

『這正是忍之又忍的日本大衆的正義，也是懲罰軍部的使命！』

『懦怯的傢伙，儘可白白地送死！儘管變成殘廢！到那時，再來咒罵軍部，已經

遲了！

東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師團
及滿洲軍政部內派遣軍
『士兵反戰同盟』

這是一個碩大的組織，從血的戰鬥裏日本的大衆覺醒過來了。

六

但在日報上、雜誌上，卻是十分沉寂的，我們得到的不過是一點漏網的消息。

有誰要看統治階級的缺點的麼？只要留心新聞統制的辦法，問一聲禁忌的所在，這就可以知道究竟了。在日本，由於新聞取締條款的繁多，報紙就變成百衲衣，雖經補綴，還時時顯出破綻來。這破綻，此刻卻成了日本人民的透氣洞，他們是被悶得太苦，被壓得太久了。倘要苟延殘喘，這正是唯一的活路。

然而，也還得謹防着堵塞的工作。

戰事發生後不久，在「國策協力」的口號下，新聞的統制趨於強化。首先是移動了學藝欄，改變了一般文化的論調。據說是因為「支那不法」，爲了維持「帝國威嚴」，必須「斷然膺懲」，於是乎就動起手來，實行「聖戰」了，這幾乎是千篇一律的中日戰爭觀，原是出諸一個模型的。在從前，日本的報紙上，大抵都有特殊的一

角，發表着人們的意見，被稱爲『人民投擲憂鬱的垃圾桶』，如讀賣新聞的『讀賣直言』，都新聞的『射擊兵』之類，至此也一一加上封條，縱有『憂鬱』，也不準再行『投擲』，只好爛在自己的肚裏了。

箝制輿論的詳細條款，我們是無法知道的，但從日本軍閥對北平，青島，天津等處西文報紙發出的所謂『密令』看來，則其禁忌之多，實在足以使日報變成白紙，不再留一撮油墨的。『密令』計分四項，共五十一條，因爲太長，這裏不再抄錄了，橫豎總是這一套。

日本的查禁書報，本來是着眼於所謂『敗壞風俗』的，轉而及於『思想』，還是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事情。常受注意的是左翼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從俄文譯過來的書籍，但決沒有像這一回那樣慘烈的。從『事變』開頭，對於左翼的作家和評論家，就發出了所謂『禁筆令』，什麼東西都不准寫。其他被認爲超出『國策』，違反『日本精神』的一切，也同樣遭受禁壓，河合教授的法西斯主義批判受到處分，

是因爲歌唱自由；退職軍官佐木的戰爭情報被科罰金，是因爲宣傳人道。其他如橫田的世界法，田中的法律宗教與社會生活，宮澤的法學小辭典，都會受到嚴厲的指摘。外來的基督教書籍，一概買不到，有關於政治的更不必說，至於希特拉的我的奮鬥，也由腐刑而大辟；翻譯時加以刪節，出版後，又受到禁止發售的處分了。

作家被封閉，被拘禁；刊物和報紙被檢查，被停刊；然而日本的統治階級還是不放心，前年五月，警署又向出版業發出警告，凡是用筆名發表的政論和文藝，必須將作者的眞名，先行呈報。有誰懂得這意義的麼？雖然是黑夜的屠殺，然而碰着的卻正是這陰涼的積血。

奴隸們是以沉默爲抗議的，倘要見諸行動，這就是無爲。因此，日報和刊物就紛紛停刊了。或受取締，或出自動，在短期內，這些無疾而終的刊物，就有一千五百種。

自從中央公論因登載未死的兵而受到處分，編輯由此去職以後，日本的輿論就完全沉寂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唯唯諾諾，對國策點頭，向軍部叫好的胡調和跳跟。

這是一個麻痺了的國家。議會成了『拍手場所』，報紙變做『宦官新聞』，死路一條。正如尾崎行雄所說，日本的健康，在『蠢幹蠻幹』中，終於受了可怕的蠱毒了。

但是，目前的沉寂，也許正是兆示着未來的風暴的吧！

從近來的報紙上，可以知道政黨的統治，正在作着最後的掙扎，而民主的評論也在逐漸抬頭。對於這些羨慕自由，卻又躊躇着實行的傢伙，我們是不會寄與過大的期望的。然而這是大海裏的一絲漪紋，後面正跟着無數的波浪。

中國的民衆正在鬥爭，日本的民衆呢，也一樣鬥爭着。我想，總有一天，他們會匯成一流的吧。雖然現在還是黑夜，然而，死亡是黎明的犧牲，卻還是彼此一樣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版權

定價八元五角

投 影 集

唐 叢 作

發行人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 學 叢 刊

巴 金 主 編
第 六 集
共 十 六 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 遇	隨 檣 代 徵
宋 樾	屈 曲 夫	田 濟	李 健 吾	巴 金	舒 羣	金 魁	高 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 篇
江南曲	木 廠	沉 淵	投 影 集	囚 綠 記	霧 及 其 宅	夏 蟲 集	貝 殼
王 統 照	鄒 荻 帆	林 柯	唐 叢	陸 蠡	靳 以	繆 崇 羣	莊 瑞 源
詩 集	長 詩	戲 劇	雜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北京琉璃廠

北新書局敬贈